

◎潘洪声
穆兆勇
程举林 编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伟人幽默趣谈丛书

幽默趣谈

MAO ZE DONG
YOU MO QU TAN



毛泽东

伟人幽默趣谈丛书

毛泽东幽默趣谈

潘洪声 穆兆勇 程举林 编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幽默趣谈/潘洪声,穆兆勇,程举林编著.2
版,-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3(2004.1重印)

- ISBN 7-209-01275-3

I.毛… II.①潘… ②穆… ③程… III.毛泽东-
生平事迹 IV.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2297 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新华书店经销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125 印张 290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2 版

2004 年 1 月第 5 次印刷

印数 20001—23000 定价:22.00 元

世界名人谈毛泽东的幽默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起来。

——埃德加·斯诺

毛泽东谈吐随便，言简意赅，常常省去不必要的字眼，这给我以他想在顷刻之间把许多思想抒在一起的印象。他以安详而又平和的语调阐述自己的观点。这在小型会议上会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如果大演说家像他这样做，那只能招致失败。

——理查德·尼克松

我对毛泽东的印象是，他是一位无限深邃而豁达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他非常真诚坦率，谈起话来气势磅礴，无拘无束，富于幽默感，而且使人感到和蔼可亲。

——大平正芳

尼克松回忆录中记载毛泽东的诙谐谈吐之中夹带有一些暗示和主题,犹如瓦格纳歌剧的序曲,需要加以发展才能显示出它的意义。

——亨利·基辛格

毛的幽默感来自辩证法。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能一眼看到事物的对立面。正是这一点成了他的语言的特色,也是他所制定的方针政策的特点。他的幽默有时真是锋芒逼人。

——韩素音

他谈话时机智俏皮,爱用中国古典譬喻,条理分明而又令人吃惊。对于一些问题似乎在进行逻辑推理之前就能脱口而出,作出恰当而明晰的质论。谈话也会离开正题,涉及一些预料不到的和头绪繁多的方面。几乎没有他不感兴趣的题目。几乎对所有的事情他都由于博览群书而无所不晓。

——约翰·谢伟思

毛泽东的性格内混杂着深沉的严肃性和俚俗的幽默,忍耐和决断,思想和行动,自信和谦逊。他和记者相处的方法是独特的。他从不给你一次半小时或一小时的访问。他要么就是干脆不见你,要么就是抽出半天功夫。他答复问题非常详尽,刺激你和他辩论,然后再加解释,直至他确实知道你不但明白他的论点,而且明白他引以为立论根据的事实和见解为止。

——爱泼斯坦

目 录

世界名人谈毛泽东的幽默	(1)
-------------------	-------

读书·求知篇

“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	(3)
“我让你找本《水浒》，你给我找来一把水壶”	(6)
“其实我折本了”	(8)
“我不是圣人”	(9)
“你不友好啊！”	(11)
“今天刚看了一会儿”	(12)
“天堂也不会那么安宁了，因为天上也要划分 势力范围呀！”	(14)

生活·风范篇

- “这是新样式么，没人戴我戴”…………… (17)
- “我看不要分了，分开脚会有意见”…………… (19)
- “它跟我参加过洛川会议呢”…………… (20)
- “屁，人之气也”…………… (21)
- “难道这中南海还有人偷我的衬衣？”…………… (24)
- “看来，咱们的命运就是打疲劳战吧”…………… (26)
- “我的标准，不露肉、不透风就行”…………… (29)
- “你们要劝就劝他们吧”…………… (31)
- “叫我吃这样的菜，还不是破坏生产吗？”…………… (33)
-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是为了吃世界，而是为了
改造世界”…………… (35)
- “你说老虎厉害不厉害？”…………… (37)
- “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 (39)
- “看什么，脚脖子都长胖了，还说我缺营养？”…………… (41)

智慧·谋略篇

- “有钱龟孙不讲理”…………… (45)
- “台上握了手，可不能在台下踢脚啊！”…………… (46)

“这次我们说不定还要有劳蒋委员长哩!”	(48)
“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 一样的办法”	(51)
“不相信试试看,谁敢同这个‘肚先生’较量较 量!”	(52)
“中国好比一加仑的水壶,日本好像倒进水壶中 的半品脱的水”	(54)
“你们却连粥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抢 上山了”	(56)
“你们总不能只请客,不请菜啊!”	(58)
“你们不管我们的饭,我不起炉灶怎么办?”	(61)
“高点,再站高一点”	(64)
“蒋介石飞到沈阳,这下子我们胜利就更有把握了”	(66)
“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 的运输队送来”	(68)
“我们那样想,他(胡宗南)就那样办,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70)
“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	(72)
“蒋介石很坏,外国人要他,我们还不给呢”	(74)

求是·存真篇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	(77)
“谢谢‘蒋委员长’给我们上课”	(78)

- “要懂得，吃小米、爬大山，这就是革命，这就是马列主义”
..... (80)
- “这里叫教条主义休息，有些同志却叫它起床”..... (82)
- “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
..... (85)
-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 (87)
- “不能把自己的脑袋长在别人的脖子上” (90)
- “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 (91)
- “大锅菜炒出来就是不如小锅菜炒出来香么” (93)
- “谎报只能骗人民，不能骗敌人，敌人看了好笑” (95)
- “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 (97)
- “人和猪谁聪明？”..... (99)
- “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100)
- “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 (102)
- “你们在家睡觉，让我在外面站岗，风吹日晒雨淋，好不
残忍！”..... (103)

神州·沃土篇

- “‘工’‘人’两个字，连起来就是‘天’” (107)
- “叫化子打狗要靠墙，红军打敌人，要依靠根据地”..... (109)
- “这就是我们的风火轮”..... (111)
- “你没听说盘古时候，神农氏为了给人治病，他尝过百草

吗?”.....	(113)
“如果你身上还没有虱子,那你还没有理解中国”	(115)
“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	(117)
“我就骑着驴驹也要去看看”.....	(120)
“这厂里还有我的本家,那么这一包就是我加工的了”	(122)
“这个大鼎,可以煮一头大牛哇”	(124)
“我是个到了黄河也不死心的人”.....	(125)
“你是张大车,你是火车头,大家坐你开的这趟车,你就 是我们的头”	(128)
“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好哭脸……”	(130)
“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	(131)
“人民就是上帝”.....	(133)

鱼水·情深篇

“轻伤不下火线嘛”.....	(137)
“小鬼,‘灵活机动’刚听完就用上了”	(139)
“豆芽菜也是很好吃的一个菜嘛”.....	(141)
“这帽子是不是专为我准备的,我可夺人所好啰!”.....	(142)
“我们队伍太多了,人马太多了,对不住大嫂了”.....	(144)
“你蠢么!你把水全排干了,你那个鱼还讲什么安全?”	(147)

- “外国洋人也不都是坏人,外国洋人里头也有好人” … (148)
- “老百姓行动这么一致,比军队还整齐!”…………… (150)
- “我这个主席不如你们好,我没有自由啊!”…………… (152)
- “楚河汉界,你们吃高贵的,我吃卑贱的……”…………… (155)
- “这个不是能盛饭吗!”…………… (157)
- “慢点吃,慢点吃,还有菜,延(筵)席延(筵)席嘛” …… (159)
- “你们就是变着法子敲我的竹杠啊”…………… (161)
- “全国人民遭灾了,我哪里睡得着啊!”…………… (162)
- “一个人要想别人尊重你,首先你得尊重别人”…………… (165)

科学·文史篇

- “张果老虽然面向蓬莱,但路线走错了,永远也到不了
蓬莱”…………… (169)
- “我看你到我们红区里来,是撞上大运啦”…………… (170)
- “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
令的”…………… (173)
- “你真比斯大林还行”…………… (175)
- “这是李太白诗意:‘半壁见海日’”…………… (176)
- “氮和土壤中的矿物质不易起化合作用,要搞‘合作化’是
很困难的”…………… (179)
- “看来哈雷慧星是个庞然大物,其实它很空虚”…………… (181)
- “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 (183)
- “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 (184)

“你是守着元宝当石头啊!”	(186)
“孔老夫子有病啊!”	(188)
“一斤土壤里有多少细菌呀?”	(190)
“是先盖起这间房子后搬来沙发呢,还是先摆好沙发再 盖起这所房子?”	(192)
“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大概会显 得相当可笑吧”	(194)
“对称何以那么重要?”	(196)
“他们那个集团的党性,就是信佛教”	(198)

哲理·教育篇

“你们可成了神仙了”	(201)
“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地去西天取经,……他的方向是 坚定不移的”	(203)
“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	(204)
“我们的亲爱的国民党先生们,可否把你们的这种什么 ‘蒙汗药’或‘定身法’给我们宣示一二呢?”	(206)
“鸡不要杀”	(208)
“阿 Q 斗争起来也算英勇”	(209)
“只要心不黑就行了”	(211)
“哪有人能活一万岁的? 活不到,那就吃掉”	(212)
“你说当皇帝与拉车哪个更难啊?”	(213)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碰到评级这个机会”	(215)

- “我们是住在天上，我们也算神仙” (217)
- “要研究个‘睡觉宪法’” (219)
- “太密了出来也要挤死” (220)

治国·安邦篇

- “碰了钉子时，就向钉子学习，问题就解决了” (223)
- “自由资产阶级身上也出了那样一种‘香’，这种香，就是‘软弱香’” (225)
- “把水搞浑，浑水摸鱼嘛” (227)
- “走，进京赶考去！” (229)
- “万马齐喑究可哀么” (231)
- “不要说三千公尺上空没有原子弹，就是一万公尺上空也没有原子弹” (233)
- “组织一万人的军队和组建一万人的工厂，哪个更难些？” (236)
- “‘社会主义’的羊肉应该比‘资本主义’的羊肉更好吃” (238)
- “咱们的经是一部好经，小和尚、歪嘴和尚念错了” (240)
- “现在春天来了嘛，100种花都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 (242)
- “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 (244)
- “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遇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 (246)

- “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 (248)
- “对鬼,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在战术上重视” (251)

外交·魅力篇

- “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 (255)
- “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257)
- “这个东西应该既好看又好吃” (259)
- “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 (261)
- “我们这两块石头,一块扔给了杜鲁门,一块扔给了麦
克阿瑟” (263)
- “他们很看得起有色金属,却看不起有色人种” (266)
- “我算是公鸡,他赫鲁晓夫是草鸡!” (267)
- “这样好么,解决苏联的困难,中国也可以更好地自己
办自己的事” (269)
- “假如你们对罐头菠萝有兴趣,可以给我们一笔贷款”
..... (272)
- “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 (273)
- “杜勒斯,这不是一个好教员吗?” (275)
- “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兄弟” (277)
- “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 (278)
- “我们不会偷你的文件,你可以故意随便放在什么地方,
考验我们一下” (280)
- “但是我已没有足够的水,你要用你的水来穿石” (281)

爱情·家庭篇

- “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钢铁相碰响叮当”
..... (285)
- “看来漂亮靠不住，还得靠理想哟” (288)
- “爸爸特别喜欢李德胜这个名字” (290)
- “白天让岸英穿，晚上盖在被子上，你们俩都有份儿”
..... (294)
- “白胖子成了黑胖子了！” (297)
- “这菜虽苦，但有丰富的政治营养” (300)
- “现在没有谁看到，我是不会打小报告的。藏起来，带给他” (303)
- “你是你们家里唯一的共产党员，硬是党代表哩！” (305)

礼贤·爱友篇

- “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 (309)
- “口干了还是自己倒茶呷得多些” (311)
- “哟，原来你吃过苦，那就打收条留下吧” (314)
- “李先生有‘医’（议）政的高见，又有妙手回春的医术，
贤哉！” (316)

“你现在把两个包袱扔在这里,可以轻装上阵了”	(318)
“如履薄冰”	(321)
“既然他那么喜欢打兵舰,以后就让他干海军吧!”	(323)
“以后还要展开变成横队的哩!”	(324)
“我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吧!”	(326)
“你是我的‘半字之师’”	(329)
“苏秦知道张仪是个人才,能做大事”	(330)
“老九不能走”	(333)

责己·修身篇

“是不是分店也可以搞一点马克思主义呢?”	(337)
“我情愿看自己的脚”	(340)
“脱帽,敬礼,赔不是!”	(342)
“委屈无非有三种情况”	(344)
“告诉大家,毛泽东原来只想当个教书匠”	(345)
“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 63 岁,但还不够耳顺”	(347)
“我只会立正、稍息、睡觉、吸烟、坐凳子”	(350)
“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 年的刘伯温”	(353)
“这是我小时候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	(355)
“遇事不怒,基本吃素,多多散步,劳逸适度”	(357)
“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就取不得成就了?”	(359)

- “我晓得我在那里站岗!” (361)
- “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 (363)

姓名·情趣篇

- “可这二十八划不平常呀!你看,共产党、共产主义的
‘共’字,不就是‘廿八’吗?我们都要姓‘共’嘛”
..... (367)
- “小心打你的土豪啊!” (370)
- “你比孔夫子还高明啊!” (371)
- “你真是个‘孙悟空’呀!” (373)
- “你们好厉害呀”..... (375)
- “胡宗南把咱们从延安赶出来,到处流浪……” (377)
- “原来你是家里的一匹好马啊!” (379)
- “你是天下老一嘛!” (380)
- “我可是个大包袱,硬把胡宗南给压垮了!”..... (382)
- “她头上有两个辫子,她是两个封建” (385)
- “她的伤口刚合上,你就忍心又割一刀?”..... (387)
- “你已经比较伟大了,发展下去就比我伟大了” (390)
- “看来他还是个简化汉字的创始人呢”..... (391)
- “你取了一个苏联人的名字喽”..... (394)
- “此人口气真大,口衔天宪!”..... (395)
- “你是康熙的臣民了!” (396)
- “你!姓孙,孙行者!”..... (397)

“这个名字好听,锦上添云比锦上添花还美呢”	(399)
“你可不要按孔夫子的‘由之’去做”	(402)

壮志·豪情篇

“谁也不能多分”	(405)
“穷不穷,毛泽东”	(407)
“丈夫要为天下奇”	(409)
“终能用小石头,打烂蒋介石的大水缸”	(411)
“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	(412)
“两年后,我邀请你到北京来看我”	(414)
“什么十里八里?中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415)
“带不了的书籍可以留下来摆整齐,让胡宗南的兵读一 点马列主义也有好处嘛!”	(417)
“不要白酒,钟松没有那么辣”	(419)
“不打倒蒋介石,完不成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谁也不能 去见马克思”	(422)
“将来还可以办大学哩!”	(424)
“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	(425)
“嘿嘿,还真是个好对手哩!”	(426)
“今天你胜利了”	(429)
“对于帝国主义我不是什么估计不足的问题,而是根本 就把它踏在脚下”	(430)
主要参考书目	(432)
后记	(434)

读书 求知篇

毛泽东幽默趣谈

“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

毛泽东酷爱读书，他曾这样说：“读书是我终生的爱好”，“我如果再过十年死了，那末就要学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按阴历一年为三百六十天——编者），“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

毛泽东青少年时期，在长沙省立图书馆自修，每天第一个进入图书馆，最后一个离开，中午就以两个烧饼充饥。他回忆说，当时他进了图书馆，就像牛闯进了菜园子，拼命地吃个不停。他强调学习要持之以恒，还拟了一副对联来鞭策自己：“苟有恒，何必三更睡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毛泽东为了培养记忆力，常默写古诗。在青年时期，他就能背诵 400 多首古诗，年逾花甲了，还酷爱背诵古诗。1965 年，历史学家周谷城在上海见到毛泽东，两人谈到旧体诗，说起晚唐大诗人李商隐来。十分欣赏李商隐的周谷城说着说着便随口将李商隐的一首七律诗用湖南腔调哼了出来：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

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

周谷城把诗的第五、六两句哼吟了几遍，最后两句却哼不出来了。在一旁的毛泽东知道老友已经忘记，便笑着用同样的湖南腔调替周谷城念了出来：

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1949年12月，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有不少外事活动，可是他还抓紧零星时间阅读鲁迅著作。有一天，外事活动后回到住地，离开饭的时间不到半小时，他就拿出鲁迅的著作读了起来。开饭时间到了，工作人员把饭菜放在桌上，他都顾不上吃，一直把20来页书看完了才吃饭。边吃还边笑着对工作人员说，他在延安时，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

毛泽东读书的范围特别广泛，包括古今中外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书籍及各种报刊杂志。更有别于他人的是，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居，卫生间专门有一把木椅子，上边也是放书报的，供他上厕所时抓紧点滴时间看书。他睡觉用的一张双人木板床，床上半边放满了各种书籍。如今人们参观丰泽园时仍然可以看到这样的陈列。

毛泽东对特别喜爱的书，常常要反复读好几遍，甚至几十遍。《共产党宣言》他从青年时候起一直读到晚年，不知读了多少遍。《红楼梦》是他喜爱读的一本书。他在1964年8月找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5遍……。”李达写的《社会学大纲》，1937年5月出版后，他在一次小型会议上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10遍，我写信请他再寄10本来，让你们也看看。”《资治通鉴》上起东周，下迄五代十国，贯穿1362年的历史，蕴含15个朝代的兴衰成败，总计294卷。毛泽东晚年曾对护士

孟锦云说，这部书他读过17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

学英语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个部分。1958年他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可学一种外文。他自己以身作则，在各地巡视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随时都挤时间学英语。他的湖南口音很重，读英语发音不准，就让会英语的同志领读，他跟着读，而且坦坦然然大声地念。在《共产党宣言》和《矛盾论》英译本上，他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用削得很尖的铅笔，在空白处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注明每个单词或短语的多种不同的字义和用法。到六七十年代，他已能流利地阅读国内外一般英文书刊。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毛泽东会见了。后来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到：“在我们告辞的时候，毛说，‘你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我微笑着摇摇头，朝周恩来说，‘他读的书太多了。’”

1976年9月8日，毛泽东病危弥留之际，医护人员对他不断抢救，而他又不断陷入昏迷状态。每当他清醒过来时就要书看。他要一本书，但声音微弱，语言含糊，连最能听懂他的话的秘书，也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他着急了，示意给他拿过纸和笔来，写了个“三”字，颤抖地递给秘书，然后又用手敲了三下床。秘书猜出了毛泽东的意思，他是要日本首相“三木”的书。当时正是三木准备下台时。当秘书找来三木的书时，毛泽东点点头，露出满意的神态。他的手已抖得托不住那本很轻很轻的书了，只好让护士孟锦云为他托住。毛泽东只看了几分钟，便昏迷过去了。这是毛泽东读过的最后一本书，这本书他没读完，便于9月9日0时10分与世长辞。

“我让你找本《水浒》， 你给我找来一把水壶”

毛泽东喜欢读《水浒》，他曾讲过，他最初的军事知识就是来自《水浒》和《三国演义》这两本书。

凡是读过《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的人都知道，毛泽东的文章中曾多次引用过《水浒》上的故事。在毛泽东 1936 年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为了说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了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可以实行必要的退却，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他引用《水浒》中林冲和洪教头比武取胜的故事：“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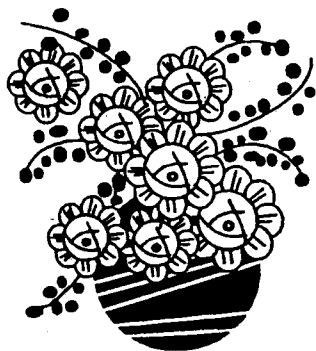
关于毛泽东喜欢《水浒》的事，还有一个幽默故事呢。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有一次，部队打下一座县城，毛泽东被分配住在一个地主的院子里。他走进院子，环视四周，对警卫员说：“这家人看来蛮富有么。你四处翻翻，看能不能找本《水浒》来。”

警卫员接受任务后，立刻寻找起来。不一会儿，他提着一个大水壶兴冲冲地向毛泽东报告：“找到了，你看行不行？”

毛泽东一怔，随即哈哈大笑，一手叉腰，一手指点着警卫员说：“小鬼，我让你找本《水浒》，你却给我找来一把水壶。《水浒》是本写梁山泊好汉聚义造反的书，这不是牛唇不对马嘴嘛！”说着忍不住又大笑了起来。

事后毛泽东还专门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叫到一起，让大家从错把水壶当《水浒》这件事中认识学习历史知识的重要性。



“其实我折本了”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经常到抗大、陕北公学、马列学院等院校去，亲自给学员们讲课。毛泽东讲课，总是深入浅出，用生动、活泼、有趣的语言，把深奥的道理讲得明明白白，让人一听就懂。所以大家都喜欢听毛泽东讲课。

起初，不少人都以为，像毛泽东这样的大学问家，给大家讲课还用准备吗？……后来，他们知道了，事实并非如此。毛泽东每一次讲课，都是认真准备的。他要深入思考，有时还要调查研究，然后写出讲课提纲。为了准备讲稿，他常常要用几天几夜，甚至更多的时间。他常说，共产党人最讲究“认真”二字。

1937年秋天，毛泽东在一段时间内，集中讲哲学专题课。郭化若当时还在庆阳红军军事学校任教，他返回延安后，听说毛泽东的哲学课讲得非常生动、有趣，大家都喜欢听。一次见到毛泽东，反映了这些情况，并为自己未能听到这些讲课深感遗憾。毛泽东听了他的这些话，幽默地对他笑着说：“其实我折本了。”郭化若一时还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毛泽东看了出来，接着解释说：“我花了四天三夜时间，才准备好了讲课提纲，讲矛盾统一法则，哪知只半天就讲完了，岂不折本了吗？”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不是圣人”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告诫全党：“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1955 年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1958 年初，毛泽东提出开展技术革命的口号，并说：“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还说：“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

毛泽东也深感自己需要学习，1962 年他在 7000 人大会上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1961 年，他在庐山一次谈话中说到，他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不当官僚主义者。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对地质方面缺少

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自己的一生写进去,把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的人民去评论他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又说: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



“你不友好啊!”

毛泽东不但对中国的历史和民族文化十分了解,而且对外国的历史和文化也很感兴趣。他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的了解程度,曾让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吃一惊。

那是1972年9月,当时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来到中国。毛泽东两次接见了 him。

毛泽东是在自己的书斋内接见大平正芳的,俩人亲切地进行交谈。大平正芳后来回忆这两次交谈是非常愉快的。他说,我发现毛泽东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很了解,并且有很丰富的知识。例如,毛泽东举出“I、RO、HA”及“A、I、U、E、O”等日文字母的读音,评价说,创造了这些文字的 Japanese 民族是伟大的。

毛泽东还对大平正芳说,他在学日文,想到日本去留学。

“那我们怎么照料您好呢?难办哪,还是请您别去留学吧。”大平正芳吃惊地回答。

毛泽东笑着说:“你不友好啊!”

两个人都为这个非正式的玩笑发出朗朗的笑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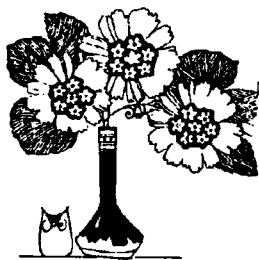
“今天刚看了一会儿”

毛泽东的晚年，身体健康越来越差，人也日渐消瘦，饭吃得很少，但还是酷爱读书。

1975年，毛泽东的眼病发生变化，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了。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和组织下，医务人员给毛泽东做了手术。当眼睛稍有好转，又能看见东西时，他就要看书学习。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健康，使手术后早日痊愈，医务人员给他规定，每天只能看15到30分钟的文件和书。对此，毛泽东当着医生的面满口答应照办。可是医生一走开，他就情不自禁地拿起文件或书来看。医务人员一来，他就立刻把书和文件塞在枕头底下。有一次，毛泽东躺在床上专心致志地看书，忘掉了医嘱。当医生轻步走到他跟前时，才急忙把书往被子里藏。他望着医生亲昵又有点责备的目光，不好意思地忙笑着解释说：“今天刚看了一会儿。”可是医生走开后，他又悄悄把书摸出来，贪婪地读起来。

说到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他身边老一代的工作人员曾与后来的工作人员谈起一件事。那还是在延安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毛泽东正在紧张地写作，他的桌子上、凳子上、地上摆满了书籍、资料。这时，一个工作人员进来看到这种情形，以为

是主席太忙没有时间整理,就急忙把这些书刊按照大小、种类整整齐齐地收放到一起,刚要往书架上摆,被毛泽东发现,他连声说:“糟啦!糟啦!”这位工作人员被弄得莫名其妙,心想:“怎么会糟了呢?”事后才知道,这是毛泽东读书写作的一个习惯。毛泽东看书、写作,只求便利实用,不讲求整齐美观。他所需要的书籍、资料,有的打开着,有的夹着纸条,有些折叠起来大小不一地放在一起,乍一看好像杂乱无章,其实这些书籍、资料的位置,毛泽东心里有数,用到时拿起来十分顺手。



“天堂也不会那么安宁了， 因为天上也要划分势力范围呀！”

毛泽东富有广博的知识，这使他谈话时能旁征博引，以古喻今，深入浅出，从而紧紧抓住人们的注意力。

一次，毛泽东同一个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团谈论人世间纷争不断的问题，客人感慨万千。谈着谈着，毛泽东突然离开谈话主题，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

“伊斯兰教的真主是谁？”

对方被这冷不丁的问题弄得莫名其妙。毛泽东望着客人惊讶的表情，吸了口烟，笑了笑，继续问道：“谁是佛祖？”“谁是基督教的上帝？”

他的富有感染力的笑和学者的优雅神态，使对方很快镇定下来，并意识到这位伟人正在思考着什么深奥的问题，于是他们有礼貌地一一作答。接着，毛泽东又说：

“按照中国道教的想法，天国还有位众神之王，他叫‘玉皇大帝’。如此看来，天堂也不会那么安宁了，因为天上也要划分势力范围呀！”这充满想象力又妙趣含蓄的话语，为在场的人们打开了新思路，博得客人们的赞赏。

毛泽东在外交交往中这种特有的魅力，赢得各国外宾的尊敬。

生活 风范篇

毛泽东幽默趣谈

“这是新样式么，没人戴我戴”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开展了大生产运动。那是为了粉碎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对我根据地的封锁。

冬天到了，陕北的冬天是很冷的，过冬没有棉帽子可不行。在大生产运动中，部队自己动手做了一批毡帽。可在当时的条件下，原料不好，技术设备更谈不上，做出来的毡帽没棱没角，帽檐还往下耷拉着，戴在头上很难看，大家都不愿意戴。

有一天，毛泽东的警卫员小王从外面拿回来一顶这种毡帽。毛泽东见了问：“你拿了块什么东西？”

小王噗哧一声笑道：“您都看不出来吧？是毡帽，没形儿。”

“戴在头上不就有形了么。”毛泽东说。

小王本来是想戴它的，可是被街上的行人笑话得吃不住劲，遂又从头上摘下来抓在手里拿回来。他对毛泽东说：“这帽子戴着倒是挺暖和的，可就是不好看，一戴上别人就笑话，说是像讨饭的，所以没人肯戴。”

“噢，拿来我看看。”毛泽东放下手中笔，把帽子翻过来掉过去地看了看，点着头笑了：“我们自己生产出这么好的帽子，

怎么还不愿戴，真是习惯势力。这是新样式么，没人戴我戴。”

于是毛泽东戴上它走到院子里。院子里有不少人，大家看着毛泽东戴了这顶软不拉塌的毡帽子，同平常的形象完全不同了，不由得哄然大笑。

毛泽东却装作不明白大家笑什么，该聊什么聊什么，该干什么干什么，从容、自在地进出院子。大家笑过一会儿也就不再笑了。

从这天起，毛泽东带头戴着这顶帽子，引得不少人注目，渐渐习惯了，后来竟感到别有一种“风度”，大家就争相效仿，接受了毛泽东推出的这种“最新款式”。

现在，延安革命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许多毛泽东当年头戴毡帽作报告、参加会议的照片呢。如今成了富有教育意义的历史见证。

“我看不要分了，分开脚会有意见”

毛泽东精于算大账，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如此，而且在生活上也如此。

转战陕北时期，毛泽东只有一条毛巾，洗脸擦脚都用它。但是，就是那条毛巾，也没有什么“毛”了，稀稀疏疏的，简直就是个麻布片。

一天，卫士李银桥照顾毛泽东洗脸，趁机说：“主席，再领条新毛巾吧？这条旧的擦脚用。擦脸、擦脚应该分开嘛。”

毛泽东想了想，说：“分开就不平等了，现在每天行军打仗，脚比脸辛苦得多了。我看不要分了，分开脚会有意见。”

李银桥噗哧一声笑了，说：“那就用新毛巾擦脚，旧毛巾擦脸。”

毛泽东摇了摇头：“还不能这么算，我领一条毛巾好像不值多少钱。如果我们的干部、战士，每人节约一条毛巾，这笔钱就够打一个沙家店战役了。”

“它跟我参加过洛川会议呢”

毛泽东一生俭朴，对物质生活从不苛求，注重对革命事业的追求。他是叱咤风云的伟人，却有着极其丰富和细腻的情感世界。

解放战争时期，在陕北杨家沟时，毛泽东有一件补丁摺补丁的灰布军装。卫士李银桥准备扔掉，他拿给毛泽东：“主席，你看看吧，再穿上就该出洋相了。说不定你作报告，在台上一作手势，它就会碎成布片呢！”

毛泽东接过衣裳，小心翼翼地摊在腿上，抚摸着那件旧衣裳，深情地说：“它跟我参加过洛川会议呢，这样吧，用它补衣服，它可以继续发挥作用，我希望能继续见到它。”毛泽东就是这样，对一件破衣裳都充满了感情。

“屁，人之气也”

人放屁是正常生理现象，但当众放屁却历来被认为是不雅，甚或不恭，是最丢丑的事。正因为这样，如果谁当众放了屁，就会感到难堪，为之脸红。然而又有谁一生从未在人面前放过屁呢？

毛泽东做人做事真诚实在，他把放屁看成是很自然的事。当工作人员在他面前放了屁感到难堪时，他一句玩笑，一个幽默，就把窘迫变成了欢笑。

李银桥讲过这样的趣闻：转战陕北时，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天灾，陕北粮荒严重。1947年冬，部队两个月里只有黑豆充饥。由于天天尽吃黑豆，肚子发胀，放屁就多。

警卫战士朱老四，由于抽烟多，牙都被熏黑了，咧嘴一笑就露出两排黑牙。一天朱老四站哨，毛泽东出屋散步，见到朱老四咧着嘴笑，煞有介事地说：“哎呀，老四同志，你的牙齿怎么这么黑哪？吃黑豆吃的吧？”朱老四未及回答，却“噗”地放了个屁。

毛泽东像听到回答一样点点头：“不？噢，不是就好。”

朱老四正为在主席面前放了屁感到难为情，听毛泽东这么一说，竟忍不住憨笑起来。其他卫士也都被逗乐了。毛泽

东话头一转,对大家说:“吃黑豆是个暂时的困难,陕北就是这么个大地方,每年打的粮食,就够自己吃的。现在敌人来了十几万,又吃又毁,粮食就更困难了。不过,这不要紧,我们要渡过这一关,再过几个月,就不在这里吃了,到敌人那边吃去。”毛泽东接着对朱老四说:“你说,难道只许他们吃我们的,我们就不吃他的?”

朱老四点点头,用力憋出一句:“吃狗日的。”

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

1956年以后,毛泽东上了年纪,洗澡改为擦澡。毛泽东喜欢在擦澡时和卫士们聊天。卫士们无拘无束,无话不谈,有时连放屁也谈笑一番。有一次,封耀松放了屁。

“小封哪,你搞什么小动作啊?”毛泽东笑咪咪地问。

“对不起,主席。我,我放了一个……屁。”

“哎,不是屁吧?那是气。折腾你几天休息不好,应该我说对不起你么。”

“不,不是的。主席,是屁,不是气。”

“不是屁,是气。有气放出来就好。”毛泽东摇晃着头,念念有词:“屁者,气也。宁在主席面前丢丑,莫让冷气攻心么……”

毛泽东说到这里哈哈大笑起来,卫士们也随着大笑了一阵子。

毛泽东对自己放屁,同样也是处之坦然。

转战陕北时,因吃黑豆胀肚,放屁放得他写电文都坐不稳,只好常到外边去散散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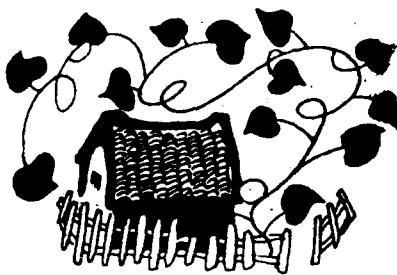
1965年秋,毛泽东写了《念奴娇·雀儿问答》这首词。1975年,《诗刊》杂志要发表,将词的清样送毛泽东审定。毛

泽东让小孟读给他听。当小孟读到“不须放屁”一句的时候，她扑哧一下笑出声来。说：“主席，你写不许放屁，可你今天放了28个屁，我都给你数着呢。”

“噢，你还给我记着黑账。”毛泽东笑着说。“活人哪个不放屁，屁，人之气也，五谷杂粮之气也。放屁者洋洋得意，闻屁者垂头丧气。”

小孟听了，笑得前仰后合，直不起腰来。

小孟，即孟锦云，是毛泽东晚年身边的护士。



“难道这中南海 还有人偷我的衬衣?”

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为此,毛泽东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他也是率先这样做的。他的衬衣补了又补,有一次,卫士李家骥给他穿衬衣,因为衣服太旧太薄了,又补了又补,不小心,后背扯开了一个大口子。

小李说:“主席,衬衣张大嘴了!”毛泽东也笑了。他对小李说,缝缝以后再穿,又叮嘱说:这个衬衣可值钱了,没有我的同意谁也不能给我丢掉。

1950年的一天,毛泽东要接待客人,又想起那件破衬衣。小李说找不到了,要他穿件好点的。毛泽东却坚持不依。

“天哪”,小李心里暗暗叫苦。原来,小李随毛泽东访苏归

来后,和卫士长李银桥清理过一次毛泽东的衣服。当看到那件已无修补价值的破衬衣,便自做主张,给警卫班李风华的孩子当了尿布(毛泽东去世后,李家骥曾和李风华谈及此事,才知道他并没给孩子当尿布,而是保存了下来)。

可毛泽东偏偏对这件衬衣有感情,非要不可,还嘟囔说:“难道这中南海还有人偷我的衬衣?”

后来小李情急之下,只好说了个谎:“主席,我哪敢随便给你丢掉呢。我见李风华的孩子没衣服穿,又见那件衬衣确实不能修补了,就想用这件衬衣给孩子改一件小衣服不是挺好的吗,这也不算浪费。所以,我未经请示就把这件旧衬衣给了李风华爱人改做孩子衣服了。”

毛泽东一听由怨变喜,连声说:“好,很好。”小李这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看来，咱们的 命运就是打疲劳战吧”

1949年10月1日，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这一天，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为了筹备开国盛典，在北京，在中南海，从中央领导到普通工作人员，多少天来一直紧张地工作，昼夜地忙碌着。

开国前夕，毛泽东又整整忙了一个通宵。那天下午，他先是参加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后，他和全体代表前往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他宣读了纪念碑碑文，并执锹铲下第一锹土奠基。晚上又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盛大国宴。之后，他回到办公室，继续处理手头上的那些重要文件，直到凌晨6点钟。

晨曦卷走了夜幕，天大亮了。毛泽东离开书案，缓步走出菊香书屋。他点了一支烟吸着，在庭院来回踱步，一丝倦意袭来，他打了一个哈欠。他，太劳累，太疲乏了。下午3点，他还要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亲自向全国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亲手按动电钮升起五星红旗，还有隆重的阅兵式和30万群众的大游行——他至少要在城楼上站五

六个小时。

“下午1点钟叫我起床。”他不得不将这个“破例”的决定告诉值班卫士。

下午1点，卫士叫醒了毛泽东。2点，毛泽东来到勤政殿大厅，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是一个短会，会后全体委员都要去天安门城楼。

会议结束后，工作人员建议毛泽东稍休息一下，按时出发，正点到达就行。

毛泽东笑笑说：“好嘛，事情反正是一个接一个。我们打了几年的疲劳战，打出来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又是建国的第一天，又是一个疲劳战。我没有睡几个小时的觉，到天安门上还要站几个小时。看来，咱们的命运就是打疲劳战吧。”听了这话，周围的同志们都大笑起来。

在天安门城楼上，从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典礼开始，到阅兵式完毕，毛泽东已经站了3个多小时。接下去是群众游行，通过天安门。几经同志们动员，毛泽东才走进休息室稍略休息。他点燃一支烟，和程潜先生亲切交谈起来。没说上几句话，周恩来微笑着走进来，说：“游行的群众看不见你，他们都停下来不前进了。还是你预料得对，你必须在天安门连续站几个小时。”

“好吧，疲劳也得去啊。”毛泽东兴致很高，他向程潜抱歉地笑了笑，走出休息室，又站到了主席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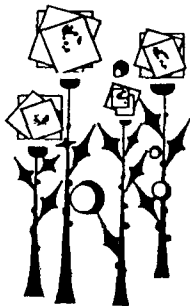
群众热烈地欢呼着，缓缓地继续前进了。

“打疲劳战”这是毛泽东多年来的口头禅，也成了当时中央“五大书记”的“专利品”。

早在1948年大决战的日子里，为了研究部署指挥三大战

役,五位书记每天都集中办公,而且经常“按月亮的规律行事”通宵达旦。那时,毛泽东对周恩来、任弼时说:“我们三个人打疲劳战打惯了,在陕北打了一年多,打败了蒋介石妄想消灭我们的野心。现在咱们再在一起打一段疲劳战,为的是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不然,事情这么多,又这么重要,少数人做不了主呀!”

毛泽东把艰苦的斗争历程,笑说成是“打疲劳战”,话说得非常轻松、风趣、幽默。然而这风趣幽默的语言中,所包含的则是一代开国领袖们的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斗志,献身忘我的精神,以及他们所创造的那不朽的丰功伟绩啊!



“我的标准，不露肉、不透风就行”

毛泽东的生活一贯俭朴。就拿他穿的衣服、袜子来说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一生都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只是毛泽东和他的卫士们努力不让人看到那些补丁罢了。毛泽东对他的衣着定了一个听起来很好笑的标准，他对卫士们说：“我的标准，不露肉、不透风就行。”像毛泽东这样的伟人，竟一生都穿着带补丁的衣服，这在世界伟人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毛泽东为什么不穿件好点儿的衣服呢？在战争年代，毛泽东说过：“我节约一件衣服，前方战士就能多一发子弹。”新中国建立后，物质条件比过去好多了，但他仍然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他说：“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没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而共产党人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

但是作为一个国家领袖，要是让外人，特别是外国人看到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人们心里总觉得不合适。为此，毛泽东有时对外衣上的补丁还是蛮“讲究”的。他要求卫士们补补丁要尽量选用与衣服本色相同或相近的布，补丁的形状也要尽可能整齐规矩。他这样对卫士说：“找块好布，帮我配合适了，外

衣要给外人看，太刺眼了对人不礼貌。”

可是，他对内衣的补丁就很不讲究了，更何况他的衣服破了，都是来自农村、针线活赶不上女同志的卫士们给补的。卫士们这样形容毛泽东的内衣、内裤和袜子上的补丁：“千姿百态”，“不成方圆”，蓝布头、黄布头、灰布头，有什么碎布就补什么补丁。有时找不到布头，就拿块医药纱布做补丁。

刚进北京时，毛泽东几乎每天要接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知名人士。有一次，他要接见张澜老先生，吩咐李银桥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

李银桥在毛泽东所有的衣物中翻了又翻，竟挑不出一件不破或没有补丁的衣服。他苦笑而心酸地对毛泽东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要不我去借一件？”

毛泽东笑笑说：“你不要借了。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他想了想说：“有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

就这样，一个领导百万雄师，打了大胜仗，进了大城市的历史巨人毛泽东，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会见了张澜，又会见了沈钧儒、李济深、郭沫若、陈叔通等。

“你们要劝就劝他们吧”

遇有重大事情，毛泽东工作起来可以几天几夜不吃饭，不睡觉。这种牺牲自己的一切，全身心地投入革命事业的崇高精神，使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感慨万千，也是为亿万中国各族人民铭心敬仰的。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既清醒地看到面临的困难，又深入地分析了出兵作战的必要性，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毅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这一决策是历史性的，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此后，毛泽东为朝鲜战场我志愿军的胜利日夜操劳。

有一次，卫士李家骥接班。上一班告诉小李，主席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不长时间，毛泽东可能是太饿了，也可能才想起饿，要吃饭，抬头看了小李一眼说：“怎么还是你值班？”

听了这话，小李开始感到惊奇，接着就是一阵难过。原来毛泽东因全身心地思考问题，周围情况他不注意，以至于卫士早已换了几班他都如同没看到一样。小李抱怨地说：“主席，我这是又上一班了，您已经两天两宿未睡觉了。”

毛泽东也似乎才发现自然界昼夜的变化，自言自语地说：

“又过了一天。”

毛泽东刚吃完饭，聂荣臻等匆匆来到，进屋便指着地图对毛泽东说：“我们的部队已进入指定阵地。”毛泽东马上问到：“敌人部署怎么样，要让他们按我们设计的方案行动！”慎重初战，毛泽东与在场的同志又研究了很长时间。

聂老总走后，江青叫来了保健医生王鹤滨，两人轮番做毛泽东的工作，劝他休息一会儿。毛泽东生气了，说：“我也不想这样做，有什么办法呢？是他们逼得我这样，你们要劝就劝他们吧！”说罢把两人赶了出来。

江、王两人回到值班室。王鹤滨不解地问：“主席今天生谁的气？”卫士李家骥说：“主要是太忙了。”

“不对，他怎么说谁逼他，让我们有本事劝他们？”王医生仍不明白地问小李。

小李哈哈笑起来，解释说：“那是让你去劝美帝国主义别侵略我们，这样主席就不用忙于考虑打仗的事了。”

“哎呀！我好糊涂！”王鹤滨一拍脑袋，恍然大悟地惊呼起来。

“叫我吃这样的菜， 还不是破坏生产吗？”

警卫班长武象廷被分配专门负责管理毛泽东的生活，任务之一是为小厨房采购食品和蔬菜。

那是在1950年1月的一天，毛泽东知道武象廷的新工作后，笑着对他说：“你改行了，好啊，我告诉你，只要你们饭菜做得干净卫生就可以了。不必买一些贵重的东西给我吃。比方说，现在是冬季，你就别买那些西红柿、黄瓜之类的新鲜蔬菜。现在买一条黄瓜的钱，到了夏天就能买一筐黄瓜。冬天买一条黄瓜只能吃一顿，夏天买一筐黄瓜能吃几十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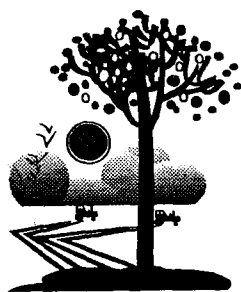
这是武象廷刚担任新工作后，毛泽东给他上的第一课。

转眼到了夏季。有一天小武临时有事，让王振海去买菜。小王头一次办这事，尽想买些新鲜的有营养价值的东西带给毛泽东吃。结果，他买回来一些嫩玉米蕊，也就是刚刚开过花的玉米笋，还没有结粒的小玉米核。小王满以为给毛泽东买回来好吃的了，心里特别高兴，早早地催炊事员小刘做好，给毛泽东端去。

谁想到，毛泽东不高兴了，皱起眉头说：“炒这一盘菜需要多少棵玉米？要是这些玉米长熟了能打多少粮食？叫我吃这

样的菜,还不是破坏生产吗?把这菜端回去,谁买的就叫谁去吃。”

小王和小刘虽然挨了一顿批,但事后想想深为感动,毛泽东已经是党和国家的领袖了,时时处处想的还是人民大众,国家还不富裕,要求自己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是为了吃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

在一般人眼里，毛泽东身为一国领袖，又是深受人民爱戴的领袖，要吃什么没有？即使解放前不行，解放后有条件了，为了领袖的健康，还不该顿顿搞些好吃的，搞些营养滋补保健品吃吃？

其实不然。据跟随毛泽东 15 年之久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毛泽东进口的东西必经卫士检查，这 15 年中，他没吃过任何滋补品。如果说吃过，那就是每逢大战（解放前）或者他连续写作动脑筋几昼夜，要卫士替他搞一碗红烧肉来“补补脑子”。

毛泽东对一切山珍海味都不追求，尤其厌烦宴会。有时接待外宾需要招待一顿，毛泽东也只捡身边素的吃一点儿。1960 年我国经济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决定自己不吃肉，与人民共渡难关。工作人员看到毛泽东生活非常清苦，心里都不安，想办法让他吃上块肉。有一次，毛泽东要在颐年堂接待客人，做了两素两荤，其中还有毛泽东最爱吃的红烧肉。吃饭中间，毛泽东一再招呼客人吃，自己却不动一筷子肉。秘书高智在旁边看了心里难过，真想让毛泽东也吃块肉，就在让客人吃

的时候,就势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在毛泽东的饭碗里。他老人家吃了口米饭,把这块肉也吃了。高智心里高兴死了,过了一会儿,又给毛泽东夹了一块。毛泽东回过头来,严肃地看了高智一眼,高智知道“惹祸”了,这是对高智的批评,他再不敢给毛泽东夹肉了。

保健医生徐涛多次劝毛泽东应注意营养,毛泽东就用毛竹筷子敲敲盛二米饭(大米、小米混煮的)的碗说:“全国农民要是都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不错了,你们就可以来跟我提那些建议了。”

毛泽东常对卫士们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吃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才是人,人跟其他动物就有这个区别。”

“你说老虎厉害不厉害?”

毛泽东的生活方式很特殊,常人看来很“古怪”。他的饮食餐次不定,常常一日两餐或两日三餐。饮食内容也不一定,有时四菜一汤,量不多,而常常是煮一缸麦片粥或烤几块红薯算一餐。他吃饭时边吃边看书报,吃起来狼吞虎咽似的。睡觉更没个准点儿,喜欢夜里办公,夜深人静,他的大脑思维更加活跃。他常说,他是“按月亮的规律办事”。这是毛泽东在长期战争环境里养成的工作和生活习惯,解放后仍然如此。

保健医生徐涛对毛泽东的这种不规律的生活习惯表示忧虑,常劝毛泽东改变一下,对身体健康有利。

有一次,徐涛又同毛泽东谈到日夜规律对人体的健康影响问题时,毛泽东突然反问:

“你说老虎厉害不厉害?”

“厉害呀,有时候还能吃人。”

“它就是白天睡觉,夜里出来,它也不见什么太阳,不是也很健康吗?”毛泽东把话切入正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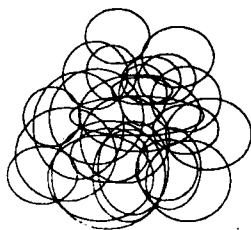
这时徐医生恍然大悟,原来主席在为自己的生活习惯辩解呐。

“那……那人和老虎不一样。”徐涛一时词穷,没说出更好

的理由,于是又补充了一句:“人还能捉住老虎呢,还是人厉害。”但是道理还是没说清。

毛泽东对徐医生的这一答复,当然不能满意,因此他的生活习惯“依然故我”。

徐医生一直在想,毛泽东整日整夜高强度脑力劳动,加上生活起居、饮食、工作全无规律,按医学上的一般规律,这种情况会使大脑皮层高级神经活动中枢的功能失调与紊乱,很容易导致高血压、溃疡病、心律失常或是甲状腺机能亢进等一类疾病,这在医院临床上已司空见惯。可是毛泽东却什么事也没有,仅仅是睡眠非常不好,这真有点使人不可思议。



“你们要做刘宗敏， 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

1950年2月，毛泽东出访苏联回国，视察了哈尔滨、沈阳等地。

在哈尔滨，省市领导出于对领袖的热爱，把“便宴”搞得很丰盛。由于当时胡志明主席（越南共产党主席）也出席了宴会，毛泽东当场没说什么。但他不满意这种做法，只在两三个盘中夹菜，吃了半碗大米饭，其他都没动。

饭后，他对饶斌市长说：我们国家还很穷，不能浪费，不能搞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吃米饭和蔬菜就可以嘛！饶市长表示“一定照办”。第二顿饭就简单多了。

在沈阳，饭菜搞得比哈尔滨还好，毛泽东一进餐厅，脸就沉了下来，只吃了眼前的空心菜等几个菜，喝了几口葡萄酒，并礼节性地让胡志明主席多吃多喝。不大一会儿他便放下筷子，吸起烟来。整个晚饭仅用了半个小时。

饭后大家都来到会议室休息。这时毛泽东欠欠身子，发起言来。他先说今晚饭菜太多，接着便带有批评地说：“同志们，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么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你们

应重温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第二天毛泽东在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领导干部会上讲话时，又讲到这个问题。

他说：“这次我和恩来等同志路过东北，主要想了解一下东北的工作情况，了解东北地方工业生产情况。发现浪费太大。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那么丰盛干嘛？”说到这里把吸完的烟头往烟罐中一捻，愤愤地说：“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他说：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做表率……。”

毛泽东在这里讲的李自成、刘宗敏，都是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军的首领。起义军打下明朝国都北京后，首领的思想首先就起了变化。李自成忙着搞登基大典。他手下大将军刘宗敏则搜括财物。从上到下都大吃大喝，昏昏然陶醉在已取得的胜利之中。结果很快就丢了天下。毛泽东多次告诫全党，要从这个历史事件中汲取借鉴，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不要脱离群众。

“看什么，脚脖子都长胖了， 还说我缺营养？”

毛泽东的生活一向十分俭朴，不管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毛泽东常说：人吃五谷杂粮和粗菜淡饭，能通便畅气。战争年代，他同广大战士一样，吃野菜粗粮，甘之如饴；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物质条件丰厚多了，但他的生活依然俭朴如故，饮食上他严格要求四菜一汤，除了猪肉定时定量，平时吃得最多的是家常蔬菜。他吃米饭也“特别”，米要求是农家人吃的糙米，做饭时还要掺小米、玉米、豆子等杂粮，有时还要求米饭内加进红苕。

60年代初期，我国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面临严重困难。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要勒紧裤带过日子，共同渡过困难时期。他自己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他为自己定下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毛泽东历来是“交待了的事情就要照办”。在那些日子里，他7个月没闻肉味，青黄不接时，20多天没吃过一顿细粮，有时工作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菠菜等。身边工作人员见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偷偷地给他做点好吃的，他知道后必定要严厉批评，并要工作人员把

菜退回去，谁劝也不听。

由于他过度劳累，加上缺乏营养，结果身上出现浮肿，浑身酸软无力。一天晚上，工作人员给他做睡前按摩，脚脖子小腿骨皮肉处，用手指按下去就一个坑，起不来。

“主席，您太缺营养了。您看……”卫士忧虑地说。

“看什么，脚脖子都长胖了，还说我缺营养？”毛泽东随即接过话头说。

他这时虽已高龄，但仍不时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倾听群众的呼声，时时处处把群众的冷暖、痛痒挂在心中，带领广大人民乐观地渡过了艰苦的三年。



智慧 谋略篇

毛泽东幽默趣谈

“有钱龟孙不讲理”

毛泽东小时候对人就很有礼貌,但对于无理取闹的人,却力主治服。他常常对人说:“逢恶就莫乖,逢善就莫欺。”

一天,毛泽东从韶山到外婆家去,走到一个山谷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双手插腰拦住了去路。毛泽东抬头一看,原来是当地一个姓赵的富豪人家的子弟。毛泽东早就听说,这个人经常在穷人面前舞文弄墨,以富欺贫。

赵某横在路上,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子,傲慢地说:“我知道你是文家的外甥,今天要考考你。若能答得出,我就放你过去;若答不出,哼!就别想过去。”

毛泽东听了,也双手插腰,不慌不忙地说:“你爱问就问吧!”

赵某成心想难为毛泽东,就刻薄地说:“百家姓里的‘赵钱孙李’分开如何解释,合起来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稍加思索,便道:“赵公元帅的赵,有钱无钱的钱,有理无理的‘李’(理与李同音)。大宋天子赵匡胤说过:有钱龟孙不讲理!”

赵某听后满脸通红,他恼怒,但理屈辞穷,只得让毛泽东过去。小小年纪的毛泽东就这样巧妙地制服了这个霸道的恶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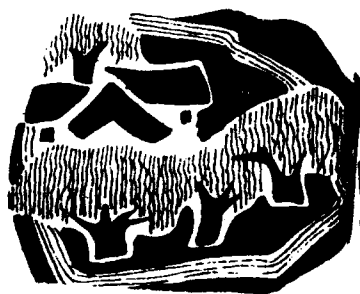
“台上握了手， 可不能在台下踢脚啊！”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同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先后担任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农工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等职。

孙中山逝世后，统一战线中国民党右派政治代表戴季陶等加紧反共宣传，为夺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制造反革命舆论。毛泽东、瞿秋白等中共代表，团结国民党左派，同戴季陶等国民党右派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6年夏，瞿秋白在上海同羊牧之（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谈过在国民党“二大”与戴季陶交锋的一段趣闻。他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决议的休息时间，我和毛泽东等几位共产党代表正在凭栏远眺，刚好戴季陶等几个顽固派人物也上楼来。我出于礼仪，主动上前和他们握了手，毛泽东当然也去逐个握了手。但与戴季陶握手时，毛朗笑着说：‘台上握了手，可不能在台下踢脚啊！’弄得戴季陶十分尴尬。”瞿秋白接着说：“我与毛泽东接触不多，但就在几次

不多的接触中,我确认他是一位既有原则又讲策略的党的优秀工作者。”



“这次我们说不定 还要有劳蒋委员长哩!”

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家。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玩敌于掌上，以自己的军事艺术谱写了许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篇章，留下了许多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的千古绝唱。其中四渡赤水之战，便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

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占领遵义。接着，在遵义召开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转折性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长达4年之久的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此后，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军事指挥。

当时，蒋介石为了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东出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调集40万兵力，从四面八方方向遵义地区进逼包围中央红军。敌情严重，中央红军向西一渡赤水，准备相机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敌人发现我军意图后，立即调动兵力在长江设防。毛泽东避实击虚，当机立断，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折师向东，从太平渡二渡赤水河，向贵州敌军兵力薄弱的桐梓、遵义地区进攻，组织了著名的遵义战役，再占遵义。5天击溃、歼灭敌人20个团，俘敌

3000多人，夺得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利，改变了被动局面，使我军士气大振。

蒋介石闻讯又重新调整部署，实行南北夹击，并采取堡垒战术，企图歼灭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毛泽东将计就计，指挥红军伪装在遵义地区徘徊，以吸引更多敌人前来围攻。当敌人逼近时，又在茅台镇及其附近地区三渡赤水河，转兵向西，又以一支小部队摆出渡江北上态势，将敌之主力引至赤水河西，待敌军聚集川南之后，红军主力却又向东，从二郎滩、太平渡等渡口第四次渡过赤水河。之后，又以少部兵力大张旗鼓地摆出东进湖南之势，主力则南渡乌江，直逼贵阳。此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急忙调动云南的滇军“保驾”。这正是我军的意图，红军乘云南空虚，直奔昆明，如入无人之境，连克数地，敌又慌忙调兵回滇。此时蒋介石集团一片混乱，完全搞不清我军的意图，在我军忽东忽西的进攻下各路人马只求自保。于是我军主力乘机挥师北上，待敌发现回头直扑金沙江时，我军已渡过金沙江，跳出了十多倍于己的敌军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

红军三渡赤水河时，原人民解放军上将、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同志在红一军团任教导营营长。奉朱德、毛泽东的命令在赤水河东岸的茅台镇附近架两座浮桥。当中央和军委首长们通过浮桥时，毛泽东见到陈士榘等，便打趣地说道：“你们有办法，喝了茅台酒，架了茅台桥，我们都过了茅台瘾。”然后他自信地说道：“现在是三渡赤水，要把滇军调出来，调出滇军就是胜利。这次我们说不定还要有劳蒋委员长哩！”

当时陈士榘同志并不完全明白毛泽东“有劳蒋委员长”的含意，待我军三渡赤水，再入川南，敌人以为我们要北渡长江，

便调集兵力向我逼近,但我军又突然折回贵州,于太平渡四渡赤水,直逼贵阳。这时,蒋介石十万火急地命云南省主席龙云率滇军前来“保驾”,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布防。这时,“我们才真象大白,原来调出滇军果真还是蒋介石帮了忙。我激动不已,不禁扼腕叫绝,毛泽东真是‘料敌如神’,不仅在调动蒋介石的几十万部队,而且连蒋介石也调动起来了!”



“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 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

俗话说，有心处处皆学问。毛泽东就特别善于从周围的事物中发现有价值、对革命事业有启发的东西。例如，陕北毛驴很多，毛泽东从陕北老乡赶毛驴上山的办法上，联想到许多。

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有一次毛泽东来到红军大学作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毛泽东先着重阐述了释放蒋介石对于避免内战、促蒋抗日的重要意义。台下有人提问：如果蒋介石不谈判，不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主张怎么办？蒋介石心狠手毒，毫无信义，放了他，他会抗日吗？

毛泽东听后说道：“你们看，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当然喽，要拉得很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了。西安事变就是这样。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是既联合又斗争。”

“不相信试试看，谁敢同这个 ‘肚先生’较量较量！”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是全国爱国青年最向往的地方。抗战爆发后，随着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形势的发展，大批爱国青年从全国各地千里跋涉来到延安，进入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抗大、鲁艺、陕北公学等院校学习。大批爱国青年的到来，使延安的人口猛增，到1938年秋，新来的人口已达到当地原有人口的3倍多。人口的巨增，使得延安的粮食供应发生了很大的困难。为了减轻延安人民的负担，中央决定把一些院校分散到延安以外的地方去办。

对党中央的这一决定，一些青年同志开始有些不大理解：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延安，来到党中央身边，怎么一到这儿就叫离开呢？他们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提出这样的问题。

1938年8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到军政大学讲课。讲课之前，毛泽东说先给大家讲一件“小事”。于是，他针对青年同志们提出的问题，给大家作了一番风趣幽默的解释。

毛泽东说：“对你们提出的问题，我说对呀！中央的许多同志也很同情这些同志的想法。”他话锋一转说：“但是，就那么一个人不同意，整天叽哩咕噜的。这个人是谁呢？”毛泽

东故意停顿一下。“这是谁呢？”大家面面相觑，一时猜想不出来。毛泽东接着风趣地说：“这个人就是‘肚先生’，也就是你们的肚子罗！”一句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你们别笑了”，毛泽东又接着说：“不相信试试看，谁敢同这个‘肚先生’较量较量？中国古代有一个道学家叫老子，他非常信这个邪。他说：‘民以食为天。’我说是吃饭第一。”接着，他把话转入了正题，说：“我要讲的‘小事’，就是动员同志们去洛川‘就食’。把饭吃饱，解决‘肚先生’问题。所谓‘就食’，就是古人所说的‘就粮’，也就是把人带到积粮甚多的地方去找饭吃！……今天，我们党中央也学点古人的做法，动员同志们去洛川‘就食’。其目的就是让大家吃饱肚子，学习好，训练好，做好抗日的准备。”

毛泽东的这番动员，语言风趣幽默，道理实实在在。在笑声中，大家思想都通了。当毛泽东最后问大家：“你们说，该去不该去呀？”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说：“该去！该去！我们一定去！”

“中国好比一加仑的水壶，日本好像 倒进水壶中的半品脱的水”

抗日战争刚爆发时，面对武器、装备和经济条件都比中国军队强大得多的日本侵略者，许多人都担心中国能不能战胜日本鬼子，包括一些同情中国抗战的外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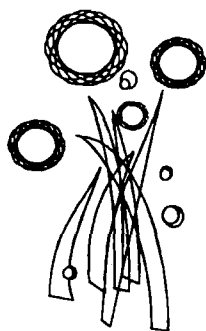
而那时，毛泽东就断言，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定会取得胜利。这是为什么呢？

1938年美国前海军参赞卡尔森，就带着这个疑问，不远万里来到延安，访问毛泽东。

毛泽东告诉他：“中国好比一加仑的水壶，日本好像倒进水壶中的半品脱的水。日本军队走到一处，我们就走到另一处；当他们追逐我们，我们就跑回来。日本军队没有足够力量占领全中国，而且只要人民决心抗战下去，日本就不可能在政治上控制中国。”停了停，毛泽东补充说：“他们最大的错误是他们的军队对中国人民采取的态度。他们焚烧房屋，奸淫妇女，屠杀百姓，只能激起人民的公愤，加强人民抗战的决心。”

毛泽东一席幽默而深刻的话语，一下子驱散了卡尔森心头的迷雾。他到山西、河北看到八路军、游击队和民兵，利用各种巧妙的人民战争的战法，卓有成效地抵销了日本所拥有

的现代化战争武器的优势,更坚信毛泽东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必胜的结论。后来卡尔森把他的所见所闻,连同他的结论报告给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使罗斯福不能不信服,从而增强了对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心。



“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 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为了同国民党政府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赴重庆谈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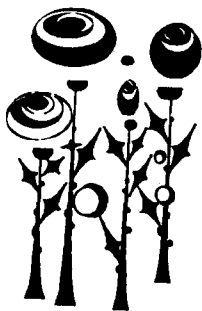
在重庆时，毛泽东除参加谈判外，还亲自同国民党的各种人物接触，包括跟顽固派头目打交道。他提出要见陈立夫、戴季陶等国民党右派。

对毛泽东要见陈、戴等反共专家和顽固分子，工作人员都感到很意外，不好理解，跟他们有什么好谈的呢？毛泽东向大家解释说：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

同国民党右派分子怎么谈呢？毛泽东与陈立夫一见面，先从回忆往事开始，谈起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批评国民党背叛革命，实行反共剿共的错误政策。他略带风趣和讽刺地说：十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一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毛

泽东还谈到,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

毛泽东谈的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却谈笑自若,有时讲得很幽默,对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政策给以巧妙的批评,没有使人感到紧张的气氛。面对毛泽东坦荡的胸怀,机智的议论,陈立夫虽然感到有些窘迫,却并不显得难堪,由于理屈词穷,他也不得不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



“你们总不能只请客，不请菜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局势将如何发展？中国共产党力争避免内战，争取经过和平的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蒋介石却坚持独裁和内战，消灭共产党。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反战情绪，不能不使蒋介石有所顾忌，加之此时他的军队还远在西南、西北后方，有的嫡系部队还远在缅甸、印度，要把全部军队运到打内战的前线，尚需要一段时间。于是，蒋介石在加紧准备内战的同时，向中共摆出一副“和平协商”的姿态。

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官长吴鼎昌竭力向蒋介石建议，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他们的算盘是这样打的：如果毛泽东不来，就可以借机宣传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把内战的责任推卸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来了，也可以利用“和平谈判”来麻痹共产党，取得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内战。蒋介石感到这实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策。于是，在8月14日到23日不到10天的时间内，蒋介石连续给中共发了三次“万急”电报，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

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和平有着真诚的愿望，对局势也有清

醒的认识。中共中央认为,无论如何,在当时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是必要的:一是有利于准备自卫战争;二是可以通过和平谈判,使全国人民看清楚国民党是真要和乎民主,还是在这个幌子下实行独裁内战。经过多次商量,8月25日晚,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8月28日,毛泽东等三人在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 and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乘飞机抵达重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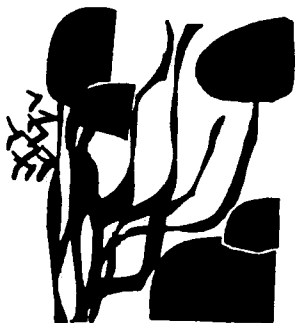
毛泽东到达重庆进行谈判,使蒋介石感到措手不及。在8月23日他向中共发出电报时,还对心腹们说:“毛泽东不会来重庆同我谈判。他不来,说明他蓄意作乱,我就明令讨伐;他若真来了,我们则可利用和谈拖延时间,挥兵北进,把他们包围的包围,消灭的消灭。到那时就有毛泽东、周恩来的好戏看了。”因此,他根本没有准备和谈,也不愿真心同中共进行谈判。但毛泽东已到达重庆,这次是非谈不可了。

29日清晨,蒋介石急忙将张治中、张群、王世杰、邵力子等人召来,商讨谈判中的应对之策。鉴于事前毫无准备,且周恩来又是谈判老手,为避免造成被动,蒋介石匆忙确定了以首席代表张治中为首的谈判班子。

接着,蒋介石偕同张治中、邵力子等人在林园客厅里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就谈判问题进行了初步商谈。周恩来首先就整个谈判程序发表了我党意见。蒋介石听后只重谈中国无内战的老调。毛泽东列举了中国内战和抗日战争中的大量事实,说无内战是欺骗,蒋介石听后只是默不作声。由于蒋介石对谈判毫无准备,临到谈判时竟拿不出任何方案。对此,邵力子辩解说:“国民党没有提出具体方案,是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倘若政府先提具体方案,也许使中共方面认为政府已有

一种定见,而有碍于会谈的进行。”邵力子的辩解,显然是在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寻找下台的借口。

对此,毛泽东幽默地讥讽道:“你们总不能只请客,不请菜啊!”



“你们不管我们的饭， 我不起炉灶怎么办？”

1945年9月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就和平建国等问题直接同蒋介石进行谈判。具体的谈判，由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的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进行。

谈判中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问题上。蒋介石企图在“统一军令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关于军队问题，蒋介石只允许中共军队之编制以12个师为最高限度；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提出具体方案，经双方商讨决定；承认解放区问题，蒋介石竟宣称“绝对行不通”。显然，中共是不会接受如此苛刻的条件。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周恩来等经过周密研究，决定对解放区的范围和人民军队的数量等问题做出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必要的让步。关于军队问题，中共认为，在八年抗战中做出重大贡献的解放区军队应该得到合理的编制，国民党军与中共军队之比数为5:1，即国民党军现有263个师，我方应编为43个师。关于军队驻地和解放区，我方将军队调往山东、河北、陕甘宁等北方地区。尽管如此，国民党仍不肯接受，

执意要取消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

谈判桌上，国民党代表妄图用“统一政令”、“统一军令”两把刀子砍掉人民军队和解放区。谈判桌外，蒋介石磨刀霍霍，加紧布置军事进攻，企图以武力迫使共产党就范。同年8月底，蒋介石密令阎锡山调集3.8万人，结合敌伪军13个师，向晋东南解放区上党地区大举进犯。为此，毛泽东电示延安总部，必须站在自卫立场，给来犯者以迎头痛击。

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奋起自卫反击，一举全歼进犯之敌。

上党战役的胜利，挫败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许多著名民主人士得知这一消息后，也纷纷指责国民党谈判代表。蒋介石一看对共产党来硬的一手不行，只好继续施展其软的一手骗人的伎俩。

9月12日中午，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共进午餐。餐桌上的菜肴颇具匠心，既有毛泽东喜爱吃的湖南辣菜，也有赫尔利喜欢吃的西式餐点。毛泽东看到如此丰盛的午餐，便风趣地说：“这可是‘中西合璧’啊！”接着，蒋介石举杯向毛泽东敬酒，两人碰杯一饮而尽。饭后，毛泽东与蒋介石就两党合作问题继续进行谈判。蒋介石仍然提出要中共改变国内政策方针，放弃军队和解放区。毛泽东当即给予反驳，明确表示坚持已提出的让步方案。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针对陪同的国民党政府官员叫嚷“你们不要另起炉灶”的论调，尖锐地指出：

“不要另起炉灶的话我很赞成，但是你们得要管饭。你们不管我们的饭，我不起炉灶怎么办？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你们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

三个星期的谈判,由于中共方面的诚意并作了巨大让步,从而赢得了国统区广大人民和中间力量的同情和支持。然而鉴于照原样谈下去已难有成效,21日会谈无果,中共代表不得不中断同国民党代表的谈判。周恩来向社会各界广泛解释中共主张,说明导致谈判陷于僵局的真相,使国民党政府处于被动。3天后,重开谈判。谈判中由于中共的让步与努力,加上全国人民的强大舆论压力,10月10日下午,国共双方代表在林园客厅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议纪要》,即双十协定。11日上午,毛泽东在张治中陪同下乘飞机回到延安。



“高点，再站高一点”

1947年7月中旬，正是陕北战场出现很复杂局面的时候。敌人凶焰万丈，胡宗南的钟松所属的十几万国民党军，自榆林南下，向我军节节进逼；刘戡统辖的7个旅的兵力，又自西向东，穷追不舍，妄图在两股军事力量的分进合击下，把只有两万多人我西北野战军主力赶到黄河边上，然后聚而歼之。

全国各战场我军指战员都以十分焦虑的心情关注着陕北战局的变化，关心着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

就在这时，毛泽东电令陈赓由晋西南赶来陕北。

陈赓到了陕北某地毛泽东住处报到。毛泽东迎他进屋坐下，两人边看军事地图边研究起来。毛泽东慢悠悠地对他说：“往远看，要往远处看。指挥员指挥战斗要站得高嘛。”

接着，毛泽东将手一抬，说：“高点，再站高一点。”

“主席的意见是……”陈赓的手指在地图上沿“黄河”移动。

“这里！”毛泽东将他的手指按在地图上的陕州与洛阳之间，“项羽破釜沉舟之处。”

陈赓略作思索，脱口叫道：“好棋！东可以威胁洛阳，牵制

敌人兵力,支援刘、邓大军南下;西可以威胁西安,调动陕北之敌回援,使敌人陷入被动。主席这一着棋,全局都活了。”

后来军事形势完全按照毛泽东的安排和预想发展着。8月22日,陈赓兵团以排山倒海之势,在陕州、洛阳之间强渡黄河。这一着棋果然灵,刘、邓大军解除了侧翼的压力,一路长驱直入南下。胡宗南的兵力被西北野战军吸引在北线,后方空虚,如今陈赓向南猛杀过去,胡宗南十万火急命令刘戡南下回援。我西北野战军乘机出动,结果刘戡丢盔卸甲逃之夭夭。



“蒋介石飞到沈阳，这下子 我们胜利就更有把握了”

1948年9月，辽沈战役第一阶段的战斗正在东北锦州外围激烈地展开。

这时毛泽东已到河北西柏坡了，毛泽东为指挥辽沈战役取得胜利，已十几个昼夜不得安眠。忽然接到前线发来的电报：蒋介石亲临沈阳指挥作战。毛泽东手拿电报，笑着说：“蒋介石飞到沈阳，这下子我们胜利就更有把握了。”

这不无讽刺而又非常正确的话语，把毛泽东周围的参谋、秘书们全逗乐了。

翻开解放战争的历史记录，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有趣的现象：蒋介石飞到哪里，哪里就准打败仗。

1947年6月，我刘、邓大军在鲁西南强渡黄河，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反攻行动。过黄河后，刘、邓故意在鲁西南停留近40天，目的是尽可能地把挺进大别山所经地区的敌军调到鲁西南来，为下一步行动清道。

蒋介石看到刘、邓突破黄河防线，又是紧张又是激动，于7月11日亲自飞到开封，下决心与刘、邓决战。他匆匆从陇海路、津浦路和豫、鲁等省调来主力33个旅，摆开决战架势。

蒋介石的这一调动，正附合毛泽东的意图。刘、邓看目的达到，于8月7日分三路向大别山挺进。11日跨过陇海线，17日通过黄泛区，18日渡过大沙河。至此，蒋介石才恍然大悟：刘、邓急速南下，并非败军夺路南窜，而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向大别山挺进。感叹若有所举措，为时已晚矣。

1948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指挥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了空前规模的辽沈战役。

事前蒋介石认为，战事会先在长春、沈阳进行。因为锦州不但有范汉杰指挥的15万重兵把守，还能取得关内源源不断的接济，解放军必不敢来。

而解放军却置长春、沈阳于不顾，主力部队快速南下，切断了锦州与山海关、锦州与沈阳之间的联系，将范汉杰15万守军分割包围。

蒋介石慌忙飞往沈阳督战。他将沈阳的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架空，命令副司令廖耀湘组成援锦西进兵团，由蒋直接指挥。

毛泽东由此而说，蒋介石飞到沈阳直接插手东北战事，“我们的胜利就更有把握了”。

果不其然，10月2日蒋介石飞抵沈阳，10月15日锦州就被我军拿下。

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毛泽东算是把蒋介石的那两下子摸得一清二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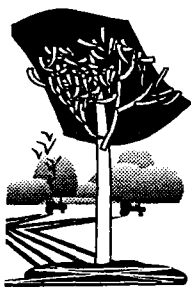
“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 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 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

在战争年代里广为流传的《游击队之歌》唱到：“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首歌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从敌人那里夺取武器、弹药和给养，然后再打击敌人的状况。毛泽东就曾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风趣地说道：“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

爱吸烟的毛泽东在战争年代里就常抽缴获敌人的烟。从前线下来到毛泽东处汇报情况，听取指示的各战区首长们，就喜欢给毛泽东捎来缴获敌人的好烟，如筒装的“三五”牌烟，被称做“高级胜利品”。这时，毛泽东就爱风趣地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运输大队长，不仅为我们提供武器，还提供“三五”烟，这是洋货，不吸对不起蒋委员长啊！

在西柏坡时，毛泽东曾准备到苏联去一趟。当时卫士们不知道毛泽东去的目的是希望苏联“带个好头，承认我们的新

政府”，还以为是要让斯大林多援助我们一些武器，早点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当时毛泽东听了卫士李银桥的话哈哈大笑，说：“叫斯大林援助武器就不如叫美国多援助蒋介石了。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给我们送武器不要收条，也不要钱，那多好呀。”说得大家都笑了。



“我们那样想，他(胡宗南) 就那样办，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胡宗南部15个旅14万人，加上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部12个师，榆林第二十二军两个师为策应，共34个旅，25万人，分左、右两大集团，在100架左右飞机的狂轰滥炸支援下，向延安发动了猛烈进攻，一时凶焰万丈，不可一世。他们企图一举消灭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和西北解放军。而在陕北的西北解放军只有6个旅两万多人，敌我兵力对比为10:1。

可是第一仗，我军在青化砭设伏，歼敌三十一旅的4000多人，活捉了旅长李纪云。第二仗羊马河全歼敌第一三五旅近5000人。第三仗我军收复蟠龙，全歼守敌7000多人，活捉敌旅长李昆岗。第四仗沙家店战役，全歼钟松三十六师。沙家店战役后，进攻陕北的几十万国民党军立刻像雪崩似的垮下去。最后我刘、邓大军、陈赓兵团，像两把利剑，以排山倒海之势突破国民党黄河以南的防线，直插敌人心腹之地，把主战场从解放区转移到敌占区去。胡宗南眼看西安难保，十万火急命令已被陕北我军磨盘战术拖得焦头烂额，又被我军打成惊弓之鸟的刘戡所部迅速南下回援。刘戡的部队接到命令后

如逃离鬼门关一样争先逃命，咸榆公路一时被溃兵堵塞，竟有拿机枪扫射开路，踩着自已士兵尸体逃命的军官。我军立刻对逃敌展开了猛烈追击。

陕北战场这几场漂亮的歼灭战，都是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取得的，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范例。

沙家店战役结束的当天，毛泽东在向有关各战区各野战军下达命令后，又匆匆赶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慰问彭德怀总司令员、习仲勋政治委员和西北野战军的全体将士们。

“你们打得好呵！”毛泽东老远见到彭老总就大声夸赞着。前来迎接的将军们都抢上前来同毛泽东握手说：“主席，您可是累瘦了！”

“瘦了好，少负担，走路方便。”

“主席呵，你们几次遇险，我们可真担心呢！”

“我有险没有危，倒是你们侧水侧敌，兵力比敌人少得多，万一打了败仗，陕北战争的胜利就要推迟了。”

“那也不怕！主席讲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路敌人是比不过我们的，拖也把他拖死！”“有毛主席指挥，我们怎么会打败仗呢！”

毛泽东笑了，说：“胡宗南是个没有本事的人，阴险恶毒，可惜志大才疏。”

“他也有本事呢，他的本事就是一切照毛主席的计划行动，决不走样。”大家哄然大笑。

在大家的笑声中，毛泽东面露遗憾，像是惋惜那位西安的国民党司令长官：“我们那样想，他就那样办，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将军们围在毛泽东周围，发出一阵更开心的笑声。

“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

1949年4月上旬，我百万雄师聚集长江北岸，只待毛泽东一声令下，立即打过江去，解放全中国。蒋家王朝的末日来临了。

这时，南京政府派到北平的和谈代表也坐立不安，他们自己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4月8日和以后的几天里，毛泽东分别接见了国民党和谈代表。

在接见刘斐先生时，毛泽东询问了他到北平后的生活情况，然后问：“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我是湖南醴陵县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刘回答。毛泽东笑到：“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

刘斐听着毛泽东亲切而幽默的话语，紧张的心情减去大半。他说：“蒋介石打不下去了，让李宗仁出来搞和谈，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毛泽东说：“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又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毛泽东扳着手指说：“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

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平，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

说到这里，毛泽东走到刘斐面前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心和谈，我们共产党人说话是算数的，是守信用的。”讲到《国内和平协定》，毛泽东问：“这个协定你们都同意吗？”刘斐说：“总的我们是同意的，只有前言中说蒋介石是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这句话，虽然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就怕李宗仁签字有难处，因为他是个空架子，蒋介石背后捣鬼他吃不消。”毛泽东听后笑着说：“好，看你们的情面不写罪魁祸首，那就写上个元凶巨恶，你们看怎么样。”在坐的一听都哈哈大笑起来。刘斐心里称赞，毛泽东对蒋介石的看法真是入木三分。

会见后毛泽东留刘斐他们吃饭，边吃边谈。当说到个人爱好时，刘斐趁机将自己一直疑虑的一个心事试探毛泽东，他说：“您会打麻将吗？”

“晓得些，晓得些”。毛泽东回答说。

“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

毛泽东听了差点失笑喷饭，一下子就明白了刘的话中话，立即说：“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毛泽东如此机敏的思维，如此宽阔的心胸，使刘斐等人倍加叹服，这寓意弥深的回答使刘斐顾虑皆释，坚定了他选择新道路的决心。

“蒋介石很坏， 外国人要他，我们还不给呢”

曾在 50 年代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兼生活秘书的王鹤滨回忆说：有一次，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进行争论。李讷就问毛泽东：“爸爸，蒋介石是不是中国人？姐姐说他是中国人。”毛泽东认真地回答说：“蒋介石是中国人。”李讷不服气地说：“蒋介石那么坏，他还是中国人？”毛泽东说：“蒋介石很坏，外国人要他，我们还不给呢。”当时大家对毛泽东这么说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直到后来我们炮击金门、马祖时，才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原来，美帝国主义老想霸占我们的台湾，我们炮击金门，一方面教训蒋介石集团对中国大陆沿海的骚扰破坏；另一方面也向世人宣告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蒋介石虽坏，但我们更要警惕帝国主义及台湾某些人，企图把台湾从祖国领土分裂出去的险恶用心。

求是 存真篇

毛泽东幽默趣谈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思想方法。毛泽东自己就是坚持这样做的。不过贯彻这一思想，有时也要冒许多风险。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中。中央八七会议制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同时指示中共湖南省委，在全省发动秋收暴动。当时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参加了8月中旬召开的湖南省委讨论暴动的会议。

会上许多同志都主张按照中央指示，在全省同时发动秋收暴动。毛泽东却表示反对，他说：我赞成这次起义，但不同意在全省同时起义。当前敌我力量对比是敌强我弱，我们不能不顾主客观条件，轻敌盲动，分散使用力量。应该先在群众条件好的湘赣边界发动暴动。

这时有人插话：“在全省同时发动暴动，这可是党中央的指示啊！”

毛泽东笑了笑，诙谐地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我们应从实际出发，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我们的行动方针。”

在毛泽东这一正确主张指导下，湖南省委于1927年9月9日成功地发动了震惊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暴动。

“谢谢‘蒋委员长’给我们上课”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深刻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意义。他在《实践论》一文中已经系统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还与人讲到自己的认识就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在总结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经验中积累和发展深化的。

他说：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上了7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我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我搞军事更是这样。我当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的宣传部长，在农民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次大败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16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这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毛泽东说，谢谢“蒋委员长”给我们上课。也要谢谢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而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

毛泽东不但在战争问题上坚持实践第一、实践出真理、真

理要受实践检验的观点,而且在其他一切问题上都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他在1962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这样说过:“如果有人,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要真正学好打仗,最重要的还是从战争中学,从实践中学。我们干一切工作,干社会主义事业,也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才能有所成就。

“要懂得,吃小米、爬大山, 这就是革命,这就是马列主义”

马列主义不仅是个理论的问题,而且是个实践的问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是真搞马列主义。这个道理对当时“抗大”的新学员来说,还是陌生的。

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城东南角,高高的院墙里围着一幢幢瓦房,这里就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大队的住地。那些朝气蓬勃的青年男女,就是刚入校的第三期学员。

夜里,面对即将开始的学习生活,大家有些激动,睡不着,互相嘀咕着在这里将学到什么?

有人说:“首先当然是学马列主义。”

立刻有人问:“什么是马列主义?”

沉默一会儿,有人含含糊糊地回答说:“唯物论、辩证法、科学社会主义……”

“说具体点嘛。”

“唉,听说那是很深奥的……。”

过了几天,有一次全校集合,副校长罗瑞卿大声宣布:“现在,请毛主席给我们讲话!”

随着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健步走到队前。他一身旧灰布

军装，胳膊肘上有一大块补丁。他微笑着扬起右手，缓缓向四周指点着说：“你们别瞧不起延安城，这清凉山，知道么，宋朝那个杨六郎还曾在这里‘坚持抗战’呢！”

毛泽东这句话是有所指的，因为王明等人就曾经瞧不起在农村的武装斗争，他们说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他们才是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而他们所搞的教条主义几乎葬送了中国的革命。毛泽东的讲话引起了青年学员的极大兴趣。

讲话中毛泽东走到几名青年学员面前问：“你们会不会吃小米呀？”

“会！”响亮地回答。

“会不会打草鞋呀？”

“会！”

“会不会爬山呀？”

“会！”

“好！”毛泽东笑了笑，说：“能吃小米，会打草鞋，会爬山才能算抗大的学生。”毛泽东的目光朝全体学员一扫，提高了声音，“要懂得，吃小米、爬大山，这就是革命，这就是马列主义！”

“这里叫教条主义休息， 有些同志却叫它起床”

刘少奇在《论党》中谈到毛泽东的文章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并“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成为中国人民的战斗武器。事实也是如此，毛泽东一贯倡导文章的通俗化，强调要写得准确、鲜明、生动。他认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联系实际，干部联系群众的作风的表现。

从1942年春天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一次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为开展整风运动，肃清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影响，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讲演。这些文章和讲演不但道理深刻，而且语言风趣幽默。

比如，他在1942年2月，在延安干部会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他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瞧，“最

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这些语言多么形象生动，好像我们眼前看到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凶恶的怪物一样。

毛泽东的讲演还指出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

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

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

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人家哪里会懂呢？‘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

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

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你们去看一看中药铺，那里的药柜子上有许多抽屉格子，每个格子上面贴着药名，当归、熟地、大黄、芒硝，应有尽有。这个方法，也被我们的同志学到了。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 ABCD，小 abcd，还有阿拉伯数字，多得很！幸亏古人和

外国人替我们造好了这许多符号,使我们开起中药铺来毫不费力。”

第六条罪状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拿洗脸作比方,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们看,这是何等地有责任心呀!我们写文章,做演说,只要像洗脸这样负责,就差不多了。”

第七条罪状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

第八条罪状是: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党八股里面藏的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毒物,这个毒物传播出去,是要害党害国的。”

毛泽东还讲到:“这里叫洋八股废止,有些同志却实际上还在提倡。这里叫空洞抽象的调头少唱,有些同志却硬要多唱。这里叫教条主义休息,有些同志却叫它起床。”他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像《反对党八股》这样观点鲜明、深刻,语言生动、幽默,充满战斗性,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与中国语言、文章的民族特色融为一体的讲演及文章,在毛泽东著作中还有很多。真理的力量,再加上毛泽东文章的风格的魅力,确实给中国革命的发展以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 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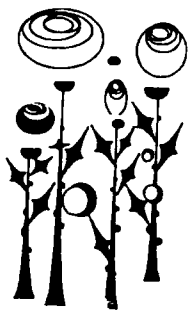
毛泽东十分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

王明是对中国共产党起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他在本世纪30年代犯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曾长期影响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曾说过：“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4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搞垮了百分之百。”

在抗日战争时期，王明又从“左”倾跳到右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系统地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并在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期间，推行这一投降主义，又给党的工作造成损失。

在党史上对王明这样的人物应当怎么看待呢？1956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这样对他们说：“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还说：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

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风趣与幽默，是毛泽东写文章与演讲、论证事物的一大特色。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者长期拒绝毛泽东等人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中国革命的经验，只知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用以吓唬人们。这种教条主义曾经使得中国革命受到极大损失。

为了帮助人们认识教条主义的危害，揭示其错误的性质及原因，毛泽东于1937年7月发表了著名论文《实践论》。

他在文章中，以风趣幽默的议论，讽刺了所谓的“知识里手”。他说：“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还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毛泽东另一篇哲学名著《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这样开头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多么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实践的重要性啊。

教条主义之所以会给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危害,是因为它对实际情况不去调查研究,唯书唯上,犯了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主观主义的错误。这并不是说就不要书本知识。为了说明书本知识与实际的关系,毛泽东在1942年2月做了这样的演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

在同一篇文章中,毛泽东还揭示了教条主义的危险性。他说:“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

关于如何不被教条主义俘虏,如何不犯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指出,关键是要多实践,多做调查研究。他说:“你对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

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么,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平呢?”

毛泽东以生动的比喻,风趣的笔调,说明了实践的重要性,以至于像“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论断,都成了广为传播的人们喜爱说的格言。



“不能把自己的 脑袋长在别人的脖子上”

毛泽东任何时候都要求实事求是,独立思考。

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次,他在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王方名谈话时,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

他说:中国革命开始时很困难,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严重损失。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的局面。

毛泽东接着说: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后来我会见了阻止我们过长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责备的。

毛泽东最后概括地说:可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胜利。领导革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千万不能把自己的脑袋长在别人的脖子上。

“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

1958年8月13日，大跃进的高潮中，毛泽东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同志和社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

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没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

他们坚持说，就是亩产10万斤，也是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朝水稻里吹风的办法才做到的。

毛泽东仍然摇头，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

有些同志为了证明亩产确是10万斤，就让小孩子往水稻上站，说能站在上面。

毛泽东一语双关地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可是，报纸上还是登出了亩产突破10万斤大关的消息。那些新闻记者们是很敢说敢吹的。有人敢写亩产突破2万斤大关，马上就有人敢写突破5万斤大关，接着就有人敢写突破10万斤大关。

讲假话，浮夸风，吹牛皮，放大炮，这些完全违背马列主

义,完全违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东西,不但坑害了当地百姓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也欺骗了毛泽东,给毛泽东提供了错误的情报,从而做出错误的决策。

后来,毛泽东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有些事瞒着我,我去哪里,他们都能作准备。了解不到真实情况,我就会犯错误。”

我们的各级干部,人民群众,新闻工作者,都应该牢记这个教训。



“大锅菜炒出来就是 不如小锅菜炒出来香么”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后，各地工农业生产放“卫星”的消息不断传来，全国上下一片沸腾。毛泽东对此虽然很高兴，但他对各地反映上来的惊人发展速度也表示怀疑。同时毛泽东也觉察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错误。于是决定到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实地考察，调查3省“大跃进”的实际情况。

1958年11月2日，毛泽东乘坐专列到达郑州。火车停下来后，毛泽东不顾长途劳累，立即在列车上接见了中共河南省委负责同志和中央办公厅下放干部工作团的领导。在听取了大家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辉煌成绩”的汇报后，毛泽东不放心地反复询问参加汇报的同志们：“有什么问题没有？不要只说成绩，我想知道有什么问题没有？”

连问了几遍，大家只是说好。毛泽东看不能从他们那里问到什么问题，就提出召开一个基层同志参加的座谈会。出乎毛泽东的意料，座谈会上，大家仍是一片声地说好。

这时，毛泽东扭头发现了中南海摄影组的胡秀云，便盯着她问：“小胡，你说说，有什么问题没有？”

胡秀云没有正面回答毛泽东的问题，他顺着别人的话说：“我看妇女挺高兴的。原来围着锅台转，现在吃食堂，解放了。”

毛泽东笑着又说：“你是不是吹牛呢？大锅菜炒出来就是不如小锅菜炒出来香么。”

毛泽东这句泼凉水的话，让大家都愣住了。在当时全国形势一片沸腾的情况下，毛泽东说的这句话如果换成别人说的，不仅会挨批，还可能被戴上右倾的帽子。

胡秀云大概是受了这句话的影响，忽然冒出一句：“我就是纳闷，怎么晚上亩产还是 400 斤，到早晨就成 1000 斤了？有些干部一个比一个能吹。”

场面一下子紧张起来。毛泽东扭过头来看看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又望望陪同他视察的谭震林，微笑着问：“你们到底是放卫星啊，还是在放大炮？”

这句看似玩笑的话一语道破了浮夸风的真实面目。

面对盛行的浮夸风、共产风，毛泽东十分忧虑。他既想保护广大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又不同意各级干部违背经济规律冒险蛮干。为了纠正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标志的“左”的错误，从 1958 年 11 月到 1959 年 7 月，在半年多的时间内，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两次中央全会，制定了一系列纠正“左”的错误的指示和政策。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1958 年底到 1959 年 7 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的错误。”这些指示和政策，受到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热烈欢迎。

“谎报只能骗人民， 不能骗敌人，敌人看了好笑”

1958年“大跃进”期间，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危害性很大的“浮夸风”，弄虚作假，谎报成绩，不说真话。“浮夸风”又助长了高指标和瞎指挥。

毛泽东发现了这个问题，十分生气，也很担忧。在讨论农业发展纲要新的四十条时，毛泽东说，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只能骗人民，不能骗敌人，敌人看了好笑。《人民日报》最好要冷一点。他还批评说：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做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报。当陈伯达吹嘘全世界的钢产量都比不上中国，河南日产生铁120多万吨，全国的生铁产量都赶不上河南时，毛泽东直率地说，你讲起来那么凶，他（指当时河南省委的一位负责人）是为了放卫星。真的那么多？我这个人是怀疑派。120万吨是哪一天？河南省委的负责人不得不当面承认，那是10月29、30、31日三天的产量。

1959年4月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前后，毛泽东觉察到，“浮

夸风”制止不住,是因为干部中存在着向上级不敢如实反映情况、不敢提出不同意见的问题。他发现: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于是,毛泽东提倡要有像海瑞批评嘉靖皇帝那样的勇气,并直接给省以下直到生产小队的各级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信》,着重提出讲真话的问题。

但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发生的“反右倾”斗争,打断了纠“左”的进程,不久前已被认识到的问题,仿佛又不成为问题了,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造成了更大危害。这个教训是应当牢记的。

“失散多年的 ‘孩子’终于找回来了”

1957年2月，福建省上杭县茶山公社官山大队一位叫赖茂基的农民，把自己珍藏了27年的一本油印的小册子，作为革命文物贡献出来，使这篇重要的历史文献重新问世。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地说：“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

这本油印的小册子就是毛泽东于1930年5月在寻乌县写的《调查工作》。

1930年5月，毛泽东经江西会昌来到寻乌县城，他利用红四军一、二、四纵队分兵寻乌、安远和广东平远做发动群众工作之机，在寻乌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工作。毛泽东之所以在此时此地调查，是因为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间，党内存在着的“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新的发展。为了纠正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的严重教条主义思想，引导人们从迷信外国经验的框框中解脱出来，毛泽东选定了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寻乌县城，进行实地调查。因该县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弄清了这个县的情况，周围各县的情况也就了解了。

毛泽东在县委书记古柏的陪同下，考察了寻乌城，并通过

古柏的介绍,认识了“县城通”郭友梅、范大明两位老先生。毛泽东掌握寻乌城的情况,大部分是由这两位老先生提供的。调查中,毛泽东采取了全方位的调查方式,对全城21个行业、131家大小商店的历史,以及全县7个区大中地主的剥削形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并召集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开了10多天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在总结调查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写下了《调查工作》(后改为《反对本本主义》)。这是毛泽东为反对教条主义所写的最早的一篇哲学名著,也是毛泽东所重视和心爱的。在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调查工作》一文写出后,于同年8月由中共闽西特委印成小册子,在苏区广为散发。由于反“围剿”作战频繁,环境恶劣,这篇文章手稿油印本大部散失,仅存的一本流入上杭农民赖茂基手里。赖茂基得到这篇著作后,冒着生命危险把它保存下来,直到1957年献出。毛泽东见到这篇阔别数十年的文章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1964年6月,《调查工作》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公开发表。在一份重新印发这篇文章的按语中,毛泽东还再三强调:这篇文章发下去时,主要是讲基本方法,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需要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万年还要进行调查研究的。

当时,为感谢这篇文章的保存人赖茂基,毛泽东曾专门指示接他来北京一叙,并参观游览。后因十年“文革”动乱,此事一直未办。直到1974年,有关部门又根据毛泽东指示,派人到福建上杭县查询赖茂基的下落,不料,老人已在一年前去世了。

“人和猪谁聪明?”

吴黎平是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译成中文的译者。在红军时期他就被调到中央工农政府做经济工作,当时毛泽东是中央工农政府主席。因为他是《反杜林论》的译者,所以毛泽东多次同他谈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到延安后,吴黎平又被分配在中宣部工作,编《解放》周刊,直到后来离开延安去敌后根据地,他前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有10年之久。他说:毛泽东像马克思、列宁一样经常说:人在工作中不可能不犯错误。我们要求少犯错误,争取不犯大错误。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对那些好心好意而犯了错误的同志,毛泽东总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教育,思想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毛泽东对于有错误而不改的人很气恼,也很惋惜。有一次,毛泽东问他:你说,人和猪谁聪明?他被问得莫名其妙,回答说:大概人聪明些吧!毛泽东说:不尽然。猪遇到障碍就回头;有些人,例如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犯了大错误,即使知道了也不改,岂不是比猪都不如。我希望别人不要学他们。人总要比猪聪明点吧!

“只有超过马克思， 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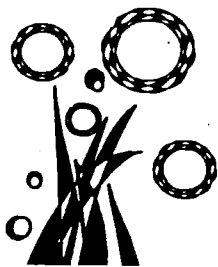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他要求大家抛弃贾桂式的奴才相，打掉“自惭形秽”的自卑感。又说，对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要学习，要尊重，但不要迷信。

当时，王任重在毛泽东这一思想的启发下，在这年夏季写了一篇题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发表了。文章在结尾部分还作了一个说明，说本来打算用“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这个题目，因为有的同志不同意，才用了现在这个题目。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论。1959年，王任重遇见了毛泽东，就这个问题请教毛泽东。毛泽东对王任重说道：“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王任重听了这话，深有感触。他理解，毛泽东这些话的意思，并不是要哪个人和马克思比高低，比分数，而是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总是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发展就是超过。牛顿是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如果当代人还只具有

牛顿那样的物理知识,就不能称之为物理学家了。对于马克思,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现在我们还是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重述 100 多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所叙述的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和他们对于某些具体问题的结论,我们就是盲目无知的傻瓜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如果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实践中提出的各种问题,都要到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中去寻找现成的答案,那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那就产生不了毛泽东思想。



“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

1965年7月26日，李宗仁先生（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夫妇和程思远先生回到祖国怀抱已经一个星期了。这天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他们并进行亲切的交谈。

交谈中，毛泽东问程思远先生的学历和工作经历，程先生扼要地说了。后来谈到美国，程先生说美国总统肯尼迪生前在办公桌上摆着一部《毛泽东选集》，看来他是要部下研究中国。有一个国民党人曾对程先生说过，他也用毛泽东思想办事，他把毛泽东思想概括成两句话：“调查不够不决策，条件不备不行动。”

毛泽东笑了，他忽然问程先生：“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

程先生茫然不明所指，回答说：“不知道。”

毛泽东接着说：“我是靠经验吃饭的。”又说：“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在每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认为，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人们的头脑里所固有的，而是从客观实践中来，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中来。所以，他一生都特别注重实践，注重调查研究，这就是他特别强调“我是靠经验吃饭的”原因。

“你们在家睡觉，让我在外面站岗， 风吹日晒雨淋，好不残忍！”

1970年3月，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同时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林彪集团把召开四届人大看成是抢班夺权的时机，妄想实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的企图。

被权力欲火攻昏了头脑的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夕，大造舆论，力图通过这次全会实现他们的阴谋。毛泽东早已觉察了他们的阴谋，他对林彪等人玩弄权术和攫取权力的企图非常愤慨。毛泽东说：“说我讲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一句，也有六万句，可他们就是不听，连一句也不顶。……搞那么多塑像，大理石的、花岗石的、不锈钢的。你们在家睡觉，让我在外面站岗，风吹日晒雨淋，好不残忍！”毛泽东这一番话语，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1970年8月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当林彪集团再次鼓吹“天才论”，坚持设国家主席时，毛泽东不但断然否定，而且首先对林彪的“吹鼓手”陈伯达“开刀”，开始了对陈伯达的批判。

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集团眼见形势对他们极不利，决心

铤而走险,策划武装政变,最终走上自取灭亡的道路。1971年9月13日凌晨,叛逃的林彪、叶群、林立果等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神州 沃土篇

毛泽东幽默趣谈

“‘工’‘人’两个字 连起来就是‘天’”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集中精力开展工人运动，先后组织发动了安源路矿工人罢工、长沙泥木工人罢工、粤汉铁路长沙段的工人罢工、长沙铅印、理发、缝纫、织造、陶业、人力车工人罢工等一系列罢工运动。

为了把工人们发动起来，毛泽东下工地、钻矿井，经常出入于工人中间，和他们谈心，交朋友，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生活。那时候，大多数工人没有文化，缺少知识，迷信思想很重。他们不知道自己受压迫、受苦难的根源是什么，只是埋怨自己命苦，“八字”不好。毛泽东了解了这些情况，决定开办工人夜校，一面教工人学些文化知识，一面向他们讲解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

毛泽东亲自到夜校给工人上课。他善于联系工人的生活 and 思想，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来讲明大道理，工人们都能听得懂，并留下深深的记忆。

一次，毛泽东去长沙人力车工人夜校去讲课。他大步走上讲台，先在黑板上写下“工人”两个大字，然后转过身来，对工人们说：好些工友埋怨自己命苦，说工人没出息，其实，说起

来工人的力量最大。他略一停顿,然后提高声音说,大家不是说天最大吗?什么是“天”?他停下来,用询问的目光望着台下的工人们。没有人回答。但看得出来,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在思索着“什么是天?”毛泽东侧过身来,指着黑板上写好的“工人”两个大字,说:“大家看,‘工’、‘人’两个字连起来就是‘天’”。他边说边把“工”和“人”两个字上下连起写出一个“天”字。

啊!工人们豁然醒悟,课堂上顿时活跃起来。

毛泽东指着黑板的“天”字启发工友们说,大家都说工人没出息的,我看工人是大有出息,关键是要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力量大如天。譬如一颗小石子,用脚一踢就踢走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粘成一块大石头,那就搬也搬不动了。

在毛泽东的启发教育下,工人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破除了迷信,萌动了要斗争、要革命的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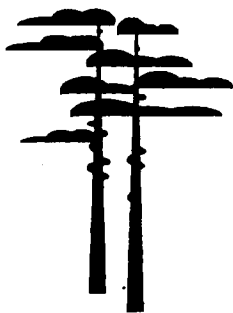
“叫化子打狗要靠墙，红军打敌人，要依靠根据地”

1928年一个初秋的早晨，毛泽东召集红军官兵讲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他说：“有人嫌井冈山大，今天东山，明天西山，爬山爬厌了，不愿意再爬它，想打到城市里去，这种思想错了。要知道，井冈山虽然它磨破了我们的脚，爬酸了我们的腿，但是，它给我们存粮食，给我们作根据地，便于我们机动，便于我们打击敌人。……所以说，这座山，它革命，这座山是革命的山。”毛泽东还幽默地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好比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

1931年夏天，国民党蒋介石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有些同志又主张放弃以东固一带为中心的河东革命根据地，把红军主力拉到河西（赣江以西）去，逃出敌人的围剿。毛泽东反对这种主张，他说：“要放弃河东根据地，只有36计用完了才可以走。叫化子打狗要靠墙，红军打敌人，要依靠根据地。”他还指出：“在强大的敌人围剿中，只

有依靠根据地人民的支援,选择有利的地形,高度集中红军的兵力,打敌人最薄弱的一环,才能取得胜利。”

在毛泽东正确思想教育下,红军依靠革命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并使根据地越来越壮大。



“这就是我们的风火轮”

毛泽东喜欢看《封神榜演义》，还喜欢运用里边的故事来教育革命战士。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由于敌人严密封锁，根据地物资供应很困难。许多战士鞋子破了，只好打赤脚。

有一天，毛泽东回到宿舍，房东谢慈俚老汉拿出一堆草鞋说：“毛委员，工农革命军来到这里，给我分了房子分了田，我没什么好东西，打了些草鞋送给咱部队表表心意。”

毛泽东一看心里一亮，对谢老汉说：“求你帮个大忙，收下我这个徒弟，教我打草鞋。”

“行啊，这点忙算个啥。”谢老汉当即答应，教毛泽东打起了草鞋。毛泽东本来就聪明，学得又认真，不大一会儿工夫就打出了第一只草鞋。

“老谢，你看怎么样？”毛泽东问。

“毛委员，这师傅我可不敢当了。”谢老汉看着打得细致结实的草鞋，开心地说：“这可真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了。”

毛泽东也开心地笑道：“我还要发动更多的战士来拜你为师哩！”

第二天，部队操练休息时，毛泽东把大家招拢来，笑咪咪

地说：“你们哪位看过《封神榜》啊？”战士们不解地看着毛泽东，还没回答，毛泽东又接着说：“那里面有个土行孙，身子一扭就不见了，他是钻到地里去了，在地下日行五百里。书里还有一个哪吒，脚踩两只风火轮，能打能走。我们大家也要学成这种本事。”

战士们一听都觉得奇怪，说：“人家都是成仙入道的人物，咱们这凡胎肉体哪能学来那种本事？”

“我能看！”毛泽东认真地说道：“只要我们做到两条就不难学会这种本事。”

他扒拉着手指头说：“第一，我们要到群众中去，把群众组织起来，用模范行动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能打也能走；有群众帮助，敌人找不到我们，我们却能看到敌人，这不就像有了土行孙的本事了吗？第二，我们要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说到这，毛泽东拿出他新打的那双草鞋，说：“这是我跟谢老汉学打的第一双草鞋，这就是我们的风火轮。稻草随处可见，大家抓紧空余时间向群众学习打草鞋，我们就能走遍天下，咱们的神话可就不比土行孙、哪吒小呢！”

毛泽东风趣的教育，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战士的斗志。部队积极向人民群众学习打草鞋，并开展群众工作，战胜了敌人的封锁和“围剿”。

“你没听说盘古时候，神农氏 为了给人治病，他尝过百草吗？”

1935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来到川西北草原。这片草原海拔在3000米至4000米以上，纵横几百公里，远远望去，像一片灰绿色的海洋。不见山丘，不见林木，没有村舍，没有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际。由于排水不良，滞水而成大片的沼泽，人畜在草地上行走，须脚踏草丛根部，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泥潭。

被饥饿困扰着疲惫不堪的红军战士，先是断绝了食盐，继之而来的是严重的粮荒。开始是每天两餐青稞，后来每人每顿只能有一小把青稞，其他只能靠采来可食的野草。草地行程未及一半，许多部队即告断粮。不少战士走着走着，突然倒在野草之中，就再也起不来了。

有一天夜晚，战士们在露营地点燃起一堆篝火。篝火旁围坐着经过一天艰苦行军、饥饿不堪的干部战士。这时毛泽东也走了过来，大家请毛泽东讲故事。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之后，毛泽东用生动风趣的语言，讲述了几年来红军同国民党军队作战屡克强敌的故事，使指战员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然后他说：“现在全军都在吃青稞混野菜，我们也要吃。你没听

说盘古时候，神农氏为了给人治病，他尝过百草吗？我们今天为了北上抗日，也得尝百草，也得吃点苦。吃苦是光荣的事，没有今天的苦，就没有明天的胜利。”

毛泽东讲完后，著名文学家成仿吾又讲了自己从一个留日、留德的知识分子，走上献身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道路。毛泽东和成仿吾的故事，使大家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发。

像这样的“篝火晚会”，在草地中处处可见。官兵们有的唱歌，有的讲故事，有的在吟诵着自己编的顺口溜和诗歌：“天当被，地当床，暴雨来了当蚊帐”。不知是谁，低声唱起了《国际歌》，随后大家跟着唱起来，由小到大，由近而远。飘动着的红色火焰，映红了夜空，映红了红军战士坚毅、兴奋的脸庞。阵阵歌声，冲破了长夜，汇成了一曲雄壮的大合唱，震撼着大家的心灵，激励着大家走出草地，走向胜利。

“如果你身上还没有虱子， 那你还没有理解中国”

1936年10月，在陕北保安秋意凉爽的日子里，毛泽东在窑洞中与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彻夜长谈。

毛泽东穿着打补丁的皱巴巴的布衣服，请斯诺吃夹红辣椒的馒头，一面谈笑风生，一面用手搓着脖子上的污垢，有时毫不在乎地松开裤腰带，伸手进去抓虱子。他对斯诺说：“如果你身上还没有虱子，那你还没有理解中国。”

是的，身上的虱子是与旧中国的本质特征有着重要的联系。从身上的虱子这一现象，可以更切身地感受到旧中国的贫穷、落后和黑暗。而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之所以意志那么顽强，斗志那么旺盛，革命那么坚定，理想那么崇高、伟大，就在于他们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把黑暗的中国变成光明的中国，就在于“穷则思变”。

毛泽东经不住斯诺的再三请求，谈了自己的生平梗概。其中有一段回忆，很能说明“虱子与中国”的关系。

毛泽东告诉斯诺，他于1912年7月，由于不满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的校规，加上所学课程不能满足毛泽东的求知欲，于是离开了一中，寄居于长沙城新安巷的湘乡会馆，开始了在湖

南省图书馆的自修生活。毛泽东踏进图书馆一眼就看见了墙壁上挂的一幅《世界坤舆大地图》。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看见世界地图。他在这张地图前站立良久，仔细观看，心潮起伏。他说：“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有多大。……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得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就更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这么大！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差不多！”

毛泽东告诉斯诺：“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上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世界上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人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路真长。从这时候，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是的，毛泽东手上抓的是身上的虱子，心里想的，是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世界穷苦的人。

“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 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时说：“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王明就是死的、臭的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王明1925年秋被党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但基本上不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不懂得中国的工人、农民。他回国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操纵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他自我标榜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认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只有工农和下层小资产阶级，其他一切阶级、阶层都“已转入反动的营垒”。他把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列，把它们都看成是革命的对象。他照搬共产国际的决议说：“在中国正在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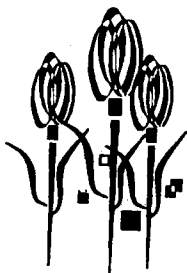
熟着新的革命运动,新的高潮最可靠的标志是工人罢工斗争的高潮”。因此在城市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认为准备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是共产党的最主要任务。他完全不懂得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作战和革命根据地发展的规律,指责毛泽东等人的军事思想和根据地建设思想是“右倾”。他不顾客观实际,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对怀疑、不满意或者不支持他那条“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路线的同志,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王明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

活的马克思主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讲到这个问题,他说:“还有一个十几年来争论的问题,就是从乡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乡村,争得一塌糊涂。正确路线是要先搞乡村,要研究农村情况。大家说这是正确的路线,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哪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当然在乡村尽走尽走。走他几百万年,这也不叫马克思主义,而叫反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现在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

毛泽东还举搞正规化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他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路线搞正规化就是死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内战”时期搞正规化,就是因为忘记了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用脚走的,子弹是会打死人的,他没有搞通这一点。军队不生产,专门吃老百姓的,吃上几个月,吃上一年,粮食吃完了,只好向后转,开步走,来个万里长征,

可谓‘英雄豪杰’。现在我们要集中更大的兵力，以多胜少，去打敌人薄弱的地方”，“就敌就粮”，此外还要转向正规化。

毛泽东关于我们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而不要臭的马克思主义，死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我们今天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我们深刻理解党在现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很有启发的。



“我就骑着驴驹也要去看看”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了早日使共和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一五”计划起就规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毛泽东亲自研究钢铁厂的选址，最后决定在湖北的黄石市建立全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的大冶钢厂、大冶铁矿。

1953年2月中旬，毛泽东到湖北视察，来到了武汉。他在听取了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的汇报后，表示要听听黄石市委的汇报。中共黄石市委书记杨殿魁奉命连夜赶到武汉。毛泽东亲切地询问黄石情况，杨殿魁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听后表示“要去看看”。

毛泽东突然决定到黄石视察，不仅湖北省委领导毫无准备，随行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公安部长罗瑞卿也深感意外。他们考虑到主席的安全，竭力劝说不要去黄石。

毛泽东听后笑着说：“那里是将来的工业基地，我就骑着驴驹也要去看看。”

2月19日下午，毛泽东一行登上“长江舰”，顺江东下。罗瑞卿怕过早到达黄石会遇到麻烦，吩咐船开慢点。正与杨殿魁亲切交谈的毛泽东发觉船行慢了，立即命令快速行进，到

黄石码头已是夜幕降临了。傍晚6时15分，毛泽东一行来到华钢专家招待所。

在招待所稍事休息后，毛泽东就急切地要到车间去看看。杨殿魁问怎么看，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我要从你们的炼钢、轧钢、锻钢到试验室，从头看到尾，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看。”关心钢铁生产的毛泽东到了钢厂怎能不仔细看看钢铁生产的全过程呢？在杨殿魁等人的陪同下，毛泽东详细地观看了钢厂。

因为时间较紧，毛泽东没能看到出铁的盛况，他非常惋惜地瞄了出铁口几眼，下楼时还回头看了看。乘车离开钢厂，回到大码头，毛泽东脸上始终流露着微笑。中国有了自己的钢铁厂，并且这么快就建成投产，他又怎么会不高兴呢？

“这厂里还有我的本家， 那么这一包就是我加工的了”

1956年1月11日上午10时许，一辆轿车徐徐驶进位于珠江路的南京无线电厂，过了小桥，停在广场上。车门打开了，毛泽东冒着寒风，微笑着向厂办公楼走来。厂党委书记、厂长槐亚东等同志连忙迎上前去，毛泽东亲切地和他们一一握手。随后，毛泽东在罗瑞卿等陪同下和江苏省委、南京市委的负责同志一起视察了工厂。

毛泽东健步走进车间，亲切地向工人们招手致意，并且细心地观看工人操作。在过道上，毛泽东看到一个青年躬着身子正要从地上把一块50斤重左右的工件往钳台上搬，立即卷起袖子，抢步来到小伙子身边蹲下，要帮助搬工件。小伙子感动得热泪盈眶。

11时30分，毛泽东来到了五车间。厂党委负责同志向他汇报了解放几年来工厂从一个修修配配的烂摊子，发展成为一个能够独立设计并能大量生产多种无线电产品的社会主义企业的情况。当他知道这些收音机和里面的零组件都是我国自力更生制造的时候，十分高兴地用手抚摸着崭新发亮的收音机，赞不绝口：“很好！很好！”

毛泽东又察看了流水线,指着一个个纸包问工人:“这包的是什么?”

“这是加工好的零件。”工人们齐声回答。

毛泽东看到一个纸包上写着一个“毛”字,风趣地问:“这是送给我的吗?”

“这零件是谁加工的,就在纸包上写上谁的姓。”工人们说。

“这厂里还有我的本家呢,那么这一包就是我加工的了。”毛泽东诙谐地说。

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领袖与普通之间的距离一下子缩小到了零。

“这个大鼎，可以煮一头大牛哇”

1958年9月间，毛泽东视察安徽时参观了新建的省博物馆。

安徽省博物馆，是安徽崭新面貌的缩影，它包括工业、农业、交通、财贸、文教、卫生和历史文物等21个陈列馆。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用了近3个小时逐一参观了陈列馆，每看一个馆，都说“相当丰富”，“看不完”，对安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的赞扬。他对水利馆中展开的淮北河网化的图片非常重视，说应把这几张图挂到明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党代会上去。

他老人家在历史文物馆里看到战国时期的“楚大鼎”时，非常惊喜，风趣地说：“这个大鼎，可以煮一头大牛哇。”说得周围的同志都笑了。

毛泽东看完展览后，对陪同人员说：“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是一件很要紧的事。”

“我是个到了黄河也不死心的人”

1959年12月26日，毛泽东66岁生日那天，他对护士长吴旭君说：“47年10月，我在黄河边搞农村调查，住在佳县的神泉堡。这个县城在高高的山顶上。我有时上山从那里看黄河。黄河真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它壮观得很哩，汹涌澎湃，从我脚下流过。”

1952年，毛泽东就视察了黄河，寻找治理黄河的办法。可是更多更急的事缠绕在身，使他对黄河丢不下又顾不上。所以他对吴旭君说：“每次看黄河回来心里就难受”，“因为我没治好它身上的千疮百孔啊。我还没驯服黄河，让它造福人民。我欠了黄河的情喽。”

70年代初，毛泽东已体弱多病，有一次他用手捶打着沉重无力的双腿，闭上眼睛，让小吴给他唱《黄水谣》。唱完《黄水谣》又让唱《保卫黄河》。唱完了，小吴说：“主席，看来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人啊。”

“嗯？不对。”他睁开眼幽默地说：“我是个到了黄河也不死心的人。你信不信？你可不要小看黄河。我告诉你，我曾经讲过，你们可以蔑视一切，但不能蔑视黄河。”

1964年夏天在北戴河的时候，一天下午游泳回来，毛泽

东对吴旭君说：“我想去黄河，你做点儿准备。”

小吴心想，怎么在北戴河呆得好好的，突然又想起了去黄河。连忙问：“主席，你去黄河干什么？”

毛泽东高兴地笑了，挥着手说：“这次可好了，可以如愿了。我不当国家主席了，事情不那么忙了。我想搞点儿科学研究，再不搞就来不及了。”

小吴好奇地问：“你想怎么个搞法？”

毛泽东说：“我要带一个智囊团去。这里面包括有天文、地理、历史、气象、土壤、地质、化学、肥料、水利、电力等等一批专家，要像李四光这一级的专家。他们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我们大家都骑马去。你给我准备一些应付艰苦生活的东西。我们要沿着黄河走，逆流而上，去寻找黄河的源头。把这条河从头了解起，让它能更好地为我们的民族造福。我们还可以到黄河里去游泳呢。”说着，他让小吴把汪东兴请来，向他交代了一番。

几天以后，汪东兴从北京调来骑兵队和一些军马。紧跟着便开始了对工作人员的艰苦的骑马训练。

吴旭君从没骑过马，几天下来，浑身酸疼，大腿内侧都磨破了，一沾海水钻心地疼。毛泽东知道了，风趣地对小吴说：“我告诉你一个好办法，你不用练骑马了。”

“你又有什么好办法了？”小吴期待他教点诀窍。

“我们每天出发时，你比大家早动身，让汪东兴给你找四条猪，在猪身上搭个平板，你坐上，把药箱也一齐放在上面，到了目的地我们还能吃到猪肉哩。”说完他开心地大笑。

可是吴旭君生气了，说：“我不干。为什么我不如你们。我才不坐那个猪车呢，好像就是我显得那么不行。我也要骑

马去。”说完这句话，小吴才意识到，原来这是主席的“激将法”。他总有办法说服身边的人，让大家一心一意跟他干。



“你是张大车，你是 火车头，大家坐你开的 这趟车，你就是我们的头”

在火车司机张树吾家，有一张珍贵的照片，那是他和毛泽东、江苏省委的同志、南京铁路局的领导的合影，是30多年前毛泽东视察江苏时拍摄的。

1962年麦收季节，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在蚌埠附近的白马湖车站停靠下来。毛泽东亲切地询问列车司机的情况，并提出要见见这位司机。运转车长陈锦绣急匆匆地跑向车头，高兴地大声说道：“老张，毛主席要见你哩！”

张树吾被这突如其来的喜讯惊呆了，愣在了那里。陈锦绣催促说：“快点，快点，真是毛主席要见你啊！”张树吾醒悟过来，急忙随着陈锦绣向后面的车厢跑去。

“主席，这就是开这趟车的司机‘张大车’——张树吾同志。”陈锦绣指着张树吾向毛泽东介绍道。

毛泽东伸出手来跟张树吾握手，张树吾激动得脸色发红，忘记了手上的油污，伸出双手去握毛泽东的大手，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却又不知说什么，只说：“毛主席，您好！”

毛泽东紧紧拉着他的手，幽默而又很认真地说：“你是张

“大车，你是火车头，大家坐你开的这趟车，你就是我们的头。”

“不，不，我只是开车的，不是头，主席领导我们，主席是头。”张树吾连忙摇头说。

“来，咱们一起照张相。你是车头，你在前面。”毛泽东说着，把张树吾往身边拉了拉。

张树吾看看周围，有几位省里、局里的干部，只有自己是普通工人，心想：应该让领导同志站到前排。于是，他趁着毛泽东看着摄影师拨弄相机的当儿，悄悄退到后面去了。

准备照相了，毛泽东突然侧过脸来，一看张树吾不在前排，马上转过身来寻找，笑着说：“你到前排来嘛！”张树吾听了毛泽东的再次召唤，没有犹豫，向前跨了两步，站到了前排的边上，摄影师随即按动了快门。

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给张树吾寄来了这张照片。现在，这张照片还珍藏在张树吾家里。虽然年代久了，相纸有些变黄，但图像仍很清晰，毛泽东对铁路工人的关怀仍然清楚地印在这张照片上，它把普通群众与领袖紧紧联结在一起。

“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好哭脸……”

毛泽东对《红楼梦》有偏爱，自己反复读，也劝别人反复读。1964年8月在北戴河他对几个哲学工作者说过：《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他在《论十大关系》（1956年5月）中说过，我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这里提到《红楼梦》，固然有幽默的成分，确实也是引以自豪。

对《红楼梦》一书中的两位主角，毛泽东虽然充分肯定了他俩对封建制度的叛逆性格，同时又指出：书中的两位主角贾宝玉和林黛玉，对现代青年来说是不足为训的。贾宝玉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连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侍。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好哭脸，她瘦弱多病，只好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今天需要的青年是有活力，有热情，有干劲和坚强意志的革命青年。

这段话是1951年秋，毛泽东与周世钊等人谈话时说的。

我们看《红楼梦》，要汲取其中有益的营养，切不可不要去做贾宝玉、林黛玉那样的青年哟。

“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

1972年，毛泽东患了一场大病。这是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夕。尼克松访华是件大事，毛泽东必须接见。中央成立了医疗组，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对毛泽东进行医疗救护工作。

医护人员废寝忘食地进行紧张抢救，使毛泽东的病情得到缓解。然而抢救之后，江青却不满意，给参加会诊的医生扣上反革命特务集团的帽子，并吓人地举出前苏联的一个例子为证。那件被称做“白衫阴谋”的公案曾登在1953年1月13日苏联真理报上，说“不久前，国家安全部门发现一个由医生组成的恐怖集团，他们想通过有害的疗法达到缩短某些苏联领导人生命的目的”，结果有5名医生被捕入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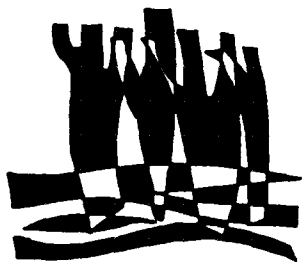
毛泽东的病情已让医疗组的医生、护士们紧张、焦急，而江青却给他们扣上反革命特务集团的帽子，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她的这一句话足以会叫人头落地的。因此，医护人员对于完成工作使命和个人前途几乎绝望了。

就在这时，毛泽东终于得知这个消息。他抬起虚弱的身体，指着江青问：“你说这些医生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

江青张张嘴,没敢贸然回答。

“我知道,”毛泽东忽然用手指鼻说:“就是我!”

一句话救了会诊的医生们,使苏联医生的悲剧不再在中国重演。毛泽东说: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要害我早就可以害了。我知道自己的病,我也知道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同志!



“人民就是上帝”

翻阅众多回忆毛泽东的文章，你会发现毛泽东也喜欢用西方人爱说的“上帝”这个词。但是毛泽东的“上帝”和西方人说的含义不同，不仅是一种幽默，而且所指对象也不同。

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闭幕词中讲述了“愚公移山”的故事，说愚公移山的精神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然后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1975年10月8日，他在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又直接说：“人民就是上帝。”

在另一种情况下，他也经常使用上帝这个词，那是谈生死问题。1975年，他在接见来访的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时说：“我不久要归天了，我已经接到了上帝的请柬。”但是在更多的场合，他喜欢说死后去见马克思。1972年，他大病初愈，工作人员说：“主席，你病得好吓人啊！”毛泽东却说：“前些日子，我到马克思、列宁那里去了一趟，他俩对我说，现在还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你那个国家的钢、粮还太少，不要这么早

来,回去吧!所以我又回来了。”他还常对人说:“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他还多次对外宾谈到:马克思是上帝。所以在毛泽东那里,上帝是马克思,当然,那是无产阶级劳动大众的上帝。他经常说死后去见马克思,就如同基督教说死后去见上帝的含义一样。

在毛泽东心目中,马克思这个“上帝”和人民这个“上帝”并不是二元并立的。1938年8月5日,他在“抗大”的演讲中说:马克思的主要先生是工农。1938年8月22日他在延安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又说:马克思从无产阶级那里学习了东西,又去教无产阶级。1939年9月25日的一次讲话中,他又讲:世界上最最有学问的人,第一是工人农民,第二是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是从工农那里来的,工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无名英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从来不把自己看成是超凡的英雄,他一再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鱼水 情深篇

毛泽东幽默趣谈

“轻伤不下火线嘛”

1933年夏天，江西瑞金久旱不雨。秧苗眼看就要干死了，广大农民的心都要愁碎了。

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立刻率领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人员走上抗旱第一线。

一天深夜，月亮朦胧地照着大地，叶坪村几位老农正在一口水塘边踩水车轮子浇地，忽然看见毛泽东走来了，一个老农亲切地招呼说：“毛主席，这么晚还没有休息呀！”

毛泽东走到水车前，一边卷裤腿一边说：“天这么旱，睡不着呀。来，换换吧。年纪这么大了，休息一会儿吧。”

老农怕累着毛泽东，说什么也不肯让他上车。实在拗不过，一个老农就借口说：“毛主席，你不会车水啊。”

毛泽东笑呵呵地把一位老农拉下来，自己蹬上水车，边踩边说：“是呀，起初你也不会吧？边干边学嘛。我正因为不会车水，才来向你们学习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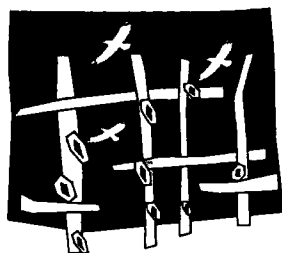
说着说着，毛泽东突然失脚从水车上滑下来，一只脚被脚踏板打伤。老农们赶紧从水车上下来，解下腰间的毛巾，帮毛泽东包扎好伤口，不让毛泽东再上水车。

毛泽东风趣地说：“不要紧，只擦破点皮，轻伤不下火线

嘛!”

毛泽东再次蹬上水车,和老农们并肩干起来。

这一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人们终于战胜了自然灾害,夺得了大丰收。



“小鬼，‘灵活机动’刚听完 就用上了”

延安时期，毛泽东经常到抗大去讲课。1938年8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给学员上完课后，刚从国统区来的新学员一下子涌上前来，把毛泽东团团围住，请求他签名题词。毛泽东微笑着，欣然提笔签名题词。

这时，一个从武汉来的新学员拼命挤了进来，挤得满头大汗。

毛泽东见状，冲他说道：“小鬼，急么子嘛？”

“想请主席题词留念。”

“往哪儿写呢？”

毛泽东这一问，那位学员才发现自己只顾往里挤，连笔记本也忘带了。他急中生智，从身边另一位学员手中抽了一张纸，递给毛泽东。

毛泽东笑了，风趣地说：“小鬼，‘灵活机动’刚听完课就用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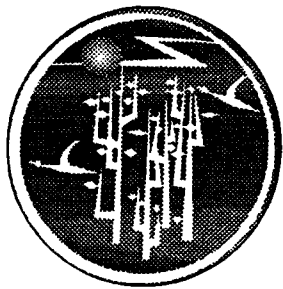
原来，毛泽东刚才上课时，曾讲道：“你们要学点什么呢？我说，你们首先要学的，就是‘三句话’、‘八个字’。三句话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

战略战术；八个字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那位学员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毛泽东接过纸，用铅笔写下了这样的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毛泽东。1938年8月。

毛泽东用自己特有的幽默语言与抗大学员相处得非常融洽，亲密无间。



“豆芽菜也是很好吃的一个菜嘛”

创办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解放日报》，是第一张大型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毛泽东对办好《解放日报》倾注了不少心血。他不仅为该报撰写、修改了大量社论、评论和消息，还对如何办好《解放日报》作过许多精辟的指示。

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当时该报有些编辑、工作人员瞧不起和不爱用工农兵群众的来稿，因为这类稿件文字水平较低，内容比较单薄，被编辑人员戏称做“豆芽菜”。

这事也被毛泽东知道了，毛泽东批评《解放日报》的有些编辑人员说，不要轻视工农兵群众的来稿，不要称它们为“豆芽菜”。他说：“就说是‘豆芽菜’，也是很好吃的一个菜嘛。”他还教育编辑人员，要做工农兵稿件的“理发员”，把它们美化美化。

在毛泽东的关心和指导下，《解放日报》开辟了许多专门刊登工农兵群众来稿的栏目，使该报成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读物，与人民群众结成了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

“这帽子是不是专为我准备的， 我可夺人所好啰！”

1945年8月28日，延安的天气格外明朗。

上午8点30分，毛泽东和周恩来从枣园中央驻地的窑洞中走出来，登上一辆抗战期间由南洋华侨捐赠的救护车，直奔延安机场。随同毛泽东一同前往的警卫人员有齐吉树、秦长怀、孙震法等。

毛泽东身着一套蓝灰色的中山装，脚穿一双黑色皮鞋。

周恩来仔细打量着毛泽东，说：“主席，你戴的帽子有些显小。”说着便摘下自己的盔式帽，递给了他。

毛泽东取下头上的礼帽（这是江青从苏联医生阿洛夫那里借来的），换上盔式帽一戴，正合适，便风趣地说：“恩来，这帽子是不是专为我准备的，我可夺人所好啰！”

周恩来笑道：“我还有，况且很快就要到重庆了，那里我人熟，这顶就送给你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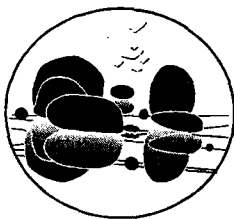
毛泽东高兴地说：“好，那我就戴上。”

毛泽东离开延安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为毛泽东送行的许多中央领导同志提前来到东关机场，一些知情的同志和群众也围到机场四周。机场上，所有前来送行的人都热切地等

待着。

不一会儿，毛泽东乘坐的汽车开过来，停在飞机旁。毛泽东走下汽车，他神情泰然，目光炯炯有神，微笑着向大家点头示意。在场的中央领导纷纷走上前去，一一跟毛泽东握手道别。飞机引擎起动了，毛泽东稳步走上舷梯。在机舱口，他转过身来，慢慢摘下头上的盔式帽，向大家挥手告别。

飞机起飞了，毛泽东特意指示让飞机在延安上空绕行一圈，以示向陕北人民道别。随后，飞机转向西南方向，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毛泽东带着人民渴望和平的希望，飞向了重庆。



“我们队伍太多了，人马太多了， 对不住大嫂了”

战争年代，毛泽东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始终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即使在强敌追近，情势危急时刻，他也依然风趣幽默，谈笑从容。

1947年5月，西北野战军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大捷”胜利后，遂西进陇东、三边地区继续作战；毛泽东、周恩来等率前委机关仍住王家湾。蒋介石收听到周恩来宣布的中共中央仍在陕北指挥作战的消息后恼怒万分，严令胡宗南以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4个半旅，向王家湾猛扑过来，企图一举摧毁我党中央。此时，我西北野战军主力远在陇东；中央身边仅有4个连的警卫兵力，而且装备很差，连挺重机枪都没有，形势非常危急。

数万敌兵步步逼近，前面警戒分队已和敌人接上了火，枪声越来越激烈。在周恩来、任弼时一再建议下，毛泽东得知老乡们已安全转移后，才下决心转移，他说：“好吧，我们走。”

此时，天空乌云密布，雷声隆隆，眼看一场大雨即将来临。战士们都盼着乌云快快散去，不然途中就要挨淋了。毛泽东却喜滋滋地说：“这是一场好雨！”他知道，这里入夏以来还未

下过透雨，庄稼人正盼着这场雨呢。

出发没走多远，大雨瓢泼似的下了起来，天也越来越黑。毛泽东与战士们在泥泞中艰难地向前跋涉。走了不知多久，来到一个小村里，人马太累了，便停下来稍稍休息。警卫战士给毛泽东找到一间房子，生起火，让他烤鞋子。毛泽东说：“你们烤。”接着又说：“我在这里睡，你们怕不怕？你们要不怕，我就在这里睡他一天。”说着笑了起来。战士们跟着都笑了。大家知道毛泽东是和他们说笑话，并非真要睡一天，因为屁股后面不远还有刘戡的数万追兵呢。

第二天上午，队伍到达小河村。刚住下不久，后方传来激烈的枪声，敌机也在空中盘旋；侦察兵报告说，敌人离小河村仅十来里路了。周恩来立即派出一个排的兵力控制了制高点监视敌人，同时组织前委机关向靖边县天赐湾转移。这时，刚刚转晴的天空又雷鸣电闪下起雨来。天很快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队伍爬上一道山梁，糟糕！只见左侧山沟里尽是敌人，他们点起的一堆堆篝火蜿蜒很远很远，近处的篝火旁，敌人的活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原来是向导带错了路，和敌人撞在了一起。太危险了，战士们的心都提到喉咙里了。队伍只得暂停前进。风雨中，战士们又冷又饿又紧张，便紧紧靠拢到毛泽东周围，这样大家都暖和些，也为毛泽东遮遮风雨。毛泽东忽然笑了一声：“嘿，真是铜墙铁壁，风雨不透了。”听到毛泽东一说，大家紧提着的心慢慢放松开来。

一会儿，前面传来口令：不准打手电，不准吸烟，不准弄出大的响动，前后跟紧，出发。就这样，几百人的队伍，擦着敌人的肩头，悄无声息的穿了过去。

天放亮时，队伍爬上一道山梁，进了天赐湾村。

天赐湾是一个仅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各个土窑洞能住的都住满了。中央领导挤着住在两间土窑内。警卫战士准备在外面铺些草露宿。毛泽东、周恩来一定要他们住到里边来。这样一来,窑洞的炕上炕下都挤得满满的。房东大嫂进屋看了这种情况,不安地说:“这窑洞太小了,地方太小了,对不住首长了。”毛泽东听了,仿着大嫂说话的节律和音调笑着说:“我们队伍太多了,人马太多了,对不住大嫂了。”说得大嫂和同志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你蠢么！你把水全排干了， 你那个鱼还讲什么安全？”

我们的党和军队之所以有力量，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亲如鱼水的关系。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个原则性问题，谁要是违背了这一原则问题，就会受到严厉批评。

1949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迁往北平。到北平后暂到颐和园休息。

因为北平刚解放，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很多，破坏暗杀活动时有发生。中央社会部从安全角度考虑问题，提前将颐和园内原住着的一些和尚与勤杂人员清理出去了。

可是，人全赶走了，毛泽东来到之后，要水没水，找饭没饭。下午还要去西苑机场举行入城式呢。

毛泽东不禁发了火：你们搞什么名堂？先来的人都干什么吃去了？

社会部的同志忙解释，赶走人是为了安全。

毛泽东大声说：你蠢么！你把水全排干了，你那个鱼还讲什么安全？你就安安全全干死在那里，饿死在那里吧！

毛泽东讲的很对，社会部的同志们还要到人民群众中去，依靠人民群众才能解决吃饭问题。他们跑到颐和园外面的饭馆里买来米饭和三菜一汤。

“外国洋人也不都是坏人， 外国洋人里头也有好人”

1949年10月，山西省100多名参加开国大典的农民代表，应邀来到了中南海春耦斋，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会见。

毛泽东对他们说：现在，我们胜利了，中国的老百姓也都站起来了，再也不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了。那些外国洋人真坏，他们老是想欺负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外国洋人出兵打我们，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们中国人民不甘心受外国人的压迫，起来与他们斗争。历史上就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反抗外国洋人的农民革命。

说到这里，毛泽东停了一下，接着又说：外国洋人也不都是坏人，外国洋人里头也有好人。你们看，后边墙上那几个外国洋人，都是大好人。毛泽东用手指着挂在代表们身后墙上的四位革命导师的画像，说：“他叫马克思，是德国人；他叫恩格斯，也是德国人；他叫列宁，是苏联人；他叫斯大林，也是苏联人。”

农民代表们在毛泽东介绍时，都转过脸去，望着这四位革命导师，他们中间有两位大胡子，有一位秃顶的，还有一位留着八字胡的。

这时，毛泽东又讲开了：“他们对我们中国革命有很多帮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三个人已经死了，斯大林还活着，他领导苏联红军打败了希特勒，又出兵我国东北，帮助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他们和别的洋人不同，他们这些洋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毛泽东用拉家常话的方式，由表及里，层层深入，他的话紧紧抓住了农民代表们的心。他一会儿自己提出问题，一会儿又自己来解答问题，这一问一答使代表们豁然开朗。只听他自己问着自己，又好像是让大家和他一起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义和团革命为什么失败了呢？就是因为那时还不知道马克思、列宁，也就是说，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作为革命指导；他们把外国洋人统统都当作坏人。

毛泽东就是这样，用“好人”、“坏人”、“洋人”等这些最通俗的话，简短而深刻地向农民代表进行了内容极丰富、意义极重大的政治教育。随后，毛泽东又转到了另一个话题：如何搞好农业生产。

“老百姓行动这么 一致，比军队还整齐！”

毛泽东经常教育干部，要有群众观念，不要脱离群众。他外出视察时，就十分注意这个问题。

1949年底到1950年初，毛泽东在苏联访问期间，苏方安排他参观莫斯科的地铁。莫斯科的地下铁路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地下铁路系统之一。每天平均开800多次列车，乘客达50多万人次。而且每个车站都有其独特风貌，用五颜六色的大理石、花岗石、陶瓷和五彩玻璃镶嵌出各种浮雕、雕刻和壁画装饰，照明灯具也十分别致，犹如富丽堂皇的宫殿，有“地下宫殿”的美称。

参观这样的宏大建筑，很能开眼界，所以毛泽东与代表团的全体人员都很高兴。可是发现诸大的地铁厅里冷冷清清只有几名工作人员，毛泽东叫翻译师哲去问怎么回事。师哲说，为了毛泽东的安全起见他们搞了戒严。

毛泽东马上把脸沉下来说：“为什么搞得这么神秘？为了我一个人搞戒严，影响多少万人工作、旅行、上下班，实在不妥。算了，我不参观了。”结果，代表团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无独有偶，毛泽东访苏回国，途经长春，准备换上小轿车

看看市容和八大处。东北局、吉林省和长春市的领导都来迎接毛泽东。当毛泽东一行乘车来到市区时，大街小巷连一个人也看不见。毛泽东问一位领导：为什么街上一个人也看不到。这位领导回答说：“现在正吃中午饭。”毛泽东一听便知是说假话，风趣地说：“老百姓行动这么一致，比军队还整齐！”实际哪里是吃中午饭，是这里的领导为了毛泽东的安全搞了戒严。这本来是好意，但毛泽东、周恩来历来不赞成这么搞。

后来毛泽东严肃地批评道：“你们在说假话，搞戒严，不让老百姓出来，这样太脱离群众了。”

吉林省和长春市的领导马上解除了戒严，老百姓就出来了，毛泽东这才消了气。

“我这个主席不如你们好， 我没有自由啊！”

进了北京城中南海的毛泽东，在一般人看来，可要比战争年代的延安舒服、自由多了。其实不然。

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搬到中南海的最初日子，有一天，毛泽东对卫士李家骥说：“走，我们俩去郊区。”

“不敢，有危险，我担不了这个责任”。小李慌忙地说。

“不用怕，我突然出去，他们不知道。我不相信坏人耳朵就那么灵，现在我们马上走。”毛泽东用认真又带有商议的口气对小李说。

小李为难地说：“主席，我必须执行给我规定的纪律，不然我的领导要处分我的。”

毛泽东长叹了一口气：“唉，这个规定没有错，但把我和群众隔开不行啊！我见不到群众就憋得发慌。”他沉重地抬起头，翘望红墙上空的天说：我是共产党的主席，见不到他们还算什么主席，算什么领袖。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各级领导是鱼，人民群众是水，离开水，鱼就要渴死！

稍停会儿，毛泽东不无感叹地说：不知你们是不是理解我的心情，唉！

平时，毛泽东很怀念在延安时期的日子。记得1946年8月6日，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对毛泽东开始了充满好奇的采访。

忽然，斯特朗听到窑洞上方的草丛里有响动。她很紧张，会不会是坏人想从那往里扔炸弹？

“谁在上面？”斯特朗神情严肃地指着窑洞上方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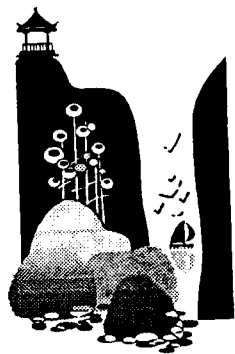
毛泽东却好像习以为常了，笑笑说：“那是邻居家的孩子，他们对我的外国客人感到好奇。”

斯特朗为了证实毛泽东的话，走出窑洞环视了一下周围，只见不远处有农民赶着小毛驴走过，农家孩子在窑洞顶上戏耍，而毛泽东不过是这些普通农民的友好邻居……

毛泽东与小李谈着谈着，忽然说出一句既实在又令一般人难以理解的话：“唉，我这个主席不如你们好，我没有自由啊！”

对此，作为毛泽东贴身卫士的李家骥还是能理解的。住进中南海，毛泽东当初就坚决反对，可是他得服从中央的集体决定。住进中南海以后，条件变了，对机关工作人员的管理比在山沟里正规多了，毛泽东和卫士们开始都不适应。在延安和西柏坡时，毛泽东和群众接触很方便，想找谁，抬腿就走，甚至在院内喊一声就找到人。现在可不行了，院子大了，距离远了，规定多了，来人要见毛泽东越来越难。毛泽东平时活动的范围除大型会议或外出视察，基本上就在办公室、本家院子。出院子，后边要跟好几位卫士、警卫；如果出中南海，卫士必须报告汪东兴、叶子龙等，公安部要派人保卫。如果离京，必须报告杨尚昆、罗瑞卿以及铁道部长，他们要跟随毛泽东行动，有时还要听这些人安排指挥。而这些同志都是执行中央集体

决定的指示,决不是个人私事。毛泽东虽然有时内心不想“照办”,可也常常无办法,毕竟不能带头破坏规定啊!



“楚河汉界，你们吃高贵的， 我吃卑贱的……”

建国初期，毛泽东非常关心新中国的钢铁工业企业的选址问题，他多次与周恩来等磋商，参加会议讨论。经过慎重考虑后，他最终做出了决断：“钢铁要过关，钢铁要过江。”在华中腹地武汉兴建武汉钢铁公司。

毛泽东在日理万机中，关注着武钢兴建的施工进度，盼望着共和国的新钢都早日流出铁水。1956年5月底，毛泽东视察南方，在离开广东时，特地带上当地的特产芒果来到武汉。他在东湖宾馆，要用芒果款待两位“客人”。

6月3日上午8时，两位“客人”——武钢总经理李一清、副总经理韩宁夫来到了东湖宾馆。毛泽东逐一问了他们的姓名和籍贯，然后笑着说：“冶金工业过去都不熟悉，大家都要好好学习，今天你们谁讲？”韩宁夫首先向毛泽东汇报了武钢的建设规模、平整场地、施工进度、施工队伍与工程衔接中存在的问题。随后李一清介绍了施工中修改苏联设计的问题。

汇报整整谈了一个上午，毛泽东始终兴致勃勃地听着。这时，工作人员进来提醒说：吃午饭的时间到了。毛泽东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高兴地对二位“客人”说：“时间不早了，吃

饭。”浓重的湖南口音，令人备感亲切。

走进餐厅，饭桌上摆着西瓜和芒果，李一清、韩宁夫还是第一次见到芒果，不由相互对视了一眼。毛泽东看在眼里，用手指着说：“这叫芒果……芒果。”

入席后，主客隔着桌面，毛泽东伸手把整盘芒果推给客人，自己随手拿了一块西瓜，比划着幽默地说：“楚河汉界，你们吃高贵的，我吃卑贱的，要不要得……”

李一清、韩宁夫不好意思地笑了，不约而同地伸手欲将芒果盘推向桌面中间，毛泽东阻止了他们。他自己先吃了口西瓜，一边吐出瓜子，一边加重了语气说：“我吃西瓜，吐出瓜子。芒果归你们，吃了芒果，要吐出钢铁！”

李一清、韩宁夫顿时明白过来，手托芒果备感沉甸甸的……

毛泽东是多么急切地盼望中国能生产出更多的钢铁啊！

“这个不是能盛饭吗!”

1958年9月19日,安徽芜湖铁山宾馆的同志们,得知中央一位负责同志要来宾馆休息。“是谁呢?要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来该多好啊!”许多人在热切地盼望着。

快到晚上6点钟时,一行小轿车开来,从中间的一辆车上走下一位高大魁梧的人来。啊!果真是毛主席来了。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很辛苦了吧!”

“不,毛主席,您老人家辛苦了!”

“你们的眼都熬红了嘛!”

大家没想到毛泽东一见面就对他们观察得这样真切,几天来为了这次接待任务的辛苦劳累一扫而光。

晚饭好了,偏偏赶上天下雨。服务员请毛泽东到特为他布置的小餐厅用饭。毛泽东问其他同志在哪里吃?服务员说,在大餐厅里。“那我也到大餐厅里去吃!”毛泽东说完就向外走去。

外面在下雨,服务员小王赶忙撑起一把伞跟了出去。毛泽东高大,小王要踮起脚才能把伞撑高。毛泽东回头见了,笑着说:“我自己来!”把伞接了过去。

毛泽东来到餐厅,餐厅的服务员都愣住了,他们万万没有

料到毛泽东竟像一个普通旅客一样很随便地在一张餐桌边坐了下来,而且十分风趣地招呼大家说:“开饭了!来,坐、坐、坐!”说完,毛泽东便拿起饭碗朝饭桶走去。

怎么能让他老人家自己去盛饭呢?服务员们都抢着去接毛泽东的碗。可是他老人家把手一挥说:“不要,自己来!”

毛泽东刚要盛饭,发现桶里没有饭勺。原来大家只顾看自己的领袖,竟忘了去拿饭勺。这时大家慌了。毛泽东却从容不迫地从餐桌上抄起一把长柄汤勺,笑着说:“这个不是能盛饭吗!”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慢点吃，慢点吃，还有菜， 延(筵)席延(筵)席嘛”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韶山。1927年秋，他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从那时起，已是32年了，今天他第一次回到故乡。

当晚，毛泽东住在松山一号寓所。第二天清晨不到5点钟，毛泽东就起了床，他首先来到父母的坟上，献上一束松枝和野生的紫色杜鹃花，而后深深地鞠了一躬。他又来到他的故居——上场屋，面对墙上挂着的父母遗像久久佇立。在整整一天的时间里，毛泽东走进了烈属、军属和贫下中农的家，走进了食堂，走进了学校……，与家乡群众和基层干部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了口粮多少，够吃不够吃，生产怎么样，亩产到底有多少斤等一系列关系群众最基本的生活问题。

晚上，毛泽东设宴招待亲友和乡邻。

早在前一天的下午，毛泽东一到韶山，就向公社书记毛继生交待说：“我离开韶山几十年啰，要请你们乡亲吃餐便饭。”在毛泽东提出的邀请人员中，有他的堂兄、幼年时的老师毛宇居，外婆家的表兄文南松、文东仙，表侄文九明；有毛福轩烈士的妻子、毛泽东称呼“五阿婆”的贺菊英，毛新梅烈士的妻子沈

素华；还有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毛碧珠，老自卫队员毛韶喜，大革命时期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的谭熙喜，以及原韶山特区第一乡妇女主任郭伯田等共40多人。

餐厅里，热气腾腾，餐桌上摆了扣肉、蒸鱼、炒蛋等韶山风味的菜肴和红酒、白酒、米酒等各种酒类。

毛泽东与毛宇居、贺菊英、沈素华等老人坐在一桌，罗瑞卿、王任重、周小舟等同桌作陪。

毛泽东从席上站起身来，对乡亲们说：“离开韶山几十年了，今天，我泽东三伢子特请各位长辈、亲朋、革命老人就餐便饭，敬大家一杯酒。”

开始就餐了。可这些庄稼人从未经过这种场面，从未和这样的大人物一起吃过饭，所以大家都很拘谨，有的只是呆坐着，筷子都未拿得起。

“大家随便吃嘛，愿意喝酒的喝酒，愿意吃饭的吃饭，菜尽管吃，不要怕，我们都是一家人。”毛泽东为打消大家的这种拘谨，连连地劝酒劝饭。

经毛泽东这么一说，大家也就不那么拘谨了。本来，肚子早就空空的了。于是大家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毛泽东见状，又连连说：“慢点吃，慢点吃，还有菜，延(筵)席延(筵)席嘛。”

毛泽东在原桌上对毛宇居等几位老人敬劝了几杯酒，又来到其他几个桌上给大家敬酒。

“主席，我们已经喝过酒了，现在吃饭。”他们这是按照韶山一带的风俗，先喝酒，再吃饭。而吃着饭就不应再喝酒了。

“喝了酒可以继续吃饭，吃了饭也可以继续喝酒，要打破常规嘛。”毛泽东风趣地笑着说。

大家沉浸在无拘无束的畅饮中。

“你们就是变着法子敲我的竹杠啊”

毛泽东反对过生日，反对搞祝寿，目的是要各级干部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保持与群众紧密联系的作风。但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卫士们，总是希望能多找些机会，让日夜为中国人民辛苦操劳的毛泽东轻松一下。怎么办呢？于是想出个“敲竹杠”的办法。

1959年的年底又到了，毛泽东的生日12月26日是在巡视中国大地的火车上度过的。生日那天，卫士长说：“主席，今天是您生日。大家辛辛苦苦跟您干了一年，您也应该有所表示呀！”

休息时，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跟他谈话都是无拘束的，开玩笑也不必担心出格。毛泽东这时总是宽厚地一笑，说：“你们就是变着法子敲我的竹杠啊！”

于是，卫士长便笑哈哈地跑到厨房，吩咐厨师用面做了个大寿桃。吃饭时还准备了酒。卫士长首先举杯说：“今天是主席生日，我代表同志们祝主席生日愉快，健康长寿！”

毛泽东微笑举杯，说：“一年了，同志们工作辛苦，祝同志们身体健康！”

“全国人民遭灾了， 我哪里睡得着啊！”

毛泽东一贯反对为他祝寿过生日，然而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他却在生日那天主动“请客吃饭”。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在1960年12月26日的上午10点多，毛泽东躺在他那张一半放书一半睡人的宽大的硬木板床上，身上搭了三条补丁摞补丁的毛巾被，正依着靠枕看文件。

卫士小封走了进来，发现毛泽东眼神忧郁，目光黯淡，一动不动。他正在沉思默想，可以看出，老人家又是一夜未睡好。他已经是7个月不肯吃一口肉，桌上放着各地报告灾情的电报，还有国际敌对势力反华情况的报告。

毛泽东老了，他眼角发散出鱼尾纹，头发一根根悄然变白。半年多来，卫士们帮他做按摩时，发现他的脚背和小腿的肌肤失去了弹性，按下去一个坑，久久不能平复。这是浮肿。

“小封，你去把子龙、银桥、高智、敬先、林克和东兴同志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

毛泽东点名的这些人，都是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封耀松忽地想起：哎呀，今天是12月26日——毛主席的生日！

下午，7名工作人员同毛泽东围在一张饭桌上吃饭。没

有肉，没有酒，只是多放了点油盐。

毛泽东环顾了身边的7名工作人员，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停顿一下又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反映上来。”又看看封耀松：“小封啊，你去不去？”封耀松说：“去。”他又眨眨眼，目光变得严肃犀利：“要讲真话，不许说假话，不许隐瞒欺骗！”

说这话时，老人家显得格外激动、痛苦。因为前年去年，他视察各地时，不少头脑发热的干部说了假话，虚放空炮。

这顿饭毛泽东没吃几口便放下了筷子。他吃不下去，也没提自己的生日。

夜里，封耀松劝毛泽东睡觉。

“睡不着啊！”毛泽东摇头。“全国人民遭灾了，我哪里睡得着啊！”

毛泽东吸着烟，给小封讲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些大灾荒，讲当年红军吃树皮咽草根的斗争生活，讲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追求。讲到后来，毛泽东流下了眼泪，伸出一只手，抚着小封的后背说：“小封，我不放心哪。他们有些事瞒着我。我出去哪里，他们都能作准备。了解不到真实情况，我就会犯错误。你们要下去，你们能看到真实情况，要告诉我真实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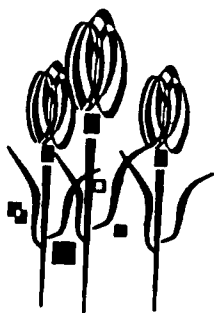
封耀松含着眼泪点头：“主席，我一定说真话。”

……

半年后，下去的六人汇报来真实情况。不久，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在中央和各地负责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了修改，制定了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改部分主要是取消了原草案中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的规定。会议还就其他重要问题做出规定。此后，全国各地的形势逐渐好转。

这就是毛泽东主动为自己过生日的故事。



“一个人要想别人尊重你， 首先你得尊重别人”

毛泽东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一个人要想别人尊重你，首先你得懂得尊重别人。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可以说是中国最大的“官”，可是他并不摆“官架子”。

南昌市歌舞团的邢韵声，在1961年八九月间随团到庐山，那里正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小邢她们接受任务，去演节目，并陪中央领导跳舞。那是江西省领导同志为了活跃会议生活而安排的。就在这次活动中，小邢有幸看到这样一个情节。

一次到了开饭的时间，警卫人员把饭菜端到毛泽东的饭桌上。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件意外的事，警卫在盛饭时，不小心把一碗饭给打翻了，饭全给泼在桌上。警卫一下慌了，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

毛泽东看到这情景，不但没生气，反而赶紧走上去，用手把泼在桌上的饭一把一把抓进碗里。

“主席，您这样用手抓不卫生。”小邢在一旁说道。

“不要紧，不要紧，我吃，我吃！”

“不，主席。”警卫员硬是从主席手里把饭夺过来。

警卫员走后，小邢说：“您让他去弄不就得了，干嘛亲自动手？”

“小邢啊！一个人要想别人尊重你，首先你得尊重别人。你说对吗？”

“是，主席。我记住了。”小邢深为感动地说。“他为什么那么紧张呢？”小邢又有些奇怪地问。

“他是个新同志，刚刚来。”主席答道，“这些孩子都是好孩子。”



科学 文史篇

毛泽东幽默趣谈

“张果老虽然面向蓬莱，但路线走错了，永远也到不了蓬莱”

革命要想成功，必须有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光有一股子革命热情，却不去研究路线和方针政策问题，革命是一样不能成功的。

1928年8月，由于受“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红军两个主力团离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往湘南，去攻打郴州。结果先胜后败，一个原有相当战斗力的团只余下约200人。当时毛泽东正远在江西永新作战，得知这个消息后，带一个营的兵力火速赶到湘南，迎回了遭到失败的部队，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为了教育部队，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肖克等领导干部讲了一个神话故事。他说：有一回，八仙之一的张果老下华山去蓬莱朝圣。他是个仙人，骑毛驴和我们不同，是倒骑的。走着走着，遇到另一个仙人吕洞宾。吕洞宾问张果老要到哪去？张果老说：“上蓬莱朝圣。”吕洞宾惊讶地问：“蓬莱在东，你骑毛驴往西，怎么能到？”张果老反而不高兴地反驳说：“我的脸是朝着东方的蓬莱啊！”讲完这个故事，毛泽东说：革命的队伍如果路线、政策不对，革命就不能胜利。就像张果老，虽然面向蓬莱，但路线走错了，永远也到不了蓬莱。

“我看你到我们红区里来， 是撞上大运啦”

1936年7月15日，中国革命的中心红都保安来了两位美国客人——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他们是经宋庆龄先生向毛泽东举荐，第一次来到被蒋介石严密封锁，当时被称为“未知世界”的陕北进行采访的外国记者和医生。

毛泽东对斯诺和马海德冒着生命危险来延安采访甚为重视。7月16日，即他们到达保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就在他的住处接见了两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一阵寒暄之后，毛泽东看着斯诺，开门见山地说：“宋庆龄先生信中说，你是一位正直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很友好，相信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的情况。任何一个新闻记者来我们根据地采访我们都欢迎。你可以到根据地任何一个地方去采访，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不限制你们的采访活动，而且要尽可能给你们方便和帮助。”

斯诺听了毛泽东这一番话，高兴地笑了起来。他站起来，激动地说：“我会公正地、如实地向全世界报道你们的情况的！”

接着，毛泽东对斯诺提的问题，详细地逐一解答，谈得最

多的是共产党的抗日政策问题。以后的几个晚上，毛泽东不知疲倦地向这位友好的外国人讲述了他能讲述的一切。斯诺把这一切都详细地记录了下来，这就是以后他写的《西行漫记》的主要内容。

一天夜里，斯诺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在屋里一边吸着烟，一边踱来踱去，不时地看着这个同情中国革命的青年人，突然问道：“你为什么要漂洋过海到中国来？”

斯诺闪动着一双蓝眼睛，笑了笑，说道：“我开始是盲目地到中国来‘撞大运’的，想写一本畅销世界的书，成为一个作家。”

毛泽东幽默地说：“我看你到我们红区里来，是撞上大运啦，保准能写出一本畅销世界的书。”

这时，警卫员给毛泽东送来了简单的晚饭，因为有客人，特地又加了一碟西红柿炒辣椒。

“呵，保安还有西红柿？”斯诺看着西红柿炒辣椒，惊奇地问。

警卫员说：“保安没有西红柿，这是周副主席从东线指挥部给毛主席捎来的。今晚为了招待客人，主席让炒了一点。”

毛泽东夹了几块西红柿，放在斯诺的碗里，说：“这西红柿在我们这里来说，是非常新鲜的蔬菜，是不容易买到的。它从欧洲传入中国才几十年时间，在民间还没有开始大量栽种。听说西红柿原来有个很可怕的名字，叫‘狼桃’，是吗？”

斯诺说：“对喽，西红柿未被人们发现能食用之前，就是叫‘狼桃’”。

接着，毛泽东讲述了西红柿的经历，说：“由于西红柿的枝叶分泌出来的汁液气味难闻，一直被人们视为毒果。直到 18

世纪末,法国一名画家在为西红柿写生时,产生了品尝的欲望。他品尝之前,穿好了入殓的衣服,接着就吃了一个。可是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了,他没有死。西红柿的食用之谜被揭开了,立即风靡世界,成为人们竞相食用的最佳蔬菜。这个名气不大的法国画家也因此成了传奇式的人物。”

斯诺立刻明白了毛泽东的巧妙的寓意,同时也想起了自己到红区来的心情,不由得笑了起来,说道:“主席,我准备到红区来的时候,也是下了和那个品尝西红柿的法国画家一样的决心,我那时确实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来红区的。红区当时是一块‘未知之地’,是一个最大的谜。为了探明这块‘未知之地’的真实情况,难道不值得我冒一次生命危险么?”

“你这个险冒得好!你将会和那个法国画家一样,成为世界上传奇式的人物。”

“红区的一切都是新闻,都是世界上的头号新闻。这些新闻报道出去以后,一定会和西红柿一样风靡世界。”

“你到中国来不是为了‘撞大运’的么?我看你已经撞上大‘运’了。”

1937年10月,《西行漫记》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它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介绍了中国的革命。一月之内发行了5版,震动了世界,埃德加·斯诺成为世界上传奇式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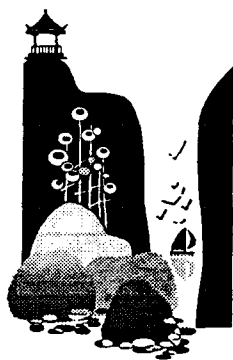
“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 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

文化战线是革命斗争中的一条重要战线。毛泽东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风趣地说过：“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朱总司令，就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鲁总司令是谁呢？是鲁迅。毛泽东曾赞扬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当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谈到鲁迅总司令时，全场响起了一阵掌声和笑声。

朱总司令带的是拿枪的军队，鲁总司令则代表着一支“文化的军队”。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说：“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

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

是的,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战斗的年代里,革命的歌声,革命的文艺演出,革命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化战线的成果,激励着多少革命志士去与凶恶的敌人做殊死的斗争,鼓舞着多少革命志士去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迎接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曙光。文化战线的功绩是巨大而令人难忘的。



“你真比斯大林还行”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提倡写短而实的文章，反对写长而空的文章。他说：“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还说：“去年六月二十二日（注：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联进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战争，斯大林在七月三日发表了一篇演说，还只有我们《解放日报》一篇社论那样长。”

老将军莫文骅有幸遇到毛泽东亲自教他写短文的一件事。莫文骅回忆说：在延安时，他起草了一篇文章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专门将莫文骅叫去。莫一进门，毛泽东就幽默地批评说：“你真比斯大林还行。”莫文骅愣住了，问：“报告主席，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说：“关于对德宣战，斯大林用不到一千字的文章。你的文章三千字，不是高明么？但是，他讲清楚了，你没讲清楚。”莫文骅明白后很不好意思，说：“我写不好，所以请主席改。”毛泽东耐心地对莫文骅讲了怎样写文章，怎样抓住中心，怎样做到简练生动，并告诫文章写成后，要像鲁迅讲的那样，至少要看3遍，反复修改。毛泽东那简捷深邃而又时有幽默风趣的话语，平易近人的态度，使莫文骅感受到关怀、亲切和深刻的思想启发。

“这是李太白诗意：‘半壁见海日’”

1945年10月2日，在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毛泽东，邀请柳亚子先生到郊外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晤谈。柳亚子约画家尹瘦石同往。

当柳亚子把尹瘦石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紧握尹瘦石的手摇了几摇，说：“喔，艺术家！文以载道，诗以言志，艺术人才是极为重要的！延安有一所鲁艺，在抗日战争中起了很大作用。不过，那里的艺术家都是窑洞里培养出来的‘土包子’噢。”尹瘦石连忙说：“我也是‘土包子’，没有留过洋。”毛泽东听后大笑，说：“我们是彼此彼此了。”他接着说道：“我只读到师范，没有进过大学。恩来他们去法国勤工俭学，我也没有去。我是觉得对中国的问题还未完全了解，首先需要好好研究一下，就一头钻进线装书里研究历代兴亡史了。不过，我对美术却研究甚少。记得小时候，最不耐烦的是图画。在纸上画了一条横线，一条弧线就交卷。先生问我画的是什么，我说这是李太白诗意：‘半壁见海日’！”

毛泽东这里说的故事，是他在湖南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的事。其实那时他不仅对图画课没有兴趣，就是对自然科学课程也没兴趣。1936年10月他同美国记者斯诺在陕

北保安谈话时说：“这所新学校有许多规则，我只赞成其中的极少数。首先，我反对把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也不去钻研，所以这些课程我多半得到的分数很低。我最讨厌的是静物写生这门必修课，认为它是极端无聊的。我总是想出最简单的东西来画，草草画完就离开课室。记得有一次我画了一条直线，上面加了一个半圆，来表现‘半壁见海日’的画意。还有一次，在图画考试中，我画了一个椭圆形就算了事，说这是蛋。结果图画课得了个四十分，不及格。幸亏我的社会科学课程的分数都很高，这样就把其他课程的坏分数扯平了。”

但两年后的1921年，毛泽东在新民学会召开的新年大会的发言中已经“觉得普通知识要紧”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基础科学的知识，想方设法补足”。在这个时期，他曾读过赫胥黎的《天演论》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自然科学著作。在延安时候，他收藏、阅读了许多自然科学的书籍，如英国麦开柏著的《进化》、英国伏左勒尔著的《天文学简史》、英国罗素著的《原子说发凡》、王刚森著的《电学 A·B·C》、汤姆生著的《科学大纲》、普朗克著的《科学到何处去》、秦斯著的《环绕我们的宇宙》、爱丁顿著的《物理世界的本质》等。对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具有丰富自然科学知识的著作，他更是反复阅读钻研。

1940年2月，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会，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他说：“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号召“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给在苏联上学的两个儿子岸

英和岸青写信,信中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氮和土壤中的矿物质不易起化合作用，要搞‘合作化’是很困难的”

毛泽东非常重视农业生产，重视农业科技的推广运用。为此，他也潜心研究农业科技知识。

1950年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赛福鼎·艾则孜到北京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会后毛泽东邀请赛福鼎来家做客，并将大孩子毛岸英、侄子毛远新介绍给赛福鼎。吃饭时毛泽东问毛岸英：“刚才赛福鼎同志说，新疆人民的心像哈密瓜一样的甜。讲得好，真善美都是甜的。我问你，哈密瓜为什么那么甜？你知道吗？”

“可能是新疆的气候、土壤和内地不一样的缘故吧。”毛岸英考虑了片刻，用没有把握的口气回答。

“你说呢？”毛泽东问毛远新。

毛远新眨了眨眼，想了想，摇摇头。

毛泽东说：“有三个条件，这就是土壤、气候和栽培技术。第一，新疆的土壤是碱性土壤，这种碱性物质的化学名字叫碳酸钠；新疆的气候是大陆性气候，炎热少雨，昼夜温差大，适于植物多纳少吐；这两条是主要的，再加不可缺少的第三条，就是群众长期以来从选种到种植总结出一套先进的技术。所以

哈蜜瓜是甜的，一般甜度达 16%，最高可达 20%。赛福鼎同志，我讲的对吗？”

“对！对！”赛福鼎用佩服的口气说。他对毛泽东的博学多才既惊奇，又钦佩。

还有一次，毛泽东到安徽视察参观了省里举办的大型经济建设展览。当参观到化肥部分时，毛泽东对随同他一起视察的张治中先生说：“肥料中主要成份是氮，氮性质和氧不同，氧易和人合作。氮和土壤中的矿物质不易起化合作用，要搞‘合作化’是很困难的。”最后一句幽默的话语，逗得周围的人都笑了。大家也真奇怪，毛泽东对农业知识居然知道得这么多。

“看来哈雷慧星是个庞然大物， 其实它很空虚”

1953年2月，抗美援朝战局日趋缓和，国内恢复经济的工作实现并超过了预计的目标。党中央及时决定，从1953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注意力转移到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上来。就在这时，毛泽东南下视察长江。

在长江北岸浦口，毛泽东和随行工作人员议论着：“在这长江天堑上要架上大桥，那将要节省多少时间啊！南粮、北煤的运输要便利多了。”

在南京，毛泽东特意登上紫金山，参观紫金山天文台。

毛泽东一行来到紫金山天文台，受到科技人员的热烈欢迎。在科技人员的指导下，毛泽东从天体望远镜的镜孔里观看了浩瀚无际的宇宙。之后又参观了天文图片展览室。

当毛泽东看到哈雷慧星的图片时，用手指着说：“看来哈雷慧星是个庞然大物，其实它很空虚！”大家听了，都被毛泽东极富有哲理而又幽默的语言逗乐了。

“是的，哈雷慧星的质量很小。”科技人员首肯地说了一句。

“是哟, 幸亏它质量小, 不然这个扫帚星早把我们所在的地球扫掉了, 不知道扫到哪里去了!”毛泽东的话又把大家的笑声推向高潮。

与天文台的科学技术专家们告别时, 毛泽东赞扬了他们的工作, 祝愿他们取得更大的成绩。



“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 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

应该怎样对待外国的东西？怎样看待民族的传统？1956年毛泽东在怀仁堂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涉及到了这个问题。

他在谈话中主张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他说：“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这等于我们穿军装，还是穿现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他还说：“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妇女的服装和男的一样，是不能持久的。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妇女不打扮，是标志一种风气的转变，表示革命，这是好的，但不能持久。还是要多样化为好。”“外国音乐我们能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就对我们有益。”

“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

毛泽东的讲话和文章为什么那么幽默？这源于他思想的深刻性，善于用出人意料的政治家、革命家特有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表达事物。

一次，他在读完白居易的《琵琶行》之后认为，白居易之所以写出这样好的诗篇，是因为“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

再如，他读了《聊斋志异》中的《小谢》这篇故事，深为感动。他感动的不是一般人看到的男女情爱，而是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

1956年，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时候，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借用唐朝韩愈的《送穷文》，说：我们也要写“送穷文”，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把穷鬼送走。

有一次，毛泽东看了南北朝著名诗人谢灵运《登池上楼》这首诗，在旁边批注到：“是造反的檄文。”说他这首诗：“通篇矛盾。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见矛盾所在。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

点。”

最有意思的是,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红楼梦》第二回上,冷子兴讲贾府“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认为冷子兴此话讲得有过。还说:其实,探春也当过家,不过她是代理。但是贾家也确是那么穷奢极侈而垮下来的。冷子兴还说过,贾府这个大家族“今日的儿孙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对此,毛泽东感慨地说,一个家族垮下来,首先在于这个家族的人垮了下来。安富尊荣养成一代又一代无用的膏粱纨绔。贾府的爷们,哪个不是如此!唯一一个有思想、有才华、有个性的,却是这个家族和这个制度的逆子——贾宝玉。这样的家族,这样的阶级,还能有什么前途呢?在这里,毛泽东以政治家、革命家的眼光,透彻地分析了贾府衰败的原因,讲得多么风趣幽默而又深刻啊。

“你是守着元宝当石头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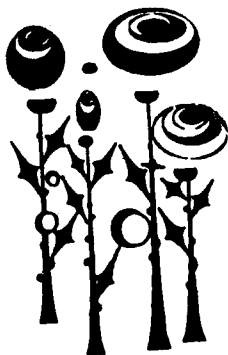
毛泽东很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1947年转战陕北途中,毛泽东率中央纵队转移到神泉堡县。他对卫士李银桥说:“银桥,这里有座白云山庙,我想去看看。”还自言自语地感叹道:“古代灿烂的文化,都是和宗教紧密相连的哟!”

那天天刚亮,毛泽东就醒来,连往常习惯的看报纸也不看了,急着要去看寺庙。当李银桥牵过马来,毛泽东却抓起根柳木棍,手腕一旋,笑着说:“不骑马了,看庙嘛,走去才显得虔诚。”

当地县长闻讯赶来,陪毛泽东去看庙。毛泽东问他:“你是父母官,你说这座寺庙为什么叫白云山庙?”县长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既然山叫白云山,盖在这山上的庙当然就叫白云山庙了。”毛泽东摇摇头,说:“我听老百姓讲,这山顶常有白云缭绕,依山建了50多座殿庑亭阁楼台,重叠连云,远望似漂浮于白云之中,所以叫白云山庙。”县长对毛泽东了解寺庙如此细致,深感叹服,连说:“还是主席调查得仔细。”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又问:“这庙是什么时候建的啊?”县长很为难地答道:“好像有年头了,说不准。”毛泽东批评说:“创于明,增修于清。你这父母官,治下只有两处名胜,这里一

个，香炉寺一个，你竟还搞不清。这首先是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你是守着元宝当石头啊！”



“孔老夫子有病啊!”

毛泽东整日连续高强度脑力劳动,使他的饮食起居很无规律。按照医学上的一般规律,这样的生活方式是很容易引起各种疾病,影响身体健康的。可是毛泽东除了患有失眠症外,其他什么事也没有。这是为什么呢?长期跟随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通过观察研究发现,除了毛泽东长期以来对这种无规律的生活方式形成习惯,自我适应,不成负担,主动自由以外,他也还有一些良好的饮食习惯。

比如,饮食内容是荤素搭配,素菜中青菜居多,口味清淡、喜食粗米杂粮,食不过偏,杂食多样,而且每餐都以不过饥、不过饱为准。“二米饭”有大米、小米掺杂,还常加点红薯、芋头、百合之类。菜以绿叶菜为多,多粗纤维。

毛泽东常为自己的饮食内容而自豪,他对徐医生说:“我的生活里有四位药:吃饭、睡觉、喝茶、大小便。能睡、能吃、能喝、大小便顺利,比什么别的药都好。”这反映出毛泽东开朗、豁达、乐观、自信的性格,而瞧不起孔圣人的养生之道。

有一次,毛泽东对徐涛说:“孔老夫子吃饭很讲究,有十不吃:鱼和肉不新鲜不吃,食物变色变味不吃,烹调不合宜不吃,不到吃饭时间不吃,这些都很合乎卫生嘛!不过,孔老夫子有

病啊!”

“我没注意这个问题。”徐医生很奇怪，毛泽东怎么会知道两千年前的孔夫子有病，史书上可没这方面的记载呀？

“你应该给他诊病，我看他有胃病。”毛泽东风趣地说。

“你怎么看出来的？”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东西搞得那么精细，不是消化不好吗？再说他常喜欢吃姜。你们西医研究不研究姜的作用？”

“中医研究的比较多！”徐医生想是这样的，就回答了。

“姜性温，孔老夫子有胃寒，用姜去暖寒胃。老百姓不是喝姜糖水嘛，去寒发汗治感冒。我看他还有胃下垂。”

“你怎么又给诊断出一个病来了？”徐医生好笑地说。

“他胃不好，又忙着周游列国，吃了饭就坐车子颠簸，还不得胃下垂？”毛泽东不紧不慢地笑着说。

徐医生听了也会意地笑了起来。

“一斤土壤里有多少细菌呀？”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来到吉林省长春市视察。14日早饭后，他首先接见了吉林省党政负责同志。

接见中，毛泽东一再强调发展农业的重要性。他说：“农业搞不上去要误大事的，其他工作会受到影响。抗美援朝时期，不得不把重工业放在优先地位，但我们始终兼顾着农、轻、重的比例协调。苏联问题暴露出来以后，更要吸取他们的教训。而且要把农业搞上去，用小农经济的办法不行，要搞大农业，要改变生产条件，要实行科学种田。”

说到这里，为了引起大家对科学种田的兴趣，毛泽东突然发问：“一斤土壤里有多少细菌呀？”大家对这个问题都没有想到，将了一军，顿时，气氛有些尴尬。

毛泽东马上微笑着勉励大家说：“不怕不知道，就怕不肯学。”他给大家讲了肥料被作物吸收的道理，说这里有细菌帮的忙。

他问大家看没看过土壤学方面的书籍，还给大家讲了土壤的团粒结构，说这种结构一遭破坏，土壤就会板结，因此要多搞农家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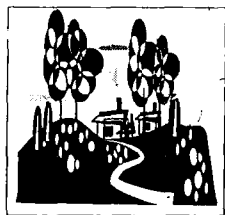
他问当地有哪些农家肥，当他听到草炭这个名词时，表现

出极大的兴趣,详细询问了它的形成和效用。

毛泽东对在座的干部说:“做领导工作,除了政治理论,还要多读一点专业方面的书。去年整风,有的朋友不是提意见吗,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们都要学习,争当内行哟!”

接见中,毛泽东还介绍了中外土壤学的一些著作。他说他赞成一位土壤学专家的观点:“‘没有瘠薄的土地,只有拙劣的耕作技术。’地薄不打粮,人可以改良土壤嘛,人定胜天嘛!”

毛泽东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高度重视,给当时在座的干部留下深刻印象。“一斤土壤里有多少细菌”这个问题,也成为鞭策大家努力钻研科学技术的强大推动力。



“是先盖起这间房子后搬来沙发呢， 还是先摆好沙发再盖起这所房子？”

在中南海，毛泽东书屋里有个大沙发，准备搬到另一个屋里去。卫士长李银桥指挥封耀松等几个卫士来搬。可是沙发大，门小，试过几次搬不出门，只好又放回原处。

毛泽东进来了，问：“怎么没搬出去？”

小封说：“门太小，出不去。主席，干脆就留在屋里吧。”

毛泽东看了看大家，然后在沙发左右踱步。时而望望沙发，时而瞥一眼门，终于停住步，慢条斯理地问：“有件事我始终想不通。你们说说，是先盖起这间房子后搬来沙发呢，还是先摆好沙发再盖起这所房子？”

这么一问，卫士们都不好意思起来。

毛泽东微笑着，不再说什么，出去继续散他的步。

“还愣什么？搬吧。”李银桥招呼一声，大家便又干起来。这次动了脑筋，不时变换方式，终于把沙发立起来，先出沙发靠背，在某一角度及时转弯，将沙发搬出了门。

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不时笑着望望大家。沙发一出门，他便走过来问：“怎么样啊，有什么感想？”

小封说：“没错，是先盖房子后搬来沙发。”

大家听了都笑起来。

毛泽东也笑着说：“我也受到一个启发，有一点感想。世界上干什么事都怕认真两个字，共产党就最讲究认真。”

后来，毛泽东去莫斯科访问，他在会见我国留学生和实习生时发表讲话，其中就讲到：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

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伟人，在全世界都享有崇高威望。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在这无穷变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究竟居于什么地位，对此毛泽东本人是怎么看待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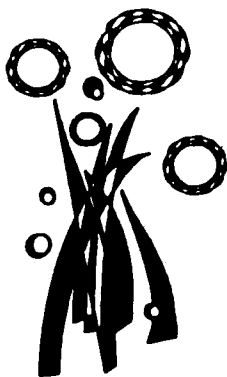
1965年1月，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来华访问，向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是按照自己的环境来创造的。你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环境。很多人发生疑问，在比较安逸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将做出些什么来？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

毛泽东回答说，他也不可能知道。他不相信有谁能够确有把握地知道。将来的事情要由将来的后代去决定，而且按照我们不能预见的条件去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后代应当比我们更有知识，正像资产阶级民主时期的人比封建时期的人更有知识一样。今天的青年和未来的青年将按照他们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评价革命的工作。是他们的判断，而不是我们的判断将起决定作用。

讲到这里，毛泽东的声音低下去了，他半合上了眼睛。人

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得越来越快了,他说,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



“对称何以那么重要？”

1974年5月30日，毛泽东接见了华裔美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

令李先生惊讶的是，毛泽东见到他后，非常认真地问：“对称何以那么重要？”

这是一个物理学上的问题，在这时，毛泽东何以对此问题那么有兴趣呢？

根据韦伯氏大辞典解释，对称是指平衡的各个部分或者指平衡的各个部分产生的形式美。在汉语中，对称的涵义几乎与此相同。李政道为了形象地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拿起桌上的一支铅笔放在一叠纸上，用手指朝铅笔一弹，铅笔就转起来，笔尖转过来又转过去。李政道指出，这个过程没有一刻是静止的，但在整体上它具有对称性。

毛泽东很欣赏这样的演示，并且问到对称的更深层含义，问到物理学家能否仅仅根据对称性原理真正描述出普遍规律。李政道解释了爱因斯坦根据等价原理的对称要求而建立的相对论所具有的深远意义，还与毛泽东讨论了粒子和反粒子之间的对称，以及它们产生和湮灭的动力学过程。对称所具有的美感简洁性与其含义的深刻普遍性的统一，使毛泽东

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还向李政道谈起,对自己一直没有更多的时间学习自然科学知识而遗憾,还谈到他年轻时就读过的一些科学书籍,如生物学家阿瑟·汤姆森所著的一套著作,当时毛泽东完全沉醉在自然科学的探讨中。

后来,俩人的谈话话题又从自然现象转到了人类社会,李先生强调教育同社会健康发展和社会昌盛之间的密切关系。毛泽东赞同李先生的建议,认为中国的教育应该加强。

这次谈话究竟对当时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不得而知。但是,毛泽东虽然支持“批林批孔”,却不愿意重新出现社会大动乱,并采取了制止混乱局面发展的一系列措施,这是事实。毛泽东还对江青等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图谋进行了多次批评,使“四人帮”不得不暂时稍有收敛。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对社会和国民经济各条战线的混乱局面开始了全面整顿。后来,李政道回忆说:“面对文化革命造成的混乱局势,尽管这次会晤对起到安定的作用微不足道,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或许点明了一种相关性,即人类探索自然界对称的内在冲动和建设一个美好的、稳定的社会的欲望,是一脉相承的。”

“他们那个集团的 党性，就是信佛教”

《西游记》里唐僧师徒四人，是靠什么信念战胜重重困难，把个性如此不同的四个人凝聚成一个团结整体的呢？

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谈到翻译工作时，对此有过别具一格的解释和发挥。他说：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比如唐僧取经，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回来，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取经回来后就设翻译馆，翻译佛经。唐僧不是第一个留学生也是第二个留学生。还讲师徒四人的个性也很典型，唐僧、孙猴子、猪八戒、沙僧，他们的个性各个不同，他们那个集团的党性，就是信佛教。

毛泽东巧妙地把古代《西游记》上取经的佛教师徒的信念，演绎成了今天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党性和个性相统一的比喻。

哲理 教育篇

毛泽东幽默趣谈

“你们可成了神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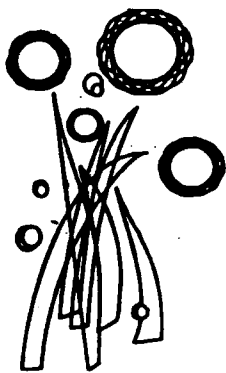
在艰苦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总是用以身作则的模范行动来教育大家，以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来感染大家，以斗争的深远意义来鼓舞革命队伍。1936年7月，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大学”一科随党中央来到保安县。当时真是一无所有，当地群众说：“保安穷山窝，破庙比房多，菩萨比人多”。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大学”一科的师生们就以城外山崖上的据说是供奉“原始天尊”的石洞为校舍，开始了学习生活。

这些山洞荒废了不知多少年代，积了厚厚一层羊粪、兽骨和腐草，人走进去，扑面飞出一群群蝙蝠。“红军大学”一科的学员全是师以上干部，大家白手起家，因陋就简，清除了脏物，又自己制造了石黑板、石粉笔、石桌、石凳、石床、石枕，甚至连油灯都是石头做的。师生们说：“嗨！我们又回到石器时代啦！”

这期间，毛泽东经常来看望师生们，他表扬了“红军大学”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建立“最高学府”的精神，还风趣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古人云，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你们可成了神仙了。好好

‘修炼’吧！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无事，你们就在这里‘参禅悟道’；天下大乱，你们就出洞下山，救苦救难！”

毛泽东的一席话，说得师生们心里热乎乎的，学习劲头更足了。后来“红军大学”又由保安迁到延安，成立了“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红军大学”和“抗大”为中国革命培养出了大批人才，也成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光荣革命传统。



“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地去西天取经，……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

以形象比喻讲清道理，在幽默诙谐中使人受到教育，这是毛泽东讲话的风格特色。

1938年4月，毛泽东在同“抗大”第三期毕业学员的讲话中，要求学员们努力学习和掌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句话。为了说明这三句话的意义，毛泽东引用《西游记》中的人物作譬喻。他说：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地去西天取经，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机灵，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毛泽东还特别赞扬了那匹白马，说：你们别小看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这是王实味挂帅了， 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

1942年3月，延安《解放日报》副刊连载了王实味的杂文《野百合花》。文章把延安的生活说成是“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并用它与作者的女友、共产党员李芬被舅父出卖遭到枪杀之事作对比，讽刺延安的生活“与这气象不太和谐”。文章还把延安干部描写成“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对延安的供给制耸人听闻地称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

毛泽东看后说：“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

后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批评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说：“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

场上去了。”

对于人民的缺点的批评,要马克思主义挂帅,不能是“王实味挂帅”,这就是毛泽东的意思。



“我们的亲爱的国民党先生们， 可否把你们的这种什么‘蒙汗药’ 或‘定身法’给我们宣示一二呢？”

1943年六七月，国民党顽固派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叫嚷“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调集28个师又6个旅的兵力，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为此，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社论，质问国民党，动员抗日的各方面舆论和各方面力量，行动起来，制止内战危机，打退顽固派的反共高潮。

社论写道：“请问干这些事的国民党人：你们拿背对着日本人，日本人却拿面对着你们，如果日本人向你们的背前进，那时你们怎么办呢？”“照你们的说法，中国境内只有共产党是‘破坏抗战’的，你们则是如何如何的‘民族至上’，那末，背向敌人，却是什么至上呢？”“如果事变的结果，只是你们旗开得胜地‘统一’了边区，削平了共产党，而日本人却被你们的什么‘蒙汗药’蒙住了，或被什么‘定身法’定住了，动弹不得，因此民族以及你们都不曾被他们‘统一’了去，那末，我们的亲爱的国民党先生们，可否把你们的这种什么‘蒙汗药’或‘定身法’给我们宣示一二呢？”“假如你们也没有什么对付日本人的‘蒙

汗药’、‘定身法’，又没有和日本人订立默契，那就让我们正式告诉你们吧：你们不应该打边区，你们不可以打边区。‘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两个故事，是有道理的。你们应该和我们一道去把日本占领的地方统一起来，把鬼子赶出去才是正经，何必急急忙忙地要来‘统一’这块巴掌大的边区呢？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而却急于进攻边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夫！可耻也夫！”

毛泽东写的这篇社论，揭露了蒋介石制造内战，破坏抗日的罪行，赢得了国际国内抗日舆论的支持。在边区军民的坚决抵抗和国际国内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未敢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大规模进攻，第三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了。

“鸡不要杀”

毛泽东讲话总是恰到好处，该长的就长，该短的就短。而且不管长短，都讲得妙趣横生，既有哲理，又很朴实易懂，大家都爱听。

长的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讲就是几个钟头，大家都感觉不到长，听得忘了时间。

短的呢，在延安有一次开会，大家请毛泽东讲讲时事。毛泽东说：“鸡不要杀，会还是开，搬到山沟沟里也要开。这就是时事！”真是风趣幽默。

原来，当时风传胡宗南的军队要进攻边区，有些人就慌了，有的母亲养鸡下蛋准备喂孩子的，这时却准备杀鸡了。有些原准备开的会也不敢开了。毛泽东早就说过，胡宗南是雷声大、雨点小，告诉大家不必惊慌，可不少人还是有些紧张。这次讲时事，首先说鸡不要杀。既然鸡都不用杀，推理起来形势就还没那么严重。

后来的结果不出毛泽东所料，胡宗南没敢进攻边区。

“阿 Q 斗争起来也算英勇”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这次大会是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史的,它为我们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础。

毛泽东在大会的报告和讲话中,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既看到他们犯错误的一面,又充分地肯定他们对党对革命做出贡献的一面。大会充满了民主与团结的气氛。

在大会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说:“过去常说,团结得像一个一样,那是写文章的词藻。我们这回说,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家庭是有斗争的,新家庭里的斗争,是用民主来解决的。我们要把同志看成兄弟姊妹一样,从这里能得到安慰。疲劳了,可以在这里休息休息,问长问短,亲切得很。至于犯过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我也有过错误。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他还说:“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

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一个队伍里头，人们的思想有正确，也有错误的，经常是不整齐的。但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有好的态度。家庭里很少有开除家籍的事情。阿 Q^① 到底姓什么虽不清楚，但也没有听说他曾被开除家籍。阿 Q 斗争起来也算英勇。他的缺点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加党八股，毫无自我批评精神。人家的疮疤他要揭，他的疮疤人家揭不得。至于教条主义和党八股，那厉害得很，长凳一定要叫长凳，不能叫条凳，叫条凳是路线错误。那样教条主义，那样党八股！但是，写阿 Q 的作家还是喜欢阿 Q 的，因为反革命把他枪毙了。所以对于有缺点错误的人，我们要团结。”

毛泽东在大会预备会上所指出的，全党要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和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教育、团结、治病救人的方针，不仅成为开好党的“七大”的重要工作方针，而且成为加强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方针。

① 阿 Q 是鲁迅小说《阿 Q 正传》中的主人公。

“只要心不黑就行了”

毛泽东除了喜欢游泳,也喜欢跳舞。跳舞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放松和休息。

陪中央首长跳舞的青年文工队员们,早已和毛泽东熟识并成了朋友,她们在毛泽东面前无拘无束,随意说笑喧闹。毛泽东平时埋头工作,沉默寡言,但到了这种场合,也喜欢热闹的气氛,有时也和大家一起说笑,使舞会更加活跃。

有一次舞会中间,毛泽东朝一个女文工队员招手:“老蒋,过来啊。”

“主席,蒋介石才是老蒋呢,你还是叫我小蒋吧。”女文工队员说。

“就是老蒋,那也没得关系,蒋介石要回大陆,我欢迎他,给他个大官做。”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周围的人也都笑起来。

毛泽东坐在座位上,划根火柴,点起一支烟,猛吸了一口,又把烟吞进肚里。毛泽东的这一吸烟过程被女文工队员余琳看了个满眼,她心直口快,嚷了起来:“主席,你抽烟,牙都黑了。烟跑到肚子里,把肠子都熏黑了。”

毛泽东笑哈哈地看她一眼说:“那也没得关系,只要心不黑就行了。”说得大家又笑了起来。

“哪有人能活一万岁的？ 活不到，那就吃掉”

1954年冬天，朝鲜金日成主席给毛泽东送来了24箱苹果。因为是金日成主席特赠，又是不宜保存的果品，毛泽东没有让按规定送负责礼品的部门处理，而是吩咐把苹果转赠给警卫部队，让战士们分享。

听说苹果是毛泽东转赠让大家吃的，战士们非常高兴。可等他们七手八脚把果箱打开一看，却一个个都愣住了。只见满箱的国光苹果，又大又整齐、匀称，而且每个上面都有一行字——毛主席万岁。

大家清楚，这不是一箱箱普通的苹果，而是朝鲜人民专门为赠毛泽东而精心挑选的，以此表达对毛泽东最深厚的情意和最衷心的祝愿。这“毛主席万岁”怎么能一口口吃掉呢？不能吃又该怎么办？一时间，大家谁也不知如何是好。

卫士长李银桥便把这一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听后，笑着摇摇头说：“我就不喜欢这个口号。哪有人能活一万岁的？活不到，那就吃掉。”

有了毛泽东这句话，24箱苹果就如数被警卫战士们分享了。

“你说当皇帝与拉车哪个更难啊？”

毛泽东喜欢看《资治通鉴》，他曾说，这部书他读过17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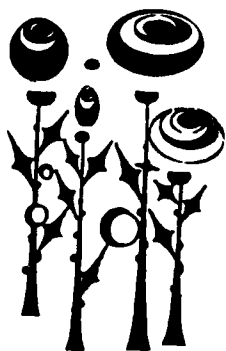
关于毛泽东读《资治通鉴》，也有许多幽默故事。

在记载五代名将李存勖一节中，李存勖具有“若其不济，当聚吾家于魏宫而焚之”的破釜沉舟的勇气。毛泽东非常赞赏这种精神，他在书边批道：“生子当如李亚子”。

说到《通鉴》上记载3岁孩童当了皇帝，毛泽东曾风趣地对身旁工作人员说：皇帝是世袭啊！只要老子是皇帝，儿子再糊涂也得当皇帝。中国历史上有3岁的皇帝，但没有过3岁的娃娃拉着车满街跑的，6岁也不行。你说当皇帝与拉车哪个更难啊？

毛泽东还思考了《通鉴》为何只写到五代为止。毛泽东说：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所以历史上的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你看《通鉴》最后一段写了赵匡胤，说太祖皇帝如何勇敢，如何英明，如何了不得，简直白玉无瑕，十全十美，全信行吗？

他还说：“《资治通鉴》是一部大相砍书，砍得相当有味，砍得十分精彩”。他感叹：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碰到评级这个机会”

毛泽东喜欢看戏，而且他看戏的角度也常常与众不同。一般常人看戏看情节，看热闹，毛泽东则是喜欢从工作方法的角度，从思维方法的角度去看，从中吸取经验，吸取戒鉴。他在讲话中就常常把戏中的情节引用到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上去，以回答和评论这些问题，显得既生动活泼，又很有说服力。

比如看《打金枝》，说郭子仪的儿子与皇帝的女儿结亲后，闹矛盾，郭子仪和皇帝各自批评了自己的孩子，问题解决得很好。这是说解决内部矛盾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看《打渔杀家》，毛泽东就曾对一位起义的原国民党将领说，萧桂英一度动摇过，后来醒悟过来，终于一起去复任，这就好嘛！我把你比作萧桂英，萧桂英终于是革命了。这一席话使那位朋友很受教育 and 感动。

1957年，毛泽东在一次大会上，批评少数党员干部争地位、争薪水的不正之风时，引用《林冲夜奔》那出戏上的话说，那上面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请看：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因未碰到评级这个机会。同志们,这个风也要整一下吧!我们大家回去劝他一下,男儿有泪不轻弹是对的,伤心处是什么伤心处呢?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危急存亡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可以弹几滴眼泪的。



“我们是住在天上，我们也算神仙”

1958年4月的一天，卫士张仙朋陪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

走着走着，毛泽东突然问张仙朋：“张仙朋，你这名字有意思。我问你，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

“我们住在地上，怎么是天上呢？”张仙朋回答，他觉得毛泽东问得怪。

“不，我们是住在天上。”毛泽东说。这时，他的思想似乎已进入了浩渺的宇宙空间。他解释说，我们从地球上看到别的星球是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也有人，他们一看我们，我们不也就是在天上吗？整个宇宙，到处都是在天上，又在地上。

“我们算不算神仙？”毛泽东又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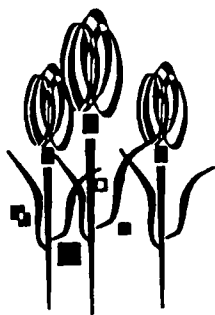
“不算。”张仙朋回答。

“不对，神仙是住在天上的，我们住在地球上既然也算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神仙？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不是也把我们看成神仙吗？”

“主席是神仙，我是主席的朋友。”张仙朋笑着说。毛泽东听了也大笑起来。

在1958年大跃进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提倡学习革命的

辩证法,提倡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上述对话内容他在会上就进过多次,在广大党员、干部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要研究个‘睡觉宪法’”

1958年下半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大办钢铁运动形成高潮,不少干部头脑开始发热,“左”的错误逐渐发展起来。这时,毛泽东觉察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办钢铁运动中的一些问题和偏差。11月1日晚,毛泽东在河北省农村视察后乘专列到达河南新乡车站。毛泽东在列车上召开座谈会,调查了解情况。

座谈会上,有人对毛泽东说:“工地上群众的情绪很高,干劲很大,苦干实干拼命干,连觉都不愿睡。”

毛泽东马上说:“你们的脑子热得很,不睡觉怎么行!”还说:“吃饭是一件大事。你们对群众睡觉研究不研究?比如做活紧的时候,要不要就地睡半小时?每天一觉要睡6小时,睡5小时就是没有完成任务。做活松时睡7小时,在工地上让群众睡1小时、半小时。这要当成任务,要强迫命令。吃饭睡觉都是件大事。……要研究个‘睡觉宪法’,成年人每天要睡8小时,至少6小时,青年人每天要睡10小时,最少8小时。要‘强迫命令’,这个‘强迫命令’老百姓欢迎,是强迫干部执行。听田家英同志说,七里营的社员摘棉花,上午的效率比下午高,就是因为中午没有休息好。吃饭、睡觉你们都要当成大事研究,这才叫优越性,优越性觉都不能睡能行嘛?”

“太密了出来也要挤死”

1958年11月间，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在新乡接见了新乡地委的负责同志。

座谈中，毛泽东问分管农业的地委负责同志：“种小麦搞不搞密植？一亩地下多少种子？”

地委负责人回答：“我们搞了密植，一亩地下120来斤种子。”

毛泽东问：“下这么多种子能出来吗？”

地委负责人回答：“种得早的已经出来了。”

“太密了出来也要挤死。种地不能蛮干，要讲科学。”毛泽东直接了当地说。

这次接见，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人们不讲科学，“蛮干”的危害。寓意深刻，使在场的同志深受教育。

治国 安邦篇

毛泽东幽默趣谈

“碰了钉子时，就向钉子 学习，问题就解决了”

红军长征到陕北时成立的“中国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毛泽东亲手创办起来的，也是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成长壮大的，他为创办“抗大”倾注了满腔热血。

毛泽东经常到“抗大”讲授军事、政治、哲学、党的历史和路线方针政策等。他讲课风趣、幽默，学员们特别喜欢听。为帮助学员们认识逼蒋抗日政策，他全面讲述了当前党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解释了为什么要把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就是要逼蒋介石走抗日的道路。当西安事变发生后，师生们听说抓住了蒋介石，都欣喜若狂。可事隔几天，中央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不少人在感情上接受不了。觉得蒋介石杀了我们那么多人，又一向奸诈刁滑，不能轻易放虎归山。毛泽东又来到“抗大”给学员上课，他说：在目前的形势下，杀了蒋介石，会使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和混乱，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何况杀了一个蒋介石，还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蒋介石。诸葛亮对孟获还搞七擒七纵，我们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呢？

毛泽东还多次为“抗大”题词，亲自为学员写信，鼓励他们

的创举。他还给学员回信,答复他们提出的问题。有个叫于江的学员,碰到了难题解决不了,直接找到了毛泽东。毛泽东为他题词:“碰了钉子时,就向钉子学习,问题就解决了。”毛泽东的教育和帮助,增强了这个学员克服困难的信心。在毛泽东的关心、教育下,“抗大”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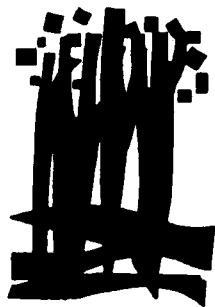


“自由资产阶级身上也出了那样一种‘香’，这种香，就是‘软弱香’”

如何对待自由资产阶级？毛泽东主张既要坚决地联合他们，又要同他们的软弱性作斗争，不能让这种软弱性影响我们的战斗性。

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风趣地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对像章乃器这样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只有我们坚决地联合他，才能在长期的经验中教育他。以后自由资产阶级还会拿它的软弱性经常影响我们，因为它有那样一种性质，好像《红楼梦》上的林黛玉洗澡后身上发出的那样一种‘香’，自由资产阶级身上也出了那样一种‘香’，这种香，就是‘软弱香’。它出了那种‘香’就要找市场出卖，有目的地向我们延安送，给我们党以坏的影响。我们的宣传有时也太刺耳，玫瑰花虽然可爱但是刺多扎手，‘羊肉好吃烫得慌’。对于那些绅士，玫瑰花虽可爱，但因为刺多他们不大喜欢。他们喜欢薛宝钗，不喜欢探春。这个是很麻烦的。同志们！麻烦还在后头，不要怕麻烦，要革命就会有麻烦，而且有时非常麻烦。如果想省掉麻烦，就坐在家里抽长烟管。现在夏天来了，坐在树底下，拿一把大蒲扇，那麻烦比较少。

但是还有风波,鲁迅不是写过一篇《风波》吗?世界上不会没有风波,怕风波就不能做人,那就赶快到阎王那里去交账。我们党现在经常遇到风波,有大风波,中风波,小风波,我们不要怕风波。”



“把水搞浑，浑水摸鱼嘛”

1948年5月，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驻留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在这里，党中央召开许多重要会议，为进行战略决战作了一系列重大决策。

毛泽东的工作非常紧张，但在工作之余，喜欢外出散步，与老乡闲聊。

一天，毛泽东散步走出了西柏坡村外，来到滹沱河边。见一位农民正在挑水浇地，他便走上前去与农民拉起家常来。

“滹沱河里有鱼吗？”毛泽东问。

“有的。涨水时能抓到一两斤重的大鱼。”老乡回答。

毛泽东一听，来了兴趣，四下张望了一下，便迈步朝前走去。

不一会儿，来到一个池塘前。

毛泽东回头问警卫人员：“你们说，这里面有鱼吗？”

“没有，这塘水太清，‘水至清则无鱼’。”一个战士回答道。

“那我们就实践一下，如果摸不到鱼，就说明你那条道理有一定的普遍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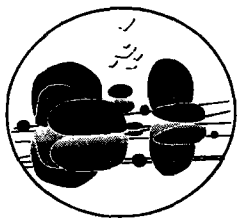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一边说着，一边就动手脱外衣。几位战士先跳到水里，说：“我们来抓，只要有鱼，准能抓到。”

大家折腾了半天，倒是老碰到鱼，但赤手空拳，加上鱼身又滑，只抓到一两条，成果不理想。

毛泽东见此，急得在岸上喊：“把水搞浑，浑水摸鱼嘛。”

下水的战士手脚并用，一会儿功夫就把水塘搅得黄乎乎的。果然，鱼被呛得在水底呆不住了，纷纷浮出水面，大口大口地喘气。战士们只一会儿，就抓了十几条大鱼。毛泽东高兴得像孩子一样，连连叫好。

这天晚饭，大家吃上了香喷喷的红烧鱼。



“走，进京赶考去！”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人员，分乘20余辆汽车，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出发，驶往刚刚解放的北平。

这天，毛泽东和所有的随行人员一样，显得格外兴奋。临上车时，他意味深长地对周恩来说：“走，进京赶考去！”

周恩来会意地笑道：“我们应当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用手在空中有力地一挥，神情庄重又信心十足地启程了。

25日，毛泽东及其主要随行人员抵达北平。傍晚时分，毛泽东前往香山，准备暂时下榻在双清别墅。

汽车稳稳地停下，毛泽东第一次踏进双清别墅的院门。忽然，毛泽东发现院子里的电灯明晃晃的亮着，而此时天色尚早。他不禁皱起眉头，连忙走去关掉了电灯，然后走进房中。

这一举动虽小，却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留下了很深印象。时至今日，他们仍能清楚地告诉后人，毛泽东来到双清别墅后，也可以说进驻北京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关掉院子里的电灯。

关于李自成进北京之事，郭沫若 1944 年 3 月 19 日发表在重庆《新华时报》上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这样写道：“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了，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的，却也就是这位刘将军。”

毛泽东在延安读了《甲申三百年祭》，立即给予热情的肯定。4 月 12 日，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特别说明：“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泽东进北京后，正是点点滴滴、扎扎实实地带头实践他向全党所提出的要求。

“万马齐喑究可哀么”

1950年，毛泽东针对有些人说京剧是封建主义的，应该全部取消的说法，提出京剧还是要的，不单是京剧，各种戏曲形式都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加以继承，并给戏曲界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1956年2月，毛泽东在居所颐年堂开会，在听取了有关方面的汇报和意见后，决定对科学工作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

1956年4月，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在28日作讨论总结时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5月2日又开了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在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的内容之后说：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2000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需要这个。在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党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基本性的也是长期性的方针。

“双百”方针的实行，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艺术和科学的发

展,但是苏联方面不理解。1957年4月以伏罗希洛夫主席为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来华访问时,伏罗希洛夫对毛泽东说:“亲爱的毛泽东同志,我有几个问题,可以提吗?”他的脸上露出关切和隐忧的神情。

“什么问题啊?”毛泽东笑容可掬。

“你们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是什么意思?”

“万马齐喑究可哀么。”毛泽东风趣地用清朝龚自珍一首诗中的一句做了回答。

那首诗的全文是:“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不要说三千公尺上空没有原子弹，就是一万公尺上空也没有原子弹”

在我国本世纪 50 年代国家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由于考虑国防安全，把工业建设的重点放到了内地，因而上海等沿海城市没有大的投资，发展不快。

对此，毛泽东在一次汇报会议上说：“上海地区不作大的扩建还值得考虑。”“沿海工业老底子还是要利用和发展的。”针对有些同志怕打起仗来受损失，不敢在沿海搞工业的思想，毛泽东幽默地说：“好像原子弹已经在三千公尺上空了”；“不要说三千公尺上空没有原子弹，就是一万公尺上空也没有原子弹。”

他还强调说：“不要说有 10 年、12 年，我们应当办好沿海工厂；就算只有 8 年、7 年、6 年，甚至只要有 5 年时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 4 年工厂。办了 4 年以后，等到第 5 年打起来了再搬家，也完全合算！”

这是毛泽东在 1956 年二三月间说的，他的这些意见，是与他几个月前在上海的视察分不开的。

1955 年下半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进入高潮，胜利完成“三大改造”已经指日可待。在行将跨入全面开展社会主

义建设的历史新阶段之际，毛泽东从调查研究入手，深入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海是毛泽东这一时期调查研究的重要地区之一。

1955年11月5日，毛泽东在上海市委负责人柯庆施、陈丕显、曹获秋等陪同下，对上海进行了实地考察。

这天，毛泽东乘坐“港申”轮视察了上海港。他伫立船舷边，饶有兴趣地巡视着浦江两岸繁忙的建设景象。同时听取了上海港务局党委书记韩克辛关于旧上海港改造、新上海港发展的情况汇报。当汇报到现代工业的发展仍然是“城以港兴”，如果没有港口，没有交通运输的便利，就没有上海城市的繁荣时，韩列举了许多事实：解放后6年里，上海港经过整顿与建设，吞吐量已由1949年的194万吨，发展到1100多万吨，增长近6倍……。

毛泽东听了汇报十分高兴，他说：“上海是我国第一大港，又是国际性港口，一定要把它管理好。”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又视察了刚完成公私合营的申新九厂和江南造船厂，由陈毅等上海市委负责人陪同，参观了江南造船厂正在总装的我国第一艘中型鱼雷潜艇。

在沪的调查研究活动，使毛泽东看到了上海人民蕴藏着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涨热情和聪明才智，也了解到上海这样的沿海老工业基地具有不容忽视的独特优势，大有潜力可挖。此后不久，即1956年二三月间，他集中一个多月时间，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汇报，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和问题，进行更为广泛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在听取轻工业部、纺织部汇报关于发展轻工业和沿海工业时，毛泽东提出：“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发展，不能限制”，“轻工业70%在沿海，不积

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

后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的谈话中还颇有感触地说：“过去我们计划规定沿海省份不建设新的工业，整整耽误了7年时间。”

根据毛泽东“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老底子”的意见，上海在充分利用和发挥轻工业优势的同时，加强重工业生产，并经过三次工业大改组，依靠上海科技力量向“高精尖”的目标发展。到1965年上海已经被建设成为我国的一个先进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基地，取得了很多举世瞩目的成就。



“组织一万人的军队和组建 一万人的工厂，哪个更难些？”

“组织一万人的军队和组建一万人的一个工厂，哪个更难些？也许许多人都会认为前者更难。”在1949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就与周恩来谈起过此问题。

那是在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来到春耦斋参加舞会。跳了不长时间，毛泽东便坐下来与周恩来谈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构思。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我们从前组织一万人的军队，觉得不成问题，还比较好办，只要有了人，没有武器也不要紧，我们可以从敌人手中缴获武器武装起来。可是现在要办一个一万人的工厂，就不太容易了。”

周恩来深有同感，笑笑点点头。

毛泽东接着说：“盖工厂要搞基本建设，先得投资，要花钱，要设法搞经济的来源。工厂盖好了，还得买机器，又有机器的来源问题。工厂和机器问题解决了，我们还有缺少设计人员和工厂的技术人员的问题，还有技术工人问题。这样，一个工厂从基本建设开始，筹办机器设备，工程技术人员培训，

到投入生产,恐怕得3年时间。工厂建成了,还有一些生活设施也得跟上。工人的衣、食、住、行等问题都得解决。”

可不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仅用一年时间,就可以扩大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马。而建一个一万人的大工厂,得要用上三四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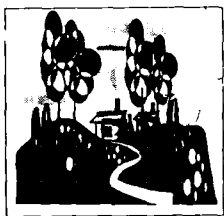
由此想到毛泽东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社会主义’的羊肉应该 比‘资本主义’的羊肉更好吃”

我国的手工业与城乡人民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在刚解放的时候,我国的手工业是分散的、落后的,不能使用新技术,无法形成较大规模的生产。因此党和国家对手工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逐步使它由分散、落后的个体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这一改造过程建国后就从供销入手,到1953年以后,步伐加快。但是从1955年冬季开始,改造步伐急剧加快了,结果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等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1956年3月4日,毛泽东听取了手工业管理局负责人的汇报。当听到汇报说,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引起群众不满意时,毛泽东说:“这就糟糕!”“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剪刀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当他听说北京东来顺的涮羊肉已失去原有的特色时,他幽默地批评说:“‘社会主义’的羊肉应该比‘资本主义’的羊肉更好吃。”对集中过多问题,他说:“天

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毛泽东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中也强调:“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现在云南没有火腿了吗?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按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



“咱们的经是一部好经， 小和尚、歪嘴和尚念错了”

毛泽东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当政策执行错了，或违反了政策规定时，一定要有错必纠，这是我们党的一贯做法。

1950年4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了原绥远起义领导人董其武。在交谈中，毛泽东对他说：“你告诉起义人员，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是希望他们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过去两种制度，有不少是反人民的事情，人民不追究过去了，只看将来。”

可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一些起义人员受了委屈，他们给董其武写信表示对起义有怀疑。1956年董其武到北京参加“五一”节活动，5月13日他带着这些信到中南海去见毛泽东。他对毛泽东说：“主席日理万机，有点小事找您，耽误您的时间。”毛泽东说：“有什么事哩？”董其武说：“过去说对起义人员是‘既往不咎’，现在几乎都咎了。有抓的、有押的、有管训的、有劳动改造的。我接到许多起义人员的信都转到国务院了，问题得不到解决。”

毛泽东听了董其武的汇报，拍着桌子大声说：“咱们的经

是一部好经,小和尚、歪嘴和尚念错了!改!一定能改好!”董其武听了非常兴奋,深深感到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伟大襟怀。



“现在春天来了嘛, 100 种花 都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

1956 年初, 有一位在中国讲学的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 关于孙中山的世界观的不同看法。他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对孙中山的世界观的论点的评价, 不同意孙中山是唯心论者的说法。他认为孙中山是唯物主义者。陪同人员将这反映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 认为应该跟苏联同志讲一讲。

中共中央宣传部将这个报告送给了毛泽东。1956 年 2 月 19 日, 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伯达、陆定一等写信指出: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 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 什么人都可以谈论, 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 不要向尤金(苏联驻华大使——编者注)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 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 那是完全错误的。”

同年 4 月,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他说: 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 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 这种学术可以, 那种学术也可以, 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 你如果是真

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毛泽东风趣地说:现在春天来了嘛,100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他还说: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2000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我爱进步的中国， 不爱落后的中国”

1953年2月，在全党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庆祝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提前两年完成，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到来的时候，毛泽东南下视察了武汉。

在视察结束后，毛泽东把中南局的几位领导叫到他的身边。

毛泽东对他们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国有三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打倒了。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手工业和文盲三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人不能用对待前三个敌人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文盲要扫除；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

他还说：落后的东西都要逐步废除，木船是民族形式，要不要用轮船代替？为什么人们不喜欢旧厕所，要有抽水马桶？飞机、汽车、坦克哪一样是民族形式？这就是说，要提倡进步，反对保守，反对落后。还是大洋房子比小平房好。有些人对保护老古董的劲头可大了，连北京妨碍交通的牌楼也反对拆除。

是的,此时的毛泽东,心中正燃烧着一股烈火。在打倒三大敌人,夺取政权后,他要带领中国人民,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把旧中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现代化的新中国。



“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 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 一遇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

1958年公社化运动中，有些人企图过早“进入共产主义”，过早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作用。

为了从思想理论上解决这个事关社会主义前进方向的重大问题，毛泽东下功夫研究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小册子，毛泽东读了许多遍，经他批注的就有四个本子。他还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作过长篇评论。

毛泽东在批注中指出：“列宁是要以全力发展商品，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许多批注反映了毛泽东当时对社会主义社会还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的基本观点，并且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是对斯大林的某些论点的突破。

当时，陈伯达、张春桥等人是企图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否定商品、价值规律的代表人物。他们在起草新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时，有意识地避开“商品”二字，只提产品交换，不提“商品交换”。毛泽东对他们进行了严肃批评，说：“现在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想立即进入，不要商品了，看了商品

就发愁,以为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他就没有区别资本主义商品和社会主义商品在性质上的差别。在社会主义阶段,应该充分发展和利用商品生产。”

当时,有人担心发展农村商品生产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对此,毛泽东说:“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就有做生意的意思。商品生产要看他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奴隶社会时有商品生产,但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商品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他还说:“中国是商品生产最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

针对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读马、列断章取意,不是完整地全面地去理解的问题,毛泽东批评说:“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遇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你们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第三十六条中,尽量不用明显的文字,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他还说:经济学家“左”,想蒙混过关,叫抓到了小辫子,有四十条草案为证;我的这些意见可能触犯“左”派。

后来,他在《关于读书的建议》中,又一次批评了这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

“越怕鬼就越有鬼， 不怕鬼就没有鬼了”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总结中国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这个论断，武装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加强了中国人民的胜利信心，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

1959年4月15日，在第16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在通报当时国内形势和国际斗争形势，讲述党的大政方针时，又提出了“不要怕鬼”的话题。

他说：从去年8月起，出了两件事，都跟我们有关。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西藏问题。接着他回忆起1958年炮击金门，取得重大胜利。说：这自然是令人快慰的，说明我们有力量，不怕打。更重要的是，这是“我们祖国的土地”，我们有理由捍卫，别人（美国）管不着。所以，“我看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我们都不怕。”

说到这里，毛泽东用生动的话语讲述了《聊斋志异》里一个狂生不怕鬼的故事：

《聊斋志异》里有个狂生，晚上坐着读书，有个鬼吓他，从窗户口那个地方伸一个舌头出来，这么长（毛泽东比划了一下），它以为这个书生就会吓倒了。这个书生不慌不忙，拿起笔把自己画成张飞的样子，画得像我们现在戏台上的袁世海的样子，然后也把舌头伸出来，没有那么长就是了。两个人就这么顶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那个鬼只好走了。《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

一番话，说得人们哄堂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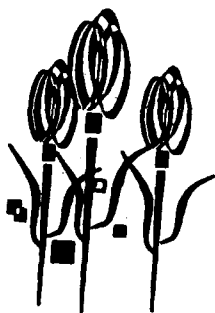
1959年5月6日，在中南海紫光阁，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在这里会见11个兄弟国家的访华代表团，以及这些国家的驻华使节。这是个高规格的会见。3月份刚发生了西藏分裂分子的武装叛乱，中印关系也陡然紧张，这是兄弟国家所关心的问题。毛泽东、周恩来、陈毅也是要借此机会向国际上表明中国的态度。

在会见中，周恩来、陈毅向外宾详细介绍了西藏的历史和现状，介绍了武装叛乱的经过，介绍了中央政府的立场。在介绍得差不多时，毛泽东说：已经讲很多了，我再讲你们的肚子就要饿了。

但他还是不失时机地对中央政府的态度及中印关系做了总结。他的话别具一格，他说：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

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

在毛泽东看来,一切敌人、对手和困难,都属于“鬼”。对“鬼”,怕是没有用的,你越怕它,它越凶恶、厉害。只有不怕它,敢于和它斗,才能战胜它,克服它。“不怕鬼”如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样,都是毛泽东留给我们战胜任何敌人、克服任何困难的思想武器。



“对鬼，除了战略上藐视， 还要在战术上重视”

《聊斋志异》是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作者蒲松龄出身于清朝没落的地主阶级，一生科举不得志，生活屡遭挫折，对下层社会的生活有一定的了解和体会。这本书的内容，就是他到群众中去，搜集流传的鬼狐等故事加以整理和再加工而成的。在人格化了的鬼狐故事中寄托着他的理想和感情。

毛泽东很喜欢这本书，称赞这部书“写得好”，“可以读”，因为它含有深刻的思想和社会内容。他说：“《聊斋》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不能看成只是讲鬼狐的“怪异小说”。

对书中不怕鬼的故事，毛泽东特别感兴趣。他在 1961 年 1 月 4 日打电话到文学研究所，通知何其芳到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住处，和他谈给《不怕鬼的故事》，这部书稿做序的事。在交谈中毛泽东就举《聊斋志异》上一篇《妖术》的故事说：《妖术》是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对鬼，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在战术上重视。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打不败它。如果于公战术上不重视鬼，就可能被妖术谋害而死。还有《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

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

1959年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对自己提出的不怕鬼的话题似乎特别感兴趣。1959年5月6日，他在会见11个兄弟国家的访华代表团时说到：中国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们的小说里也会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接着还向客人们讲述了《聊斋志异》里耿去病夜读，涂面伸舌与鬼对视的故事。

1959年5月10日晚，他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及一些民主党派领导人，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民主德国人民议院访华代表团。谈到中国西藏发生的武装叛乱以及中印关系出现的问题，毛泽东说得很轻松，他认为发生这些事，都是很自然的，有好处，可以让全世界看看、想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说：“所以我们应该欢迎并迎接这种挑战，不要花多少力量就可以还击，不要用十个指头，用几个指头就行了。我对朋友们说，不要怕鬼，鬼是这样的，越怕它，它就越多；不怕它，它就没有了。你们德国文学中有无这种材料，说明有人怕鬼，有人不怕鬼？”他还说：“马列主义教我们别怕鬼。资本主义这个鬼确有其事，不过不要怕。希特勒是大鬼，蒋介石这个鬼也不小，在他以前还有袁世凯、满清皇帝等鬼。”

为了在全民族中提倡不怕鬼、主动打鬼的精神，毛泽东还特意指示文学研究所何其芳等同志，从《聊斋志异》等古书上选编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毛泽东亲自修改了该书的序言，给古典神鬼小说赋与了新的政治含义。

外交 魅力篇

毛泽东幽默趣谈

“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做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

当时抗日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然而美国政府执行的扶蒋反共政策，又成为中国人民走向解放道路上的严重障碍。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和军事强国，企图“建立美国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而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中国是亚洲的重心，夺取了中国，就可以控制亚洲，进而可以集中力量控制欧洲，以称霸于全世界。为此，他们企图推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使中共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到国民党支配的政府中去“做官”，以实现中国在国民党领导下的“统一”。他们采取的措施是，对中共领导以“做官”进行利诱和以美国的军事力量进行恐吓。

对此，毛泽东在讲演中是这样回答的：“曾经有个美国人向我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我说：‘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他说：‘不做不好。’我问：‘为什么不好？’他说：‘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我说：

‘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

后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蒋反动派的面包加大炮。帝国主义的扶蒋反共政策落得可耻下场。

“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1949年初，人民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夺取全国政权已为期不远。就在这时，有些人提出了“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对他们（指帝国主义——编者）不要太刺激了”等论调。

针对这种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的糊涂思想，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现时，这也是幼稚的想法。现时英美的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者，他们会给人民国家以援助吗？我们同这些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设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之下借钱给我们，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他还举例说：“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在孙中山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又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写到：“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

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毛泽东笔锋一转,说道:“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这个东西应该既好看又好吃”

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打破帝国主义封锁的严重斗争,这时,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大国的友谊与合作,就显得格外重要。为此,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对苏联进行访问。

毛泽东在苏联访问期间,苏联当局有过一段时间不够主动,除最初半个月左右,参加斯大林的祝寿会算作是一次高层次的活动外,基本上都是领导者个别会晤,主要谈的是越南、日本、印度等一些亚洲国家共产党的情况,斯大林根本未谈中苏条约问题,毛泽东感到失望。以后斯大林既不提再次会晤时间,也不谈是否签约问题,把毛泽东冷落起来,每天让他在豪华的别墅里观看历史人物传记影片,消磨时光。后来毛泽东在苏联接待人员面前发了脾气,说:我来苏联并非专来祝寿,还有两国双边关系等重要问题要商量。毛泽东的坚定态度和激动的语言引起了斯大林的重视,出于种种原因,斯大林很快就同毛泽东举行谈判,消除了一些误会,增进了相互的了解。

斯大林说:“你来一趟不容易,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什么想法和愿望?”

毛泽东说：“这次来一是为斯大林同志祝寿；二是到苏联多走走、看看；还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既好看又好吃。”

这纯粹是中国式的幽默，其意思是很清楚的，可是苏联人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他们婉转地询问，毛泽东却认为这个具体的题目应由苏联提出，所以他始终没有先说，并提出准备让周恩来总理来苏联。

斯大林对毛泽东不明朗表态露出惊奇和不解。他认为他和毛泽东就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还让周恩来来干什么？

原来，毛泽东的意图是，苏联过去同国民党政府订立了一个同盟条约，现在新中国成立了，苏联应该废止那个条约，同我们签订一个新的更进一步的同盟条约，即毛泽东所说的“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但是，毛泽东又认为，此事不能强求，应该由苏方主动提出。

后来，斯大林终于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同时苏方也早有此意，所以十分赞同订立这么一个条约。

为什么要让周恩来来呢？因为毛泽东认为，此事应该是两国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事，不应该由两国党的领袖来签定。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想法是不同的。

后来，周总理与李富春等抵达莫斯科，他们共同与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扬等苏共领导人商谈，并由周总理起草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在莫斯科签字。毛泽东访苏获得了巨大成功，他巧妙地达到了预期目的。

“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准备派出新中国第一批驻外大使。他们是黄镇等几个刚从战场上下来不久的将军。

按照周恩来的布置，新中国第一代驻外大使们来到勤政殿，在八扇红木屏风后面，静观毛泽东接受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鲁登科呈递国书的仪式。

在这之前，也是在勤政殿，毛泽东与这些未来的大使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几个将军皱起眉头向毛泽东诉苦：“我们连外国话都不会说，怎么搞外交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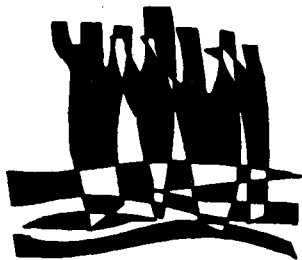
毛泽东笑着说：“班超、张骞不也不懂外文么，出使西域而不辱使命。你们不会外文，可以学学沈括的办法，他每到一地，都把那里的大山河流、险要关口，画成地图，还把当地的风俗人情也调查得清清楚楚，并叫随员背得滚瓜烂熟。所以和辽国边界谈判，他对答如流，有凭有据，辽国没有空子好钻哪。”

当毛泽东看到黄镇，好像想起什么事，问道：“黄镇，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

黄镇答道：“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

毛泽东听了微笑着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可毁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你也做个蔺相如吧。”

毛泽东幽默而意味深长的话语，使这些未来的大使们很激动，很受教育。后来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中，不但学会了做一名好大使，而且很有成就。



“我们这两块石头，一块扔给了 杜鲁门，一块扔给了麦克阿瑟”

1950年10月4日下午，一架伊尔——14苏制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彭德怀夹着装有关西北经济建设方面资料的公文包走下飞机。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陪同他趋车直奔中南海。

当彭德怀走进颐年堂会议室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进行。毛泽东看到彭德怀走进来，笑着招呼他坐下，让他听听大家的发言。彭德怀听了好一会儿发言后才逐渐弄清这次奉命来京的真正“涵义”，“抗美援朝”。他原先准备的那一堆关于西北经济建设方面的材料，显然是用不上了。他认真地倾听着与会同志的发言。从大家的发言中，他感到会上对于援朝问题仍形成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坚决主张出兵，这种意见以毛泽东为主；另一种主张实施边境防御，这种意见以高岗为主。

毛泽东仔细听着大家的发言，最后缓缓地说：“大家说得都有道理，但不管怎么说，别人要亡国了，我们站在旁边看，心里难过哟！”然后宣布散会，明天接着讨论。

众人离去后，毛泽东请彭德怀慢走一步。他俩最后走出

颐年堂会议室，来到菊香书屋。毛泽东打开文件夹，抽出金日成不久前发来的急电，递给彭德怀。彭德怀接过电报仔细阅读起来。这是一封关于朝鲜战局的告急电报，电报明确向中国政府、毛泽东提出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助作战。

彭德怀看完后顿感朝鲜形势已很危急，怎么能听任帝国主义对友好邻邦肆意侵略而置之不顾呢？他随口问道：“主席，你下决心了？”

毛泽东在室内来回踱步，没有马上回答。片刻后，说道：“我这个决心可不容易下哟！……”他详细地分析了战局形势，从他铿锵有力的言辞里表明他已下了出兵的决心。彭德怀根据对毛泽东多年的了解，知道这一点。俩人又谈了一些军队部署等问题后，毛泽东把彭德怀送出菊香书屋，并让他好好考虑一下出兵朝鲜的问题。彭德怀凝重地点了点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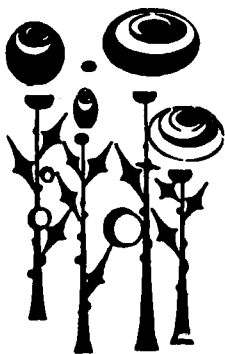
第二天，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颐年堂继续进行。在其他政治局委员发言后，彭德怀发了言：“……美国占领朝鲜，威胁我东北，又控制了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略，随时都能找到借口。因此，出兵援朝是必要的！美国同我在朝鲜作战，它利用速决，我利用长期；它利用正规战，我利用对付日本那一套。……即使打烂了坛坛罐罐，无非等于解放战争晚几年，没有什么了不起。”

听了彭德怀的发言，毛泽东十分高兴地点了点头。

会上，党中央、毛泽东正式决定出兵援朝，同时研究了指挥权问题。毛泽东想到了令敌人丧胆落魄的“彭大将军”，亲自点将让彭德怀出征挂帅，并紧握彭德怀的双手说：“老彭，你去吧！有你去了，就很放心！”还风趣地对彭德怀说：“你的字叫‘石穿’，我的乳名叫‘石三伢子’，我们这两块石头，一块扔

给了杜鲁门，一块扔给了麦克阿瑟。”在场的人都哄堂大笑起来。

1950年10月19日，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经过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的协同作战，1953年7月27日美国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彭德怀这块硬石头把麦克阿瑟打回了老家。



“他们很看得起有色金属， 却看不起有色人种”

毛泽东会见外宾时，常常以热情而富有幽默感的欢迎词或插话，来使外宾从紧张而激动的心情中平静下来。

有一次，毛泽东接见日本客人。当日本客人激动地谈到美国占领者如何歧视日本人时，他就插话说：“他们很看得起有色金属，却看不起有色人种。”客人们听了这句话，都轻松地欢笑起来。

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同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谈话中，也谈到有色人种和有色金属。他说：“西方国家几百年以来，由于长期的侵略，它们对亚非两洲产生一种心理，轻视落后国家。它们说我们是有色人种。这是拿肤色来区分，就好像说有色金属那样。我们这些‘有色金属’是会膨胀起来的。当然，我们不会去侵略别人，但‘有色金属’是更有价值的，因为有色金属包括金、银、铜、锡等。”

“我算是公鸡，他赫鲁晓夫是草鸡！”

新中国成立后，原苏联“老大哥”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给予了大量援助，对此中国人民是永远忘不了的。事实上中国无论是在抗日战争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给了苏联很大的支持与帮助。但是苏联有些领导人却因为援助了别国，就借此控制、指挥、侵占别国的利益，它的大国沙文主义情绪始终存在着。对此，毛泽东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1958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北京访问时，要求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要求与中国共同搞什么长波电台，毛泽东严词拒绝。在一次会议上他气愤地说：“苏联曾要求与我们搞联合舰队，还不是搞殖民主义！……还要与我们共同搞什么长波电台，还不是搞我们的情报！”他还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我们支持苏联，但错误的东西不支持。”

1959年，赫鲁晓夫结束在戴维营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会谈，来到北京，要求中国释放8名在朝鲜战争期间及之后在东北俘获的美国空降特务，说这几个人一定要释放，因为在戴维营会谈中，他已经答应了美国总统。毛泽东回答说：“这很难做到，你知道，中国有自己的法律。”赫鲁晓夫碰了个钉子，又接着为印度的尼赫鲁当说客，要中国答应给尼赫鲁一片

领土,说:“那不过是一块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毛泽东回答他说:根本的问题是印度武装有预谋地入侵中国领土,我以及驻西藏的边防军的领导也都没有察觉,直至边民与巡逻兵多次报告之后,中国政府才不得不发出正式抗议,采取了自卫反击步骤。

后来毛泽东说:“他赫鲁晓夫在去美国戴维营之前,为了讨好美国,骂我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那好吧!我算是公鸡,他赫鲁晓夫是草鸡!”



“这样好么， 解决苏联的困难，中国 也可以更好地自己办自己的事”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基本方面，是毛泽东的一贯立场。它是中国革命丰富经验的总结，体现了我们民族的精神——自尊、自信、自强不息。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活动，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会前，对于起草会议宣言的内容，以及苏联的一些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和言论，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产生了意见分歧。

一次步入餐厅时，赫鲁晓夫靠近毛泽东，故意做出为难的样子，鼻音喃喃地说：“毛泽东同志，你是知道的，我们现在建设中遇到不小的困难，技术人才不足，很紧张。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初具规模，已经有了足够的、独立的力量。所以我们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撤回我们的专家。”

“他说什么？”毛泽东似乎从翻译李卓然的表情上看出了名堂，目光犀利地问。

“他说，要撤专家。”李卓然说着，马上又重复了一遍赫鲁

晓夫讲话的全部意思。

毛泽东没有发怒发急，也没有激动不安，甚至没有任何情绪波动，像聊家常一样平淡地微笑着说：“我同意。这样好么，解决苏联的困难，中国也可以更好地自己办自己的事。”

赫鲁晓夫听到第一句翻译时，显然微微一怔。听过全部翻译之后，不着边际地笑了笑，似乎一下子忘记了该干什么，掏出一块手绢，不曾使用便又放了回去。接着，猛醒过来一般，换上了热烈的吵吵嚷嚷的劲头，回身叫喊着：“克里门特，尼古拉，还有你，亲爱的米高扬，你们都听到了吧？毛泽东主席同意我们撤专家了。你们给做证。”

“我做证，尼基塔（指赫鲁晓夫）一闻到酒就想开玩笑。”伏罗希洛夫恭敬地请毛泽东先入座。

“穆热克的玩笑。”布尔加宁保持着官场上的庄严，冷冷抛出一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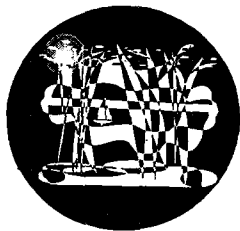
“还是让我们为苏中友谊干杯吧。”米高扬热烈地招呼着。

最尴尬的是赫鲁晓夫。他当然明白与毛泽东闹翻将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一抓起酒杯，马上就朝毛泽东举过去：“对，让我们为苏中友谊和国际共运的团结干杯。”

尽管后来中苏两党协调立场，互有妥协，共同提出《莫斯科宣言》草案，并获得会议通过，但中苏矛盾还是逐渐激化了。1960年6月，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赫鲁晓夫策划几国共产党在布加勒斯特会晤，对中国党横加指责。中国党不向压力屈服。7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片面决定立即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正发生在中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的时候，给中国的经济建设造成很大困

难。

但是,这却更加坚定了我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的决心和勇气。不久,我们造出了原子弹、氢弹,我们造出了万吨水压机,在世界上首先完成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我们还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的干部队伍和知识分子队伍,培养了中国人民的硬骨头精神。



“假如你们对罐头菠萝有兴趣， 可以给我们一笔贷款”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和苏联的关系非常亲密，被称为中苏关系的“蜜月”时期。但是就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也绝对不允许苏联共产党凌驾在中国共产党的头上，看不惯并抵制苏共以“老子党”自居、随意发号施令的行为。

50年代初，有一天，斯大林突然喜欢起菠萝罐头来了。他立即指示身边的秘书说：“给中国人发个电报，说我希望他们拿出一块地方来，让我们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两天后，斯大林收到了“中国人”的回电。毛泽东在电报中说：“我们接受你们的提议。假如你们对罐头菠萝有兴趣，可以给我们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

斯大林接电后，据说气得发火。表面上接受，实际上拒绝，毛泽东“软中有硬”这一手，触疼了苏共“指手划脚”强加于人的“尊严”，斯大林怎么会不发火呢？

“赫鲁晓夫这朵花 比我毛泽东好看”

毛泽东的外交活动有他独特的风格和魅力，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用他的拿手好戏“古为今用”。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又参加了16日至19日举行的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参加的莫斯科会议。针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表现出的以老大哥自居、唯我独尊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毛泽东以巧妙的方法加以教育帮助。他在会上即席讲话说：“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他还向赫鲁晓夫做个手势，望着会场接着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荷花虽好，还得绿叶扶持。我看赫鲁晓夫这朵花需要绿叶扶持的。”

毛泽东的讲话引起一片热烈掌声，连赫鲁晓夫也显出喜悦的感谢之情。

接着，毛泽东的目光掠过会场，落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卡德尔身上，当时南共和苏共之间存在着较大分歧。毛泽东微笑着说道：“一个和尚两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他朝卡德尔努努下颔“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起来嘛，有什么事，

还是朋友靠得住。我相信你们迟早是会回来的。”卡德尔听后,显出很受感动的表情。

11月2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克里姆林宫为各国党的代表团举行隆重的送别宴会。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主宾席正中并坐。毛泽东站起身来祝酒说:“谢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邀请。谢谢今天招待我们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开了两个很好的会,大家要团结起来,这是历史的需要,是各国人民的需要。”他略停了停,说道:“中国有首古诗:两个泥菩萨,一起都打碎。用水调和,再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宴会厅中顿时响起极其热烈的掌声,大家为毛泽东如此精彩的祝酒词,如此热情的讲话而激动不已。

“杜勒斯，这不是一个好教员吗？”

对反动派的头子怎么看？一般人只看到他可恨的一面，而毛泽东却教导人们，还要看到他的另一个方面：是最好的反面教员。

1958年10月2日，毛泽东同一些外国代表团谈话时这样说：“台湾”有一个蒋介石比较好，是不是？你们觉得有一个好还是没有好？没有蒋介石，中国人民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团结起来，也不能武装起来。单是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把中国人民教育过来的。所以，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员以外，请了另外一个教员，这就是蒋介石。噢！这个人在中国可做了很有益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还在尽他的历史责任。他的历史任务现在还没有完结，他还在当教员，他很有益处呀！不拿薪水，美国人发薪水给他，我们一个钱都不花，可是他给我们当教员。”

接着，毛泽东谈到美国的杜勒斯，他说：“希特勒曾经尽过这样的历史责任，还有墨索里尼，在东方还有日本帝国主义，把广大的欧洲人民和世界人民教育过来了。可惜现在没有希特勒了，墨索里尼也不见了，日本有些军国主义者也不存在了。但是教员还是有的，有杜勒斯，这不是一个好教员吗？世

界上没有杜勒斯事情不好办,有他事情就好办。所以,我们经常感觉杜勒斯跟我们是同志。我们要感谢他。这个人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里,他是比较最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坚决执行阶级斗争的路线,相当不妥协,我这里没有讲他毫不妥协,因为他还有缺点。他相当坚决,只是坚决得还不够就是了。虽然有缺点,还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教员,只是除了共产主义者以外。”



“我们是同年同月 同日同时生的兄弟”

在对外关系中，毛泽东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坚持各党各国的独立自主和平等权利。他也注意我们党和国家，在对外关系中尊重别国的实际情况，不把中国的经验和意见强加于人，在国与国的关系上，坚持“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的原则。

1954年12月，缅甸总理吴努来华访问。毛泽东亲切接见了，并就他感兴趣的许多问题，谈了中国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使吴努深受启发。吴努说：我把主席和刘委员长对我提出的建议，看作是大哥哥们对一个小弟提出的建议。大哥哥是比小弟更有经验的。当我相信对我提建议的人是诚实、真诚而且是为他们的人民献身的，我就像小弟对大哥哥一样的谦恭，听取他们的建议。

毛泽东却风趣地回答：“我们不是大哥哥同小弟的关系，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兄弟。”他还说：“刘少奇委员长和我都同吴努总理讲了一些中国经验，这是朋友之间交换意见。至于缅甸政府是否照办，那完全要由缅甸政府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

“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 还会办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国采取敌视态度，只与台湾蒋介石集团来往，使中美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

1971年3月21日，由毛泽东决定，派出我国乒乓球代表团到日本名古屋，参加世界第三十一届乒乓球锦标赛。这次派出的球队是六年来第一次在世界上露面，中国队重返世界乒坛，立即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毛泽东在这些日子里特别兴奋，要工作人员每天把《参考消息》上各国对我乒乓球队的报道告诉他。

有一天，护士长吴旭君发现《参考消息》里有一条消息特别有意思，就念给毛泽东听。这条消息说，4月4日，美国乒乓球队3号选手格伦·科恩去场馆练球，出来之后找不到车，结果上了中国队的汽车。科恩吃惊地看着一车中国人有些尴尬地说：“我知道我的帽子、头发、衣服让人看了好笑。”科恩是个嬉皮士，留着长发。当时中国乒乓球队队员庄则栋站起来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为表达感情，我送给你一件礼物。”于是送给科恩一尺多长的

杭州织锦。科恩非常高兴，想回赠什么，可发现什么也没带。

就这么一条花絮，毛泽东听后眼睛一亮，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

后来毛泽东做出重大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推动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10个月，应我国政府邀请，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来到了北京。

毛泽东在与尼克松的会谈中风趣地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可是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的来往从打乒乓球算起只有10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有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毛泽东巧妙地利用乒乓球外交，以小球转动大球，打通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渠道。

**“我们不会偷你的文件，
你可以故意随便放在什么
地方，考验我们一下”**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著书回忆 1973 年会晤毛泽东时的情景说：正如他一年前与尼克松会晤时那样，毛接着谈笑风生地与我进行苏格拉底式的对话，用自然而漫不经心的方式谈论重大问题。毛拐弯抹角地用一句话把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了。他说：杜鲁门和约翰逊这两位前总统在两个月前去世了；随着他们的去世，美国旧的对华政策和旧的对越南政策也被埋葬了。他接着以这样的方式来强调中国的治国之道：我们都不要说假话，也不要搞阴谋诡计。我们不会偷你的文件，你可以故意随便放在什么地方，考验我们一下。这淡然而富含机巧的几句话，给基辛格的启迪是：大的目标需要有高瞻远瞩的政策；耍手腕、占人小便宜是近视的政策，是不行的。

“但是我已没有足够的水， 你要用你的水来穿石”

1975年，毛泽东已是82岁高龄，他的腿已经不听使唤，讲话也颇为困难。可是他的思维仍然是那么活跃，他的谈话仍然是那么风趣、幽默。

10月，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来华访问，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会谈。

1975年的国际局势是很严峻的。当时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都想争霸世界，它们拼命研制新式战略武器，花巨额资金用于提高军事力量，战争的危險笼罩全球。首当其冲的是欧洲。

82岁高龄的毛泽东十分关注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当然就成了毛泽东与施密特交谈的主要话题。

毛泽东说：“欧洲太散、太弱。”

施密特说：“今天要把西欧12国统一到一个共同的屋顶下面，是一项艰苦的任务。但如果欧洲的统一来得比我今天所相信的更早，那么，欧洲将是很强大的。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会不会把它的压力转向中亚甚或远东？”

毛泽东回答得很干脆：“这是可以设想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为对付他们的到来，把自己武装起来。”

嗣后，毛泽东又风趣地说：“美国把它的保护义务战线拉得太长。除了日本之外，它还对南朝鲜、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间接地还对泰国承允了援助诺言，另外还有近东和欧洲，这不可能起作用。美国人想用 10 个指头按住 10 个跳蚤，但这是谁也办不到的！你们欧洲人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仰人鼻息是下策！”

施密特对他与毛泽东的交谈表示感谢，并且说：“在我之前已有很多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拜见过你，以后还将有许多人前来，询问你对世界形势的估计。这使你承担了责任。你的话有重大的意义。”

对这样的赞扬，毛泽东冷静地回答说：“哪里！你知道，不论是法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不听我的。”这时施密特引用了滴水穿石这句成语。毛泽东笑笑说：“是的，但是我已没有足够的水，你要用你的水来穿石。”这句话完全是双关的。在座的德国人和中国人都大笑起来。

爱情 家庭篇

毛泽东幽默趣谈

“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 一个是钢，钢铁相碰响叮当”

毛泽东和贺子珍的感情是在战火中孕育凝结的，他们是戎马伴侣，是事业上的朋友、同志。他们之间有过恩恩怨怨，有过甜蜜和误解。但他们的婚姻最终因性格不和而走向终结。

1928年夏天，红四军第三次打下永新县城后，毛泽东在“大力经营永新”的思想指导下，在永新做社会调查，住在西乡塘边村一家地主的四合院里。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和贺子珍结下了不解之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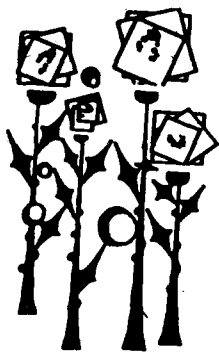
贺子珍1909年出生在井冈山东麓的永新县。大革命时期，贺子珍兄妹三人在永新县干得轰轰烈烈，一时传为美谈，人称“永新三贺”。永新暴动中，贺子珍两枪撂倒两个敌兵，被传为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双枪女将”。贺子珍的成长经历表明，她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一位充满激情的革命战士。她是在革命斗争的洗礼中成长起来的，因此，她的爱情和革命事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她与毛泽东是在相爱的基础上结合的，在共同度过的岁月中，他们相互爱恋，相互支持，走过了一段艰难的人生旅程。

但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婚姻生活并不是绝对协调的。毛泽东属于那种深沉、倔强、刚毅，有时甚至刚愎自用的男人，因此，惟有那种温柔、贤淑、聪颖的女性才能与之互补。贺子珍缺少的恰恰是这些。她的性格与毛泽东有太多的相似：她是一位事业心极强的女人，争强好胜，性格刚毅，有着挥刀上阵的男子汉气质。于是，便不可避免地在与毛的共同生活中出现不少矛盾，甚至引起不必要的争吵。有一次，贺子珍把半碗馓了的辣椒倒了，毛泽东不禁火起，把正在洗脸用的盆子掀翻在地。毛泽东曾诙谐地说：“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都不让谁，钢铁相碰响叮当。”形象地点出他与贺子珍各自的性格及由此而引起的不愉快。

这一点在贺子珍和毛泽东婚后生活的一段时间中表现得极为突出。她和毛泽东结婚后，任务是照顾好毛泽东的生活，当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并为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管理机要文件。在枪林弹雨冲锋陷阵中过惯了的她，由于工作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成天呆在屋子里整理文件，感到别扭极了。她有自己的志向，而不愿把自己的事业局限于做秘书这一狭小的范围之内。为此，她曾与毛泽东闹过别扭。长征到达陕北后，她之所以坚持要求到苏联学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学习提高，能独立地担负起更多的工作，以摆脱这种生活的困境。

贺子珍 1937 年底离开延安来到西安，欲到上海求医，因战争形势发生变化，上海沦陷，她便住在西安。临行前她以与毛泽东关系不和，决然地向毛泽东提出离婚，只身准备赴苏。毛泽东发电至西安，诚意劝告贺子珍，请她回延安，不要离婚，表示了相互谅解的希望。贺子珍读了电文后，心中十分矛盾。

她负气出走后，毛泽东在日理万机、忙碌异常的情况下，还惦记着她，而这次矛盾冲突，又完全是她的错。但倔强、好胜、执拗的性格主宰了她的思想，使她决定不回延安，远离毛泽东，去了苏联。毛泽东和贺子珍的感情在经历了十年的风风雨雨，在他们并肩走过了我党最艰苦的时期之后，以贺子珍的出走宣告了终结。



“看来漂亮靠不住，还得靠理想哟”

如何选择恋爱对象，这是关系到每个青年人终身幸福的大问题。毛泽东教育毛岸英找对象的事，对提高青年人认识这个问题很有帮助。

那还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从苏联留学回到延安，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有位从北平来的女学生，姓傅，长得很漂亮，被江青看中了，想把傅小姐介绍给毛岸英。

一个星期天，江青把毛岸英和傅小姐都请到她那里，吃饭聊天，高高兴兴地玩了一天。

傅小姐走后，江青问岸英：“你看傅姑娘怎么样？”

毛岸英脸红了。延安不比大城市，像傅小姐这么漂亮的确实不容易见到。岸英是看中了，只是不好意思说，喃喃地问：“我爸有这个意思吗？”

“只要你同意，他那里准行。”随后江青兴冲冲地去向毛泽东说。

毛泽东却摇摇头：“见一面就定终身，也太轻率了吧。你叫岸英来。”

江青关照毛岸英：“你爸叫你去呢，现在可就看你的态度了。”

毛岸英来见父亲，红着脸表态：“我觉得人还挺不错……”

毛泽东笑了，不失幽默地说：“不漂亮不聪明你也不会动心，这一条我理解。可是，见了漂亮的就都动心，这一条我我不敢理解你了。”

毛岸英低头不语。

毛泽东又开导他说：“除了漂亮，你还了解她什么？理想、品德、性格，你了解吗？她刚从北平来，我们都不了解。婚姻对你来讲，是终身大事，一定要慎重，不能轻率从事。”

后来果然应了毛泽东说的，那位傅小姐根本看不上前程未卜的毛泽东一家，也受不了延安的艰苦生活。她跑回北平，还在报纸上写文章辱骂延安。

毛泽东说：“看来漂亮靠不住，还得靠理想哟。”

“爸爸特别喜欢李德胜这个名字”

毛泽东姓毛，他的两个女儿却姓李，一个叫李敏，一个叫李纳。这是为什么呢？说起来，这里面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呢。

1936年冬，毛泽东率领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保安县。当时，毛泽东和贺子珍就住在保安县小石山的一个破旧的窑洞里。贺子珍以负伤的身体生下了一个女孩。曾和贺子珍一起长征过来的女红军战友邓颖超、康克清、刘英、钟月林等闻讯都来庆贺。

邓颖超走上前，轻轻把孩子抱了起来。她看到孩子又瘦又小，顿时产生一种特殊的怜爱之情，便风趣地说：“真是个小姣姣呀！”

毛泽东听邓颖超这么一说，想起了《西京杂记》中的“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脸际常如芙蓉”一句，因此取其意，为孩子起名叫毛姣姣。后来，大家都习惯叫“娇娇”。

1937年10月，贺子珍离开延安，离开毛泽东，去苏联治病和学习。1940年，经毛泽东同意，4岁的娇娇也来到莫斯科，去认自己的妈妈。当时，贺子珍看着面前这个带一身土气的小姑娘，问：

“你是谁呀？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娇娇。”

“娇娇干什么来了?”

“找妈妈来了。”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我妈妈叫贺子珍。”

“你给妈妈带什么礼物来了?”

“嗯……我把娇娇带来了。”

女儿的到来,给陷入孤独和忧郁中的贺子珍以极大的安慰。

但是,由于贺子珍身体不好,又赶上苏德战争爆发,娇娇一直在伊万诺夫市的苏联国际儿童院里生活,与孤儿没什么两样。在国际儿童院的礼堂里,挂着各国共产党领袖的巨幅照片,其中也有毛泽东的。但是娇娇却不知道,这个中国的伟人竟是自己爸爸。直到有一次,毛岸青特意从莫斯科到国际儿童院看望妹妹。兄妹俩坐在无人的礼堂聊天。毛岸青突然指着高高挂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照片问娇娇:

“你知道他是谁吗?”

“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

“他是我们的爸爸。”

……

娇娇得知以后,去问妈妈,从妈妈的简略叙述中明白了一切。

1949年,娇娇已13岁,当时她与贺子珍一起回国住在东北。贺子珍的胞妹贺怡带着毛泽东的重托来看望她们母女俩,她在了解了贺子珍的全部情况后,根据毛泽东的嘱托,决定先行带娇娇去北平。听到要去北平见爸爸,娇娇高兴极了,



她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这时便用俄文给爸爸写了一封短信。

毛主席：

大家都说您是我的亲生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有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这样，我才好回到您的身边。

娇娇

毛泽东接信后，激动之余挥笔写了回信。

娇娇：

看到了你的来信很高兴。

你是我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去苏联十多年一直未见过面，你一定长大了长高了吧？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希望快快回到爸爸身边来。爸爸已请贺怡同志专程去东北接你了，爸爸欢迎你来。

毛泽东

就这样，娇娇又回到毛泽东身边。她要上中学了。上中学注册得有个学名。一天晚饭后，毛泽东叫来娇娇说：“爸爸再给你起个名字。”

“爸爸，我有名字，我的名字叫毛姣姣。”

毛泽东微笑着说：“姣姣是你在陕北保安刚生下来时取的小名。现在长大了，进中学了，我要给你取一个正式学名，而且这个名字要有深刻意义。”

毛泽东打开《论语》中的《里仁》篇，指着其中的一句话：“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对娇娇解释说：讷，就是语言迟钝的意思。敏，则解释很多。如敏捷、聪慧、勤勉。”

娇娇听得入了神，深感爸爸学识渊博，心里暗暗想，在爸

爸身边，一定要好好向爸爸学习，做爸爸的好女儿。

“你的名字就叫敏，但不一定叫毛敏，可以叫李敏。”毛泽东说。

“为什么？大哥叫毛岸英，二哥叫毛岸青，他们都跟爸爸姓毛，我为什么不姓毛？”娇娇睁大眼睛，十分不解地问。

毛泽东爱抚地摸着娇娇的头说：“娇娇，爸爸姓毛，这是不错的，但是为了革命工作需要，爸爸曾经用过毛润之、子任、李德胜等多个名字，爸爸特别喜欢李德胜这个名字。”

娇娇问：“爸爸，李德胜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毛泽东点着一支烟，告诉娇娇：那是在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军队向延安发动重点进攻。党中央考虑到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运动中寻机歼敌，主动放弃延安。“我当时对大家说，暂时放弃延安，是意味着将来解放延安、南京、北平、上海，进而解放全中国。离延安有延安，守延安失延安。那时，我化名李德胜指挥作战。李德胜就是离得胜的谐音。后来，这个预言实现了。”

听了这番话，娇娇明白了爸爸喜欢给她起名叫李敏，而不叫毛敏的原因。她决心继承父辈的事业，刻苦磨炼自己，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贡献的人。

“白天让岸英穿,晚上盖在 被子上,你们俩都有份儿”

1949年10月15日,即开国大典之后半个月,毛岸英和刘思齐在中南海举行了简单而朴素的婚礼。婚礼结束后,毛泽东拿出随身带来的一件黑色呢大衣,笑着对他们说:

“你们结婚了,我很高兴。我没有什么贵重礼品给你们,就这么一件大衣。白天让岸英穿,晚上盖在被子上,你们俩都有份儿。”

在场的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殊不知,好事多磨。岸英和思齐的婚姻,也有一段曲折的历程。

还在延安时期,岸英认识了革命烈士刘谦初的女儿刘思齐。毛泽东了解她的出身经历、思想品德,非常喜欢这个女孩,所以他支持岸英的选择。

1948年,岸英和思齐确定了关系后,准备结婚。岸英明白结婚还得通过父亲这一关。于是,同年8月的一天,岸英和思齐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提出了结婚的要求。

毛泽东详细地问了刘思齐的学习情况、年龄后,和蔼地说:“你是1931年出生的,还不到18周岁,着什么急呀?反正我同意你们结婚,等一等好不好?”听毛泽东这么一讲,思齐就

向岸英使了个眼色，岸英忙说：“好，听爸爸的。”

两人离开毛泽东住处，工夫不大，岸英又一个人回到毛泽东房间。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从来都是听爸爸的，可我今年快26岁了，我想结婚以后专心学习工作。这样，就不必在这方面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了。只有爸爸能关心我们。”

“你的意思，是不是让我同意你们现在就结婚呀？”

“是的。思齐只差几个月就18岁了，我们也准备好了。”

“我说过的话为什么不听，不是告诉你暂时不要结吗？”

“我自己的事还是让我自己做主吧。”

“你找谁结婚由你做主，结婚年龄不到你做得了主吗？制度和纪律要做你的主！”

“岁数不到结婚的人多着呢……”

“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毛泽东生气地说：“我们的纪律你不遵守谁遵守？我再说一遍，思齐不满18周岁就不许你们结婚！”

毛岸英听后气得转身就走。第二天，岸英躺在床上放声大哭，谁也劝不好，卫士只得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大怒，大步走到儿子住房门口，大声吼道：“毛岸英，你想干什么？”听到父亲发怒，岸英立刻老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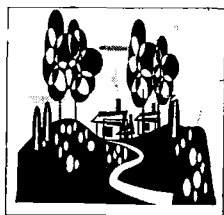
一天，毛泽东在村边散步，碰到岸英从邻村下乡回来。毛岸英想溜过去，被毛泽东叫住了。“你不要躲我，结婚的事想通了吗？”

“想通了。”岸英垂头丧气地说，“是我不对。我和思齐已商量好了，过年以后再结婚。”

毛泽东高兴了：“这才像我的儿子嘛！现在，你就是一个模范的守法者了。”

1949年9月，岸英和思齐准备结婚，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高兴地同意了。婚礼后，毛泽东把1945年去重庆谈判时穿的那件黑色呢大衣送给了他们。

在岸英的婚事上，毛泽东既是严父，又是慈母；既是普通父亲，又是伟大领袖。他不仅从个人的角度，而且从革命事业的角度加以考虑，足见毛泽东对岸英的器重和对他寄予的深切希望。



“白胖子成了黑胖子了！”

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失散多年终于有了下落。1936年，上海地下党找到了岸英和岸青，通过国民党一位高级将领的帮助，将岸英兄弟俩送到苏联学习。这时，毛泽东已率领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听说两个儿子已经到了莫斯科，兴奋不已。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毛泽东时常眺望着西北方，惦记着远在异国他乡的儿子，猜想着岸英他们在苏联的生活、学习情况。1938年，有人从苏联带回来了岸英兄弟俩的照片。毛泽东喜出望外，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禁不住热泪盈眶。不久，有人要去苏联，毛泽东写了回信带去，转达了对儿子的思念之情。事隔一个月，毛泽东又托人捎信，并随附自己的照片。信的一开头就询问：“早一月给你们的信收到没有？收到了，写点回信给我……”一种盼儿心切、急不可待之情跃然纸上。

从此，父子之间“鸿雁传书”频频往来。

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给岸英兄弟写了一封长信，对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在信中说：“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以倒

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毛泽东还教育儿子要谦虚。他说:“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

在父亲的亲切关怀和教诲之下,毛岸英在苏联发奋读书,刻苦学习,多次取得优异成绩,还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1946年,毛岸英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回到了延安,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父亲身边。

病中的毛泽东见到了离别整整19年的儿子,精神骤爽,病除大半。毛泽东看着眼前这个精力充沛的青年小伙子,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当年那个5岁的顽童。他仔细地打量着儿子,儿子的个头比他高,脚踩牛皮靴,身穿军呢大衣,那英俊秀气的面庞上,特别是开阔的眉宇间,依稀可见开慧的情影,也有父亲的遗传特征——天庭饱满。毛泽东满意地笑了。

毛泽东仔细地询问岸英在苏联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又问他在苏联读什么样的中国书。岸英说:“读过《红楼梦》、《水浒传》,还有鲁迅的作品。”毛泽东点点头说:“还好,应当知道中国的知识,更要懂得中国的革命知识。”接着,毛泽东脸上露出严肃的表情,说:“岸英,你在苏联长大,国内生活你不熟悉。你在苏联的大学读书,住的是洋学堂。我们中国还有个学堂,这就是农业大学、劳动大学。”听到这里,岸英早已领会了父亲的心意,便说:“是的,我离开中国这么久,在苏联大多过的是学校生活,中国农村我不知道,也不会种田,我愿意到农村去向农民学习。”

过了几天,毛泽东给岸英介绍了一位劳动模范,要劳模教

儿子种地、打粮食。岸英背着小米、菜籽和被子要去吴家枣园上“劳动大学”。行前，毛泽东语重深长地对儿子说：“你要和老乡们一同吃，一同住，不能搞特殊，要虚心向农民学习。”

锻炼了50多天以后，毛岸英从农村回到了父亲身边。毛泽东见岸英头上用白羊肚毛巾扎着个英雄结，穿着灰土布汗褂子，两条又黑又粗的胳膊闪着油光，脸上黑不溜秋，跟陕北青年农民一模一样，风趣地说：

“好呀，白胖子成了黑胖子了！”

毛泽东又摸了摸儿子的双手，一层厚厚的茧子，他满意地说：“这就是你在劳动大学的毕业证书！”

在毛泽东这个严父的教育下，毛岸英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布了抗美援朝的命令，毛岸英立即响应，要求参战。不久，毛岸英在美帝的一次空袭中不幸牺牲，把他年仅28岁的生命献给了异国土地。

“这菜虽苦,但有丰富的政治营养”

毛泽东爱吃辣椒和苦瓜,还常吃野菜。辣椒和苦瓜都有强刺激性。他曾开玩笑地说:敢吃辣才敢于革命。野菜不但苦,而且是穷苦百姓们常吃的,毛泽东爱吃它,也是不要忘记老百姓,要和普通百姓想到一起去的意思。

1927年11月,毛泽东带领部队战斗在井冈山,当时生活条件很差。一天,他到步云山,同农民自卫军的同志一起吃饭。见几个战士正望着碗里的野菜,不住地说:“这么苦的野菜,怎么能吃得下呀?”毛泽东走进伙房,炊事员说:“打了好久的霜,别的野菜都被冻死了,只剩下这一种,是比较苦的。”毛泽东听后,便又返回到战士中,伸手舀了一勺野菜放在碗里,边吃边说:“这菜虽苦,但有丰富的政治营养。我们吃得下这个苦,就能够克服更多的困难。今天我还要多吃一些哩。”战士们看毛委员吃得这么香,都表示说:“毛委员吃得,我们也吃得。”

1950年初春,毛泽东到京郊视察,挖回许多野菜。中午吃饭时,毛泽东问陪他一起吃饭的李敏、李讷和叶子龙的两个姑娘燕燕和二娃:“孩子们,你们能不能吃苦?”

“爸爸,在延安、西柏坡苦不苦,我都过来了,我不怕苦!”

李讷抢先回答，她是在延安、西柏坡吃黑豆、小米饭长大的。

“在莫斯科，我们有时连饭都吃不上……”，李敏接着说，李敏在莫斯科度过卫国战争时期，真吃了不少苦。

二娃也插话说：“毛伯伯，我不怕吃苦。”

燕燕听了大家的回答，似乎有点明白过来，对毛泽东说：“毛伯伯，你今天是不是在考我们啊？”这时李敏、李讷也品过味道来了说：“爸爸在考我们。”

毛泽东笑笑说：“说考也行，不说考也行。来吧，我们先吃这个菜。”这时他用筷子夹着苦菜就往嘴里送，边吃边说：“哎呀，多好的菜，好吃得很啊！”

孩子们见了，也赶紧夹了一筷子，没吃几口，这四个姑娘直巴嗒嘴。李讷大声说：“哇，好苦啊！”其他孩子也说：“真苦，真苦。”

毛泽东边笑边说：“我问你们怕不怕苦，你们说不怕苦，叫你们吃又说苦。”

“爸爸，你真坏，你嘲弄我们。”李讷撒娇地埋怨毛泽东。

毛泽东笑容可掬地解释道：“爸爸怎么能嘲弄自己的大娃娃呢。你们太小，解放前农民在三座大山压榨下，有的为了活命就是靠苦菜维持生命的。现在我们条件好了一些，常吃点苦菜、苦瓜有好处，它可以使我们不忘记过去，不忘记人民群众，还可以起调胃口的作用。”

孩子们听他讲故事，都忘记了吃菜。他忙说：“快吃，别忘了吃菜。”四位姑娘又吃了起来。

“爸爸，苦瓜好像比苦菜有味道，苦菜还有刺呢。”李敏好象发现什么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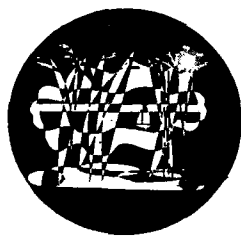
“对啊，苦菜比苦瓜贡献大。”接着他又讲起战争年代艰苦

奋斗的故事。

孩子们边吃苦菜、苦瓜，边接受了毛泽东的教诲，吃得很有滋味，菜都吃得见底了。

“来，我们也来个‘三光政策’。”毛泽东拿起一个盘子，将剩菜汤倒入碗内。几个孩子也学着做了。

以后，一有机会，毛泽东就弄些苦菜回来吃，这成了教育下一代的一个好方法。



“现在没有谁看到,我是不会打小报告的。藏起来,带给他”

姚淑贤,天津人。1953年,她还不满18岁,被调到专运处工作,年底被分派到毛泽东专列上服务。

1956年,她已是20多岁的大姑娘了,正在谈恋爱。那时,毛泽东的工作特别忙,开会特别多,或庐山、或杭州、或上海、或北戴河……一年中,毛泽东很多时间都是在列车上、在外地度过的。作为专列服务员,小姚也自然是要经常随行在外的。

一次,她和男友约好星期六晚上去中山公园见面,但突然接到准备出车的命令,毛泽东要去北戴河开会。

列车已经驶动,毛泽东忽然想到这天是星期六,就问工作人员:“你们有没有约会?”当他知道小姚已跟男友有约时,说:“哎呀,糟糕,搅了你们的好事。”

“你通知他了吗?”毛泽东有些着急地问。

“没有。”

“你这个小姚哪,”毛泽东用略带责备的口气说:“要是不见不散怎么办?……你就连个电话也没有给他打?”

“我们只要接受任务就不能对外人说了……没事的,他知

道我常有任务，会理解的。”小姚想安慰毛泽东。

“嗯……”毛泽东摇摇头，嘀咕着：“久了会出误会的，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们。”

晚上，小姚给毛泽东去送铅笔。毛泽东显然一直想为小姚失约找个补救的办法。他见小姚进来，目光一闪，忽然对小姚说：“你等等，有个东西你拿回去给你的朋友看看，他就不会生气了。”说着，他提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行诗：

静女其姝，
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
搔首踟蹰。

接过诗，小姚脸红了起来，小声说：“主席，我们有纪律，凡是带字的东西都必须上交。”

毛泽东看到小姚有些为难的样子，带着一点逗趣的口吻，幽默地宽解她说：“你为什么要那么老实？现在没有谁看到，我是不会打小报告的。”毛泽东挤挤眼，笑一笑，做了个手势，“藏起来，带给他”。

小姚不久结了婚，建立了美满、幸福的家庭。至今，30多年过去了，她和她的爱人一直珍藏着毛泽东这份慈父之情的手书。

“你是你们家里唯一的 共产党员，硬是党代表哩！”

毛泽东历来主张对一个人的正确评价，应全面看他的一生。

1963年1月的一天，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受毛泽东的委托，来教毛泽东学英语。教完英语后闲谈中毛泽东问章含之：“你对你那位老人家怎么看啊？”章不假思索地说：“他是代表旧的剥削阶级的爱国民主人士。我是共产党员，对他既是父亲，更是统战对象。”毛泽东认真地望着章问道：“你什么时候加入党的？”章答：“1957年1月。”毛泽东风趣地笑着说：“啊呀，我党的老党员喽！”章很窘，忙说：“新党员还不够条件呢！”

接着，毛泽东严肃地对章含之说：“你既然是个党员，就要懂得怎样对待行老（章士钊字行严）。你加入了共产党，我高兴，挖了你父亲的墙脚，不过这是指的思想。他的后代也跟共产党走了，其实行老也高兴，他知道你跟共产党走有出息。但是你要了解行老才能团结他。你们是你们家里唯一的共产党员，硬是党代表哩！你如果不正确对待行老，他会对共产党有意见，认为是我们把他的女儿拉走了。”

毛泽东又考问章含之：“你说行老是剥削阶级，你有什么

根据？”章列举了鲁迅文章中对父亲的指责，说父亲当过教育总长，镇压过学生运动，所以鲁迅骂他。后来同蒋介石关系也不错。1945年他是代表国民党来同共产党谈判的。毛泽东听着很不以为然地摇头制止了章的话，问道：“你只知道行老的错事，有些还不见得是错的，譬如他参加国共和谈。我先问你，你知道多少行老革命的事迹，知道多少他做过的好事？”

章含之一下张口结舌，回答不上了。毛泽东很不满意地说：“对一个人要看他全面的一生，更何况对自己的父亲。共产党并不要你盲目地六亲不认啊！你要正确认识行老。他的一生很简单。你知道《苏报》一案是怎么回事？”章含之摇摇头。

于是，毛泽东耐心地向章含之解释什么是《苏报》案。他说章士钊因《苏报》一案，报纸遭清廷查封，章士钊本人流亡日本。毛泽东问：“难道那时的行老不是革命派吗？”毛泽东说：“行老青年时代是个反对满清的激进革命派呢。我们谁都不是天生的马列主义者。他一生走过弯路，但大部分是好的。”

毛泽东教育章含之要正确评价一个人的一生，特别是正确评价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的一生，是有多么普遍的教育意义呀！

礼贤 爱友篇

毛泽东幽默趣谈

“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

那是1915年做学生的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发生的事。

那年秋天，长沙几所学校都贴出了一张古典文体、手书刻印的《征友启事》，大意是：

今日国家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政府当局无一人可以信赖。吾人拟寻求志同道合之人，组织团体。其宗旨主要为砥砺品行，研究学术及改造国家。凡对此有兴趣之同学，皆请惠赐大函，俾能约斯私下聚谈，以再作进一步之计划。

此举文体风趣，署名更幽默，为“二十八画生”。

各校师生读了这张启事后都非常好奇，议论纷纷，要知道在当时这么做的人是非常大胆的。最可笑的是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马校长，看到这则启事贴在本校，竟然认为这是为了吸引女学生谈恋爱，非常生气，决心追查是何人所为。

他见启事上写着“来信由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陈章甫转交”，就找到陈章甫和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了解此事，这才知道发出启事之人，是一师一位品学兼优、受到师生交口称赞的好学生——毛泽东。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还在中学时代的毛泽东，在学识卓绝的教师杨昌济等教诲下，开始接受大量进步思想。毛泽东不仅关心时事，关心中国的前途命运，广泛阅读古今中外大量的文章书刊，还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好友。但以改造中国，改造世界为己任的毛泽东，总感到自己的眼界还不够宽广开阔，活动的范围还太窄。他认为“友不博则见不广”，所以想出张贴“征友启事”的办法来广交有志之士。

“二十八画生”的署名又是怎么回事呢？毛泽东三字的繁体恰是二十八画。

后来，响应毛泽东“启事”的只有三人。毛泽东又通过通信、组织同学聚会等办法，结识了长沙各中等学校的许多学生和青年教师。毛泽东曾说，这是一批“思想上很认真的人，不屑于议论琐事。……我的朋友和我只愿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就是这样一群富有朝气、充满理想、“真心求学，实意做事”的年轻人，逐渐成为毛泽东组建有名的“新民学会”的组织核心。

据说那个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马校长，在得知毛泽东的情况和《征友启事》的意图后，感叹道：“后生可畏，国家有望，民族有望啊！”

“口干了还是自己倒茶呷得多些”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后，因为当时蒋介石的力量很强大，毛泽东决定带领工农革命军到罗霄山脉中段去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力量。

工农革命军要进入井冈山山区，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当时，袁文才率部驻扎在山下——宁冈茅坪，王佐则在山上——井冈山茨坪，两支部队遥相呼应，控制着井冈山山区。对此，有些人主张用武力消灭他们，毛泽东则认为不能采取旧军阀大鱼吃小鱼的办法，而必须搞好关系，争取他们。

为此，毛泽东到三湾后，当即给袁文才写了一封信，请当地地下党员送到袁文才手中。

袁文才得知率领工农起义军的头面人物毛泽东，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作者和中共中央委员时，马上召集下属商议对策。不少人当听说毛泽东要在井冈山创建根据地时，纷纷出来反对。但袁文才觉得毛泽东的来信情真意切，并无丝毫兼并之意，况且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进入井冈山创建根据地，还可以借势壮大自己的力量。最后决定派文书——大革命时期曾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听

过毛泽东讲课的陈慕平作代表，随同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前往三湾联系。

次日，毛泽东在三湾热情接待了陈、龙二人。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了陈慕平，陈慕平对毛泽东惊人的记忆力感到惊讶，钦佩之情油然而生。接着，龙超清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同时也谈到袁文才存有顾虑，怕被工农革命军兼并。毛泽东当即表示，要袁文才打消顾虑，同工农革命军合作，共同开展革命斗争，并约定10月6日在宁冈大仓村与袁文才会晤。

6日这天，毛泽东一行三人亲赴大仓村与袁文才见面。隔老远，毛泽东就打开了招呼。袁文才眼望平易近人的毛泽东，快步走上前，紧紧地握住了毛泽东伸过来的温暖又有力的手。

袁文才请毛泽东等上楼就坐，亲自给端茶。

“文才同志不要客气，口干了还是自己倒茶呷得多些。”

毛泽东一句诙谐而又乡土味十足的湖南话把大家逗笑了，气氛变得融洽起来。慢慢地谈话转入了正题，毛泽东向袁文才讲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湘赣边区秋收起义的情况以及工农革命军以井冈山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大意义，热情鼓励袁文才同工农革命军携手合作。当毛泽东了解到目前袁文才的队伍最缺的就是枪支时，还亲自赠枪100支。毛泽东的诚恳合作态度，打消了袁文才等人的疑虑。袁文才当时回赠工农革命军600块银元，表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

10月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入茅坪，袁文才像迎接自己的家人一样，接待了毛泽东的队伍。以后，毛泽东又

对袁文才的军队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使军队面貌发生了变化。后来,毛泽东把袁文才的军队和同时受到改造的王佐的军队都调集到大陇朱家祠,将这两支地方武装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乡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崭新道路。

为了纪念中国革命史上这个重要时刻,毛泽东诗兴勃发,挥笔写了《西江月》:

军叫工农红军,
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
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

“哟，原来你吃过苦， 那就打收条留下吧”

1938年7月，毛华初由湖南来到延安，要见他的大伯毛泽东，要求参加革命。

毛华初原名王华初，他的生母是一名共产党员，同毛泽民的结发妻子王淑兰是狱中难友。后来，王华初的母亲英勇牺牲了，王淑兰就将王华初收养过来，并改名毛华初。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淑兰决定把毛华初送到延安来。

毛华初被领进了毛泽东居住的窑洞。他见了毛泽东，遵照母亲的叮嘱，叫了一声大伯，并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毛泽东看他来了，很高兴，一边笑着，摸着他的头，端相了好一会，对他说：“你这么小也来了？这里要打仗，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随时可能来轰炸延安；要躲飞机，要跑路，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和窝窝头，你吃得消吗？还是回去吧。”毛华初一听，认为真的要让他回去，就着急起来，说：“我给地主放过牛，讨过米，跟妈妈坐过大牢，我什么苦都不怕，都能吃得消。”毛泽东听着他讲的这番理由，看着他那着急的样子，高兴而又风趣地接着他的话茬说：“哟，原来你吃过苦，那就打收条留下吧。”

听到毛泽东说把他留下了，毛华初这才放下心来，脸上露

出笑容。

毛华初留在延安，做过机要工作，后又进中央党校二部学习。无论做什么工作，他都牢记大伯嘱咐他的话，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吃苦在先，艰苦奋斗。他在延安学习工作了7个年头，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分派到东北解放区工作。



“李先生有‘医’（议）政的高见， 又有妙手回春的医术，贤哉！”

毛泽东很注意团结党外人士，注意倾听他们的意见。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这时也是我抗日根据地日子过得最艰难的时期。就在这时，陕甘宁边区米脂县参议会的议长李鼎铭先生提出了一条关于“精兵简政”的建议。

这项建议案一提出，立刻受到一些人的责难：

“提倡精兵简政，部队还要不要发展？”

“你抛出这个议案的动机是什么？”

“兵都精简掉了，谁去打日本鬼子？”

民主人士们都为李鼎铭担忧。

毛泽东看到李先生的提议案，仔仔细细地看了三遍，用红笔把重要的段落圈起来，旁边写下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毛泽东又亲自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毛泽东在社论中写道：“敌人以庞大的机构向我们压迫，难道我们还可以缩小吗？实行缩小就感到兵少不足以应敌。这些就是所谓为现状和习惯所束缚。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目前根据地的情况已经要求

我们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轻轻快地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却还是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作战。若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精兵简政”的政策在全国各解放区推广实施了。

李鼎铭不但有头脑，有智谋，还有医术。毛泽东的胳膊有严重的关节炎，发作起来就痛得抬不起来。李鼎铭给毛泽东开了药方，信心十足地说：“四副足矣，不必多买。”

可是毛泽东身边的医护人员却不同意买，纷纷劝说：“主席，中医不科学，不卫生，这药你不能吃啊。”

毛泽东却坚持把四副药买来吃了，结果疼痛果然消失了，胳膊恢复得活动自如。

毛泽东感激地握住李鼎铭先生的手说：“李先生有‘医’（议）政的高见，又有妙手回春的医术，贤哉！”

“你现在把两个包袱扔在这里，可以轻装上阵了”

“我把两个孩子都交给了党，请党来教育他们吧。”茅盾对毛泽东说。

“这很好嘛。你现在把两个包袱扔在这里，可以轻装上阵了。”毛泽东风趣地说。

1940年10月10日，茅盾接受党中央的安排到重庆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为了全力以赴地投入抗战工作，他决定把两个孩子留在延安。临行前，茅盾到杨家岭向毛泽东辞行。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1927年9月他创作的第一部小说《幻灭》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时，由于正受到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通缉，所以使用了一个笔名“茅盾”，后来他就以沈雁冰和茅盾两个名字闻名于世。

茅盾和毛泽东初识是在1923年夏天，那时茅盾是中共上海地方区委员会执行委员兼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8月5日，他去出席上海地方区执委会第六次会议。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中年人热情地用湖南话跟他打招呼：“你好！沈雁冰同志，我是毛泽东。”茅盾紧握对方的手，笑着说：“啊，毛泽东同

志！久仰，久仰。”毛泽东爽朗地说：“我是《小说月报》的老读者，对你的大名，我也是久仰啊！”

1926年1月19日，国共两党合作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闭幕了。茅盾正准备回上海，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派他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秘书，当时毛泽东是代理部长。能为毛泽东做助手，茅盾感到非常高兴。

不久，由于蒋介石策划制造了反共的“中山舰事件”，形势发生了变化。这时上海的党组织也让茅盾回上海。离开广州的那天上午，茅盾依依不舍地向毛泽东告别。这次广州之行，连在船上的来回时间，正好三个月，虽然时间不长，但和毛泽东在工作中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8年底，茅盾远赴新疆从事革命文化教育工作。1940年5月，茅盾离开了政治形势越来越险恶的新疆，几经周折，于同月26日下午抵达革命圣地延安。茅盾在延安安顿好后，就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看望毛泽东。自1926年广州分手后，他们已有14年未见面了，老友重逢，分外高兴。毛泽东依旧是茅盾印象中十多年前那样的平易近人，谈笑风生，丝毫没有因为当了党的领袖而有什么改变。茅盾向毛泽东详细地谈了他在新疆期间所看到的政治形势的恶化和自己虎口脱险的经历。毛泽东十分认真地听着茅盾的述说，脸上流露出深深的关切之情。

在延安，生活在同志们中间，茅盾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他怀着极大的热情参加延安的各项活动，参加了毛泽东发起的哲学座谈会，与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坐在一起讨论各种哲学问题。

9月下旬的一天，张闻天来到桥儿沟茅盾住的窑洞，递给

他一封周恩来从重庆打来的电报。电报中,周恩来希望茅盾能到重庆,领导国统区的文化运动。茅盾无条件地接受党中央的安排,于是在1940年10月10日离开延安,踏上了新的征途。到重庆不久,茅盾就写出了散文《白杨礼赞》和《风景谈》,热情歌颂了延安的生活,歌颂延安人民和革命战士,歌颂中国共产党。

地理条件上的间隔,中断了毛泽东与茅盾的直接交往,但他们的心是相通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茅盾任文化部部长,与毛泽东共同开始了建设新中国的历程。

“如履薄冰”

党的老一代革命家薄一波曾谈起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情景。那是1943年到延安的第二天。

一见面，毛泽东就紧紧握住薄一波的手，问：“你就是薄一波同志？”“是！”薄一波答道。“如履薄冰，如履薄冰。”毛泽东也许为了记住薄一波的姓名，反复念着包括有薄字在内的一句成语。然后又问薄一波是哪里人。当他知道薄是山西定襄人时，毛泽东说：“汉文帝的母亲也姓薄，她的弟弟叫薄昭。汉文帝曾被立为代王，建都在你们山西的中都。”后来薄一波回忆说，当时真为毛泽东的渊博知识所震惊，“我当时怔住了。这些史书上记载的帝王家常事，他竟记得这样清楚。他对中国的历史是多么熟悉啊！”

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就与薄一波交谈多时。薄一波回忆说：毛泽东同志的话语，言简意赅，引人入胜。一句普通的话，从他的口中说出来，往往赋予了新的涵义。比如他在讲到共产党员做统战工作时，用“制钱”作比方，说要像“制钱”那样“内方外圆”，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由原则性决定的、能够适应各种条件的灵活性。又比如在说到怎样消灭“山头”、处理好内部团结的问题时，他作了一个比喻：两个小孩打架，做父

母的总是得先把自己的孩子骂几句,甚至打几下,然后安慰对方的孩子,这样才能平息纠纷。老百姓都懂得怎样处理“山头”的问题。薄一波说,毛泽东的话使他很受启发。



“既然他那么喜欢打兵舰， 以后就让他干海军吧！”

1949年4月发生了一件轰动全世界的事件。

4月20日，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即将发起渡江战役。就在这时，一贯在中国的领土、领水上作威作福的英国兵舰“紫石英”号侵入长江。并且不顾解放军警告，强行溯江上驶，双方发生炮战。第三野战军第23军军长陶勇不畏强暴，指挥所部重创“紫石英”号及增援的其他三艘英舰。

事后，英国首相艾德礼、保守党领袖丘吉尔纷纷叫嚣要对中国实行“武力报复”。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也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威胁的言论。对此，4月30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名义发表严正声明，同时阐述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

“紫石英”号事发后，由人民解放军渡江兵团指挥部上报到野战军指挥部，由野战军指挥部上报到中央军委。三野司令员陈毅曾专门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也为自己部下担心着。谁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对陶勇的忠勇果敢大加褒奖，后来还说：“既然他那么喜欢打兵舰，以后就让他干海军吧！”

果然，陶勇从抗美援朝战场回国后，被毛泽东任命为海军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的殊荣。

“以后还要展开变成横队的哩！”

刘斐原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参谋次长。1948年秋，他辞去这一职务回到故乡。1949年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先生搞和谈，他和白崇禧出面动员刘斐充任国民党政府的和谈代表随代表团赴北京谈判。结果和谈破裂，而刘斐先生在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下，毅然脱离国民党，留在北京，投奔革命队伍，选择了新的人生道路。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毛泽东多次请刘斐吃饭，找他谈话，继续教育刘斐先生。1949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毛泽东又打电话约刘斐吃饭。当刘斐赶到毛泽东的住处时，见章士钊、符定一、仇鳌等民主人士也到了。饭前几个人海阔天空，感到他们几个人已年过半百，有的已近古稀，又没有读过马列书籍，是老朽无用之人了。毛泽东听后说：“哪里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呀？我也是逐步认识社会、走上革命道路的，最重要的是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他还讲述了他走上革命道路和掌握马列主义的曲折过程来启发和鼓励刘斐等努力学习，改造思想，为新社会服务。

1950年初春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又请刘斐来到他的住处。毛泽东与刘斐谈起新政协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

同纲领》。刘斐说：我的体会，《共同纲领》是四路纵队（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前进，向左看齐，跟工人阶级走。毛泽东听了风趣地说：“是的，但是以后还要展开变成横队的哩！”

就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告诉刘斐，决定要刘斐去中南军政委员会任水利部长。刘斐深感共产党的伟大，他又记起了毛泽东告诉他的话：“共产党不搞打倒一切，只打倒那些罪大恶极而又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其余的人只要他愿意爱国，维护统一，我们就同他讲团结，有一技之长者，统统包下来为新中国服务。”

“我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吧!”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定案)》,国共和谈最终破裂。当日晚,人民解放军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开始了向全国进军。作为国民政府和平谈判首席代表,张治中所企盼的和平希望破灭了,这使他内心里充满了痛苦;国民党报纸又大肆散布“张治中被中共囚禁”、“张治中卖身投降”等谣言,更使他感到愤慨,于是愤然写了《对目前时局的看法》,并毅然决定留居北京。

毛泽东、周恩来对张治中的这一举动大加赞许;对他的留京表示了最真诚的欢迎,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周恩来精心策划,通过上海地下党组织将张治中的夫人和子女接到了北京,这使张治中非常感动。

张治中留居北京,开始了他为新中国服务的新的历史。

当时,新中国政协正在紧张的筹备之中,中央人民政府也即将成立。毛泽东多次提请张治中参加新政协和人民政府工作。张治中不无感慨和落寞地推辞说:过去这一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个人也应成为过去了。

毛泽东恳切而又幽默地说：“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了声明，等于已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大年初一做起。”毛泽东的一番开导、安慰和鼓励的话，使张治中深受感动。

其实，张治中自留居北京后，一直关注着解放战争的发展。当时，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正向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发起进攻。为着最大限度地减少战争的破坏和牺牲，根据当时的有利形势，中央决定“兼取政治方式解放西北问题”。张治中曾任国民党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不仅对西北各省的情况熟悉，而且那里的军政要人中有些都是他从前的部属。所以，张治中很想能为和平解决西北问题做些工作。

9月的一天，毛泽东约张治中到中南海，对他说：解放军将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你去电给新疆军政负责人，叫他们起义为好。毛泽东又说：我从新疆得到的情况分析，只要你去电，他们是一定照办的。

张治中为有机会能为新中国的建立作些贡献而高兴，他回答说：“我早有此意。”但他同时提出说，从5月以后即和新疆陶峙岳、包尔汉就断绝音讯了，现在还不知如何和他们联系。毛泽东告诉张治中：我们已经在伊犁建立电台，你的电报可以先拍到伊犁再转迪化。

第二天，张治中即致电新疆陶峙岳、包尔汉，希望他们为革命大义，为新疆和平计，正式宣布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阵营。此电经由邓力群向迪化转交后，陶峙岳、包尔汉于9月25日、26日先后通电起义，至此，新疆全境和平解放。

还在新疆和平解放之前，毛泽东曾两次致电彭德怀，提出新疆解放后，组织新疆军政委员会，以张治中为主席；整个西

北亦可考虑组织军政委员会，“以彭为正，以张治中为副”。关于这一点，毛泽东也和张治中当面谈过。新疆刚刚解放时，百废待举，百事待理，张治中以他主政西北的经验，向党中央提出数千言治理新疆的书面意见，引起毛泽东的极大重视。毛泽东当即决定张治中到西北去“与彭德怀将军合作共事”。一天，毛泽东找来张治中，幽默地对他说：“我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吧！”

张治中说：“今天是你的领导，说不上什么国共合作。……你如认为我有到西北去一趟的必要的话，我愿意去做彭老总的顾问。”

11月22日，张治中由北京乘专机飞往兰州，在兰州偕同彭德怀飞迪化，对新疆进行视察，并筹备改组新疆省人民政府。12月17日，新疆省人民政府宣布成立，包尔汉任政府主席。12月28日，张治中陪同彭德怀飞回兰州，随即去西安，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

“你是我的‘半字之师’”

中国历史上有“一字之师”的故事。相传唐代诗僧齐己作《早梅》一诗，其中有“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两句。有个叫郑谷的建议他改“数枝”为“一枝”，可使词意更生动。齐己称善，下拜郑谷，时人称谷为“一字师”。毛泽东也非常愿意听取别人对他所做的诗词提出修改意见，这里就出了一个“半字之师”的趣闻。

那是在1959年6月，离别故乡达32年之久的毛泽东第一次回韶山。他满怀激动的心情，踏访了故乡的山山水水，与乡亲们亲切交谈。面对韶山解放后的深刻变化，心潮澎湃，写下了一首《七律·到韶山》的诗。

诗中头两句原为“别梦依稀哭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当时被毛泽东叫到身边当随行秘书的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先看到这首诗，他建议将“哭”改为“咒”。理由是，“哭”与“咒”虽然同有对已逝岁月的痛感，但“哭”较平淡，“咒”则深沉而感情更强烈。

“哭”与“咒”两字上半部分相同，下半部分不同，所以毛泽东不仅欣然同意，还风趣地夸赞梅白说：“你是我的‘半字之师’。”

“苏秦知道张仪 是个人才，能做大事”

1960年12月26日，毛泽东67岁寿辰那天，他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吃了一顿饭。这可不是为了祝寿，而是因为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将要下放到农村锻炼，为毛泽东做些基层情况的调查。

当时工作人员刚搞完整风，大家都经历了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又面临下到基层锻炼。为了使工作人员心情愉快地投入新的工作，投入到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毛泽东在吃饭时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

毛泽东说：从前，有张仪和苏秦^①两个人，都是春秋战国时鬼谷先生^②的学生。鬼谷是个地方，出了一个先生，所以叫鬼谷先生。后来苏秦在赵国当了宰相，地方就在邯郸。张仪在楚国做个小官。

楚相丢了一块宝玉，怀疑是张仪偷的，把他狠狠打了一

① 张仪，战国时魏国贵族后代。秦惠文王十年（公元前328年），任秦相。苏秦，战国时东周洛阳人，曾任齐、楚、燕、韩、赵、魏六国相，赵国封他为武安君。

② 鬼谷先生，即鬼谷子，相传战国时楚人，隐于鬼谷，因以自号。长于养性持身和纵横捭阖之术。

顿，满嘴的牙齿都被打掉了。那个时候，大概还不会安假牙吧！张仪回到家里，叫老婆看看他嘴里的舌子还在不在。他老婆说，舌子还在。他说，那就不要紧了。

他跑到邯郸找苏秦，一去就住“招待所”。大概是现在北京饭店之类的住所，好几天没有见到苏秦的面。

后来，苏秦请他吃饭。张仪到了苏秦的衙门，看到摆了酒席，排场大得很。苏秦坐在当中高处，请了各国大使，也有契尔沃年科^①。席面当然比我们今天吃的丰盛得多。但是却把张仪安排坐在下面角上，盛了点仆人吃的饭食给他吃。这下子张仪的气可就大了，无非是破口大骂苏秦你这个王八蛋，等等。

张仪回到“北京饭店”，满肚子的气。“北京饭店”的“经理”看他这个样子，就问他：张先生脸色不痛快，有什么气事吧？他说：当然有气！就把当年和苏秦是同学，今天苏秦如此这般对待他说了一番，并且骂苏秦此人简直是无情无义，是王八蛋。

这位“经理”说：这样看来，你在赵国是呆不住了。张仪说：当然呆不下去了，马上走。“经理”问他：你到哪里去呢？他说：这倒还没有想好，不管他，走了再说。“经理”说：看来只有到秦国去。张仪一想也对。就此动身。

“经理”陪他走到秦国，一路花费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三四十万人民币吧！到了秦国，他们为了见秦王，就走走门路，行些贿赂和送些衣服，一共又花了四五十万人民币。

^① 契尔沃年科，60年代初苏联驻华大使。毛泽东在这里是讲故事作比喻提到他。

以后，张仪当上了秦国的宰相，“北京饭店”的“经理”就向他告辞回国了，并问他今后怎么打算。张仪一提起苏秦还是咬牙切齿，并说过了两年一定要出兵攻打赵国。

“经理”见他这样说，就告诉他，赵国宰相苏秦是个好人。当时苏秦所以要气他，是故意的，怕他在赵国安居下来，不想上进，做不了大事。苏秦知道张仪是个人才，能做大事。如果在赵国依靠苏秦，他也只是当个“科长”什么的就算到顶了。策划张仪到秦国来，和给他的一切花销，都是苏秦主使的。

张仪一听，这才恍然大悟。“经理”又说：苏秦只希望张仪当了秦国宰相，15年内不要出兵打赵国。张仪听后表示：只要苏秦活着，我就决不出兵打赵国。

这个故事毛泽东讲得妙趣横生，大家都听入神了。讲完故事后，毛泽东说：你们看，苏秦对张仪是好意还是恶意？我们之间，进行批评帮助都是好意。他还说：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现在下去苦得很啊，一天只有很少几两粮食吃。你们受得了吗？不怕就去。下去以后，一个礼拜来个报告，直接写给我。三个月回来汇报一次工作。如果到你们真正活不下去了，不行了，快要死了，打一个电话来，我们来把你们接回来。好，就这样决定吧！

后来几名工作人员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经受了艰苦的锻炼，并反馈回许多第一手调查信息，为毛泽东正确决策提供了帮助。

“老九不能走”

京剧《智取威虎山》讲的是解放战争期间，我军一支侦察小分队深入东北林海雪原，消灭土匪座山雕的事。我侦察排长杨子荣化装成土匪，打入座山雕内部，被座山雕封为威虎山老九。取得众土匪信任的杨子荣，在被一个我军俘虏后又逃出来的匪徒认出来的情况下，沉着冷静，巧妙利用众土匪对自己的信任，化险为夷，处决了那个土匪。在这里，有一句“文革”期间家喻户晓的重要台词，杨子荣假装气愤要出走，众匪徒说：“老九不能走哇！”

“文革”期间，“四人帮”大肆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把广大知识分子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后，位居第九，加以政治上的歧视和迫害，并诬之为“臭老九”。

毛泽东对“四人帮”这种践踏知识、摧残人才的倒行逆施行为非常气愤。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在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他借用《智取威虎山》中的那句台词说：“老九不能走。”

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毛泽东这句“老九不能走”，是对“四人帮”的当头棒喝，也说明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关心

和爱护。尽管毛泽东在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上有时也有失误,但“老九不能走”这句话,充分表明毛泽东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与“四人帮”根本不同。这句话教育全党、全国人民,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也是再一次强调他的一贯思想,就是革命和建设事业是离不开知识分子的。这就为粉碎“四人帮”后,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拨乱反正起到了重要作用。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曾风趣地说:“‘老九’并不坏,《智取威虎山》里的‘老九’杨子荣是好人嘛!错就错在那个‘臭’字上。毛泽东同志说,‘老九’不能走。这就对了。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

责己 修身篇

毛泽东幽默趣谈

“是不是分店也可以搞 一点马克思主义呢？”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冤枉和委屈。受到冤枉和委屈怎么办？

毛泽东曾多次受过严重的冤枉和委屈，受过多次的打击。在50年代的一次中央会议上他说过：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消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

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回忆说：至于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比如，不选作中央委员，只给发言权不给表决权；撤消一些职务，如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党代表（井冈山时候）、前委书记等。“开除党籍”后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

这里说的是红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刚立足井冈山，可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

议：湖南失败是临阵脱逃，此事留在将来查办。他们把起义部队未去攻打长沙，而转向井冈山说成是临阵脱逃。因此红军刚立足井冈山，11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纪律决议案》做出：“开除毛同志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这个处分由一个叫周鲁的人传达到井冈山时，已是1928年3月，糟糕的是，误传为开除了“毛同志”的党籍。毛泽东背着处分，在井冈山开展斗争。当朱毛会师时，朱德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毛委员，你好！”毛泽东则说，我已不是委员，连党员都不是。朱德一愣，大声说：“乱弹琴。我看了文件，只开除你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你还是中央委员嘛！”

毛泽东继续回忆道：你说开除党籍对于一个人是高兴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后头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那个时候，给我安了一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因为我说了一句“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他们说政权哪里是枪杆子里头出来的呢？马克思没有讲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成的话，因此就说我犯了错误，就封我一个“枪杆子主义”。后来又被封为“一贯机会主义”。对我最有益处的，就是封我为“狭隘经验论”。填表的时候不是要填过去受过什么处罚吗？这些事情，现在填表我都不填，因为这样多，要填一大堆，而且这些没有一条我承认的。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在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

次肃反肃错了人。如此等等,这些真错误他们不处罚,而那大约二十次左右的处罚打击,都是没有确实根据的。特别是那个“狭隘经验论”刺激了我。似乎马克思主义只有一家,别无分店。是不是分店也可以搞一点马克思主义呢?

毛泽东的这些回忆是发人深省的,如果没有这许多曲折,怎么会有后来毛泽东所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等宏篇巨作呢?正是在这些曲折中,才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规律,总结和创造出一套独特的中国革命理论。



“我情愿看自己的脚”

提意见开展批评帮助，一定要注意方法方式，否则正确的意见别人也会听不进去。毛泽东就曾讲过他的一个经验教训，用以说明这个道理。

那是在红军时期。有一次部队在闽西活动，每天都要行军打仗，十分紧张艰险。队伍中有一批女同志，其中有的年岁大了，有的还怀了孕。这是影响行军作战的。一些指战员坚决要求把这些女同志留在地方。但也有的同志不同意，因为部队在白区活动，留下来的同志有可能被敌人抓住杀害掉。为此毛泽东召集各方面负责人开了讨论会。

担任闽西共青团特委书记的曾志也是女同志，所以更能理解那些孕妇和年岁大的女同志的苦处和难处，会上她坚决不同意把她们留在地方。争辩中，她越讲越激动，几乎是喊着说：“你们是在借刀杀人！是干着敌人想干也干不到的事情！”

毛泽东听后光火地对曾志说：“不同意你的意见就是借刀杀人？有理讲理，别一张嘴就扣帽子。”

曾志不服气，还顶撞说：“明知这样还要把人留下，你们不是借刀杀人是干什么？”

曾志话音刚落，遭到一片反对和指责声。有的说，这里虽

然没有党的组织，但群众已经有了一定觉悟，可以依靠群众。有的说，只有部队精简打胜仗，这些妇女才会更安全；否则打了败仗，妇女保不住，革命还要受更大损失。

这时，毛泽东摆摆手，让大家安静下来。他说：“工作中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注意不要出口伤人。”接着，毛泽东讲了他经历的一个故事。他诚恳地指指自己的鼻子，说：“我这个人就有这样的毛病，不招人喜欢，有意无意就伤害了别人。这个毛病不改正，有时候正确的意见别人也会听不进去。有一次我看到有位同志写标语，把共产党的党字给写丢了。我很生气，批评他责任心不强。这意见是对的，可我出口伤人，我说，‘你是个不负责任的人，我不高兴的人，我不愿看的人，我情愿看自己的脚！’这一来，那位同志不干了，同我大吵一通，而且心里有了疙瘩。”

毛泽东讲到这里，瞟了曾志一眼。曾志有些不自在了。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但对曾志来讲，也起到批评作用。

最后毛泽东表态：“我同意曾志的意见，这些女同志不能留下，留下危险太大。”

“脱帽，敬礼，赔不是！”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教条主义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它重新教育和训练了党内经过长期斗争保留下来的一批老干部，又教育和训练了抗战初期入党的大批新党员。

但是在整风运动期间进行的审查干部工作中，由于对敌情作了过分的估计，特别是康生搞了一个“抢救失足者运动”，使这项工作出现了严重的偏差，造成大批冤、假、错案。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现了审干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并于1944年春领导有关部门开始对错案进行甄别平反，并对受冤屈的人员赔礼道歉。毛泽东还主动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批评。毛泽东指示，凡是搞错了的同志，都要给予纠正，并且要向他明确宣布经本人同意签字的组织结论，还要向他们“脱帽，敬礼，赔不是”，宣布去掉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而且，当审干结束后，他在延安大学讲话时，脱下帽子向听众鞠躬致歉，请受伤害者接受他的歉意。

毛泽东的指示和向听众鞠躬致歉这一出人意外的做法，不仅使受伤害的同志大为感动，也使广大党员、干部深受教

育,大大增强了全党的团结,真所谓坏事变好事。在后来的战斗岁月中,那些受过伤害、忠于革命的干部都对党的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委屈无非有三种情况”

一个人受到委屈了应该怎么想？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回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时跟我谈过怎样对待委屈。毛泽东说，委屈无非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你自己对，他根本不对。那你不要感到委屈嘛，因为真理在你身上。真理在你身上，你会感觉到有力量。还有一种情况是，确实是你错了，人家是对的，不过你自己不认识，所以感到委屈。这是罪有应得嘛，你有什么委屈呢(笑)？第三种情况是，一半是你对，一半是人家对，你也不必感到委屈，反正你有一半不对嘛(笑)。

“告诉大家，毛泽东 原来只想当个教书匠”

在日常生活里，毛泽东是很和气、很好相处的。

有一件事，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中传为美谈。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接见外宾前必须先剃须整容。负责这项工作的理发员叫王惠，已经上了岁数，长得极像“少林寺”里的老方丈，只是多了副老花眼镜。可他戴了花镜视力也不济，总是歪侧着头，眯缝着眼左瞧右瞧，那把剃刀难得挥一下。

这时，毛泽东常常是看一眼手表，催老王说：“哎呀，老王，你快点嘛。”

“别着急，着么急呀。”王惠慢条斯理地讲，尾音拖得悠长。换个位置，好不容易才“刷”了一声。

毛泽东急得抬抬屁股，却被王惠从头顶上按住说：“莫急，误不了事。”

毛泽东用手擦擦额头，大概是急出汗了，又抬屁股想走。这位“少林寺老方丈”反而耐不住似的说：“怎么不听话呢？你别着急么！”

毛泽东哭笑不得，在王惠的手掌下强抬一下头：“我要你快点嘛。”

王惠居然拍、拍，在毛泽东的后颈上拍了两下，说：“沉住气，听我的，给你刮干净再去。”周围工作人员都看得目瞪口呆！

可是毛泽东呢，居然不发火，只是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而王惠一边给毛泽东刮后脖颈，一边又不知轻重地“教训”起毛泽东来：“你是国家主席，主席要有主席的样子。啊，又是我的手艺，剃不好我也不光彩嘛……”

事后工作人员议论纷纷：“这个王惠，太不像话了，简直不知天高地厚！”

“可不是嘛，给毛主席剃头，怎么能那样随便放肆……。”

毛泽东听到这些议论后，他和卫士田云玉聊天。

“小田啊，你怕不怕我？”

“不怕。”

“其他工作人员怕不怕？”

“有的不怕，有的怕。新来的同志容易紧张害怕。”

“不要怕么，大家都是人，毛泽东也是个人，有什么可怕的？”

“您是主席啊。”

“主席不是皇帝，主席也是人民的服务员。告诉大家，毛泽东也没想到他会当上共产党的主席，没想到当上国家主席。”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又说：“告诉大家，毛泽东原来只想当个教书匠，当个教书匠也不容易哩。革命有分工，分工不同，但政治上一律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比如王惠师傅，他就做得好。他工作认真负责，自尊自爱，他就不认为剃头的比当主席的低，他是从内心到言谈举止都将自己同国家主席放在了平等的政治地位上，这样的同志才值得我们尊重！”

“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 我今年 63 岁，但还不够耳顺”

1958 年大跃进期间，为了充分调动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智能才智和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了早日摘掉我国一穷二白的帽子，毛泽东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的口号。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好多科学的创造发明，好多增产节约的管理措施，好多促进生产力大发展的新生事物都涌现出来。

但是，在这个口号下，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借机冒出来了，那就是讲假话、吹牛皮、浮夸风、放大炮，还有一些助长这些错误东西的“左”的宣传、“左”的文章、“左”的口号等等。

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对这些口号有看法。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又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是毛泽东的同乡，又比毛泽东大 6 岁，但他对毛泽东十分敬仰，每次见到毛泽东都兴奋不已。而毛泽东对李达也很尊重，很关心。李达写的书他都注意阅读，还喜欢与李达交换对哲学问题的看法、意见。

大跃进中，毛泽东南下巡视，又去看望李达。但这一次，

俩人为一些口号问题不知不觉就争执起来。

李达说,有些口号不符合唯物主义的观点,例如: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

毛泽东却认为,这个口号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就都能做到,甚至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学了。

李达认为,这个口号在现在不能谈两重性,谈两重性,在现在的形势下就等于肯定了这个口号。

毛泽东是喜欢争论问题的,他问:“肯定怎么样?否定又会怎么样?”

两位老人就肯定、否定争论起来,越争越激动,最后李达批评说:“现在人们不是胆子太小,而是太大了,头脑发烧。主席脑子发烧一点,下面就会不得了,就会烧到 40℃、41℃、42℃! 这样中国就会遭难,主席信不信?”

人在争论中是不好控制住情绪的,毛泽东虽然激动,但还是控制住了自己。停了停,缓和语气说:“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有些发烧了,也有华氏百把度了。还是我在成都会议说过的那句话,头脑要热又要冷。”

事后冷静下来,毛泽东想了很久,讲了这样的话:“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 63 岁,但还不够耳顺。听了鹤鸣兄(李达号鹤鸣)的话很逆耳。以后我要同他多谈谈。”

后来,毛泽东对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头脑过热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警惕,他既注意保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又适当地泼了点冷水。但是由于对怎样搞社会主义缺乏经验,又有些急于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还是出现了经济过热以至失调的

严重失误。

毛泽东检讨自己不够耳顺的故事,对我们注意倾听不同意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是有帮助的。



“我只会立正、稍息、 睡觉、吸烟、坐凳子”

游泳,是毛泽东最喜爱的运动项目,也是他终生的爱好。一师附近的湘江,江面宽阔,少年毛泽东常邀同学在这一带江面游泳。他的游泳技术高超,耐力颇强。天气寒冷,别人不敢下水,他在水中自由自在。“直至隆冬,犹在江中”,便是他当年留下的行踪。就是这段生活,使他写下了著名诗篇《沁园春·长沙》,诗中写到:“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这里要讲的是,毛泽东 1959 年 6 月到故乡韶山时,在韶山水库游泳的事。

这个水库位于滴水洞口,三面环山,山高坡陡,林木茂密,水清如镜,碧波荡漾,风景宜人。但因为是三面环山,阳光照射少,所以水温很低。

6 月 26 日,66 岁的毛泽东健步登上水库大坝,围观的群众热烈地鼓掌,毛泽东向大家挥手致意。然后,在 10 来个会水的陪伴下,跃入水中。只见他动作自如,每游两三丈远,便将头沉到水里,再浮上来呼气,随即又沉下去,用手在水里梳头。又侧身在水里打了几个翻滚,溅起一阵阵浪花。

他看到坝上站着很多群众,便朝一些年轻人喊:“你们都

来游呢!”

“不行啊，我们都是岸脚鸭!”年轻人笑道。

毛泽东看到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还在岸上站着，便问：“小舟，你怎么不下水?”周小舟说：“我是秤砣，我下不了水。”毛泽东笑了，开玩笑地说：“你是秤砣，怎么叫小舟呢?两年不当省委书记，也要学会游泳啊!”

游了半个多小时，毛泽东游近岸边，岸上的人不断鼓掌。毛泽东像几岁小孩一样，见人们鼓掌，像是得到奖赏和鼓励，更加高兴地把头沉入水中，手露在水面也鼓起掌来，逗得岸上的群众开心大笑。

这时，他游兴正高，边游边和周围的年轻人研究起游泳技术来。他说：“你们会蛙泳、蝶泳、自由泳，我只会立正、稍息、睡觉、吸烟、坐凳子。你们会不会?”

大家都既不明白，又感好奇，请毛泽东表演表演。

毛泽东笑着说：“那好，我给你们表演表演。”

“当兵要从立正、稍息开始，游泳也要从立正、稍息学起。这就叫‘立正’。”说着他来了个“立正”，手脚不动在水中浮着。

“这就叫‘稍息’。”他上身稍动，下身不动。

“这就叫‘睡觉’。”他往水面上一躺，脸、肚皮、腿脚朝天，并露在水面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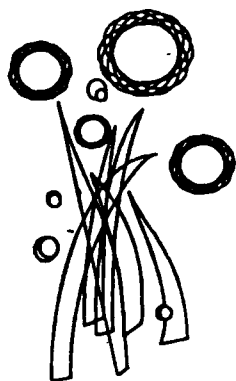
“这就叫‘坐板凳’。”他把身子又立在水中，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上，做个二郎腿的样子。

“这就叫‘吸烟’。”说着向橡木船上的工作人员要了一支点着的香烟，“坐”在水中吸起来。

毛泽东表演的这些节目，一个比一个精彩，无论在水中的游泳健儿，还是岸上的观众，无不大开眼界，大声喝彩，报以一

阵又一阵掌声。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游泳激发了毛泽东的诗意，游泳磨炼了毛泽东的毅力和斗志，游泳培养了毛泽东藐视一切困难、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世上没有先知先觉， 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 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

1959年7月，在庐山一个暮色已浓、阵雨骤来的傍晚，周小舟、李锐、田家英、周惠四人，围坐在毛泽东身边亲切地交谈着。

37岁的田家英谈到他春天领着一个工作组，去四川农村调查。在全国劳动模范罗世发的家乡，这位合作化时期的老先进向他如实地讲述如何被逼说假话、放卫星的苦境。田家英学着罗劳模的腔调说：“水稻要亩产万斤，哪个鬼儿子哄你，只好把谷子往田里堆！”

毛泽东听罢哈哈大笑，继而微微摇头，用力在烟灰缸里按灭烟蒂后说：58年有些事，我也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达到高峰。其中也有一些胡思乱想、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

李锐见状便放胆问道：“主席，您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呢？”

毛泽东说：我也是受了人家影响。一位有名的科学家写文章，说只要太阳能多利用一点，农作物就可以大幅度高产。

毛泽东接着说：人的认识过程是一个对立统一的过程。正确的认识同错误的认识通常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有对立面不是坏事，我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有的时候上半夜想的与下半夜想的就互相打架。

服务员端来茅台酒给众人一一斟满。毛泽东一饮而尽，抿抿嘴，说道：58年的毛病，主要出在综合平衡上。现在看来，陈云那个“先市场，后基建”的意思是对的。6.5亿人的衣食住行没有安排好，出了一点乱子。我是始作俑者喽！怪不得下面的工作同志。

“是的！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周小舟像是被茅台酒壮了胆，说出这一句。话音刚落，自先后悔起来，众人也捏了把汗。

这时，毛泽东擦着火柴，燃起一支烟，神色平静，继续说：我四十岁以前肝火旺，总觉得真理在自己手里。现在也还有肝火。呐，在江西苏区的时候，有一次对胞弟毛泽覃发脾气，或许是要伸手打人吧。毛泽覃说：“共产党又不是毛氏宗祠！”

众人哄堂大笑，情绪缓和下来。

毛泽东待大家笑过之后，正色道：“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

“这是我小时候 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

毛泽东小时候也信神，而且跟他母亲一样信得很厉害。

1959年6月的一天，毛泽东回故乡韶山搞调查。来到韶山招待所后对所长说：“你们把这里的山神土地找来。”所长没听明白。毛泽东笑着解释说：“就是把公社书记、大队书记找来。”

第二天，在韶山“山神、土地”的陪同下，毛泽东与工作人员来到韶山毛泽东的故居。首先来到小堂屋，他看到板壁上供着神龛子，就对着作了个揖，幽默地对大家说：“这是我小时候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我小时候信过佛，后来不信了。”

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上讲话中说：“毛主席常说，他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他最不同意晋察冀一个课本描写他在十岁的时候就反对迷信，说他从小就不信神。他说恰恰相反，他在小时候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得很厉害。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你看这样还不够迷信吗？”接着，周恩来还讲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毛泽东很喜欢读古书，另一个例子是毛泽东开始研究中国革命，也是只

注重城市工人运动。

周恩来说：“我讲这三个例子是说明：毛主席也是封建社会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也曾经迷信过，也曾经读过古书，也曾经研究问题开始只注重一个方面。他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能够从迷信中觉悟出来，否定旧的东西；他之所以伟大，更在于他敢于承认旧的过去。我们看到在旧社会里有这样的人，乃至在人民统治的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人，一旦有了进步，就觉得自己过去什么都了不起，是‘天生的圣人’，把自己说得简直什么错误都没有，什么缺点都没有。人家这样说他，他也喜欢听。那就危险之至。所以对那些有迷信的青年，落后的青年，只认识片面不认识全面的青年，我们不要抛弃他们，要去教育他们。”

“遇事不怒，基本吃素， 多多散步，劳逸适度”

50年代，有一次，毛泽东对他的保健医生徐涛说：“人哪有长生不死的？古代帝王都想尽办法去找长生不老不死之药，最后还是死了。在自然的生死问题面前，皇帝与贫民都是平等的。”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长寿，也是合乎情理的吧？”徐医生说。

“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那孔老夫子现在要活着该有2500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了？”

又有一次，毛泽东说：“曹操多年军旅生涯不会很安逸，可在1700多年前，医疗条件也不会怎么好，他懂得自己掌握命运，活了65岁，该算是会养生的长寿老人啰。你们搞医疗的应该学学，不要使人养尊处优。只想吃好、穿好，不想工作还行？更不能小病大养。保健不是保命，不要搞什么补养药品，我是从来不信这些的。主要是乐观、心情开朗、锻炼身体。”“曹操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陆游讲

‘死去原知万事空’，这都是唯物的。”

毛泽东还告诉徐医生，他的一个朋友跟他说过养生之法是：晚饭少吃口，饭后百步走，娶个老婆丑，活到九十九。毛泽东又说：“我也有个原则：‘遇事不怒，基本吃素，多多散步，劳逸适度。’”

对毛泽东提出的养生健身“十六字诀”，徐医生大为赞同，并指出，发怒是七情之中对健康危害最大的。对古今中外长寿老人的调查中，排在第一位的长寿因素几乎不约而同的就是精神心理上的乐观开朗，而毛泽东在这一点上尤为突出、革命的乐观主义，心胸开朗，无私忘我，事业心强，信心十足，七情俱在但很能情绪自控，生活中偶尔有些怒气，平静出口，态度严肃，事后还常向年轻的工作人员表示歉意，从无面红耳赤态度粗暴表现。而“十六字诀”中，劳逸适度，不是只逸不劳，要有劳有逸。

毛泽东还说过：“我看你们容易迷信药物，不要有点小病就用药。人还有抵抗力嘛，先让自身的抵抗力与细菌作战，能战胜就不要用药。如果抵抗力差，你再用药帮他一把。这也是自力更生为主嘛！”

“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 就取不得成就了？”

1960年5月，毛泽东在郑州三次接见了外国朋友，这些外国朋友都是在北京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后到郑州参观访问的。当时毛泽东正在郑州做调查研究。

外国朋友反映，原以为毛泽东只是对他们做礼节性的接见，想不到和他们交谈了近4个小时，好像老朋友在一起谈心。

熊向晖同志将这三次接见写成新闻报道，准备在报纸上发表。事前他把写好的稿子交给毛泽东审阅修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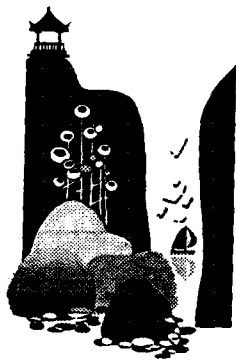
原稿第一段写的“他们热情地称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被毛泽东圈掉了；“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被改为“在自己的工作中”。熊向晖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改，问毛泽东。

毛泽东说：为什么一定要说毛泽东的领导呀？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就取不得成就了？这是唯心史观，不是唯物史观。我把唯物史观的精髓概括成一句话，叫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过去打仗，靠的是人民；现在建设，靠的还是人民。一切成就都来自人民自己的努力。你不赞

成？

熊向晖说：唯物史观并不否定杰出的领导人的作用。

毛泽东说：这是半截子唯物史观。领导人和人民不能分开，而是人民的一部分。……领导人和人民也不能等量齐观。今天我向拉丁美洲朋友讲了，你在稿子上也写了“人民是决定的因素”，应当突出“决定的因素”，不应当突出“非决定的因素”。就是说，应当突出人民，决不要突出个人。



“我晓得我在那里站岗!”

1966年6月,毛泽东又一次回到故乡韶山。这是毛泽东继1959年后第二次回乡。

这次回韶山,毛泽东的心情和1959年是不同的。他没有公开接见群众,他的行止都是“保密”的。他心情不好,在思考着许多重大问题。

当时韶山毛泽东故居陈列馆已经开放了,毛泽东的随行人员问:“主席,去不去韶山陈列馆。”毛泽东回答:“你们去吧,我不去。我晓得我在那里站岗!”

原来在陈列馆进门的楠木厅里,立着毛泽东高大的塑像。

何止在韶山,当时全国正掀起一股狂热歌颂毛泽东的浪潮。对此,毛泽东内心是反感的,但又无奈。他在这时给江青的一封信中写到:“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毛泽东在信中又写到:“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

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谈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的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这里所说的“朋友”,是指林彪。林彪在几次中央会议上都大肆吹捧毛泽东特殊的天才,大谈所谓有人要搞“政变”问题。对这些言过其实的吹捧,毛泽东“感觉不安”,并已经隐约感觉到林彪的叵测用心,但没有及时揭露。直到6年以后,即林彪野心暴露,外逃摔死在蒙古后,他给江青的这封信才得以公布于世。

“鱼儿呀，毛泽东给 你们赔不是来了。”

在生死问题上，毛泽东信奉的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毛泽东曾对护士长吴旭君说：“我这个人就这么怪，别人越要回避的事，我越要挑起来说。在战争中我有好多次都要死了，可我还是没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有胜利也有失败，有正确也有错误，有前进也有后退。”

他生前多次谈到自己的死。1961年他畅游长江之后，就曾同来访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谈起这事。1964年他在军队干部会议上又说：人年纪大了也会死。人如果负担太重，死是很好的解脱办法。1973年，他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时说：“我活不到革命结束了，我已经跟上帝打过招呼了。”1976年他病重，尼克松的女儿来看他，他又一次说：“一个人负担太重，死是解脱。”

最风趣的是他与护士长吴旭君的一次对话。他笑着对小吴说：“中央给我立了一条规矩，不许我坐飞机。我想，我以后还会坐。总之，七十三、八十四，闰王不请自己去啰。”说完他开心地大笑。

吴旭君听了这些话,却觉得心里很沉重,一点儿也笑不起来。她说:“咱们能不能不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你这个人呀,还有点儿迷信呢。”他指着小吴的鼻子说,“你是个搞自然科学的,应该懂得自然规律的严肃性。”他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颜色鲜艳的红衣服或花衣服,要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地参加庆祝会,然后你就大大方方地上台去讲话。”

“讲什么?”小吴茫然地问。

“你就讲: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停了一会儿,他认真地对吴旭君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

姓名 情趣篇

毛泽东幽默趣谈

“可这二十八划不平常呀！你看，共产党、共产主义的‘共’字，不就是‘廿八’吗？我们都要姓‘共’嘛”

“你注意过你现在的名字是多少笔划吗？”吃完饭，毛泽东送出谭政，走到院子里，像是想起了什么，突然问谭政。

谭政，原名谭世名。1927年5月，他投笔从戎时改名谭政。所以毛泽东问他“你现在”的名字是多少笔划。

谭政用手指划着数着说：“二十八划！”

“那你数一数我的名字‘毛泽东’是多少笔划？”

“也是二十八划呀！”（指繁体字）谭政数了数笑着说。

“咱们从井冈山开始，共事15年了，大概你没想过这个十分简单的数字，可这二十八划不平常呀！你看，共产党、共产主义的‘共’字，不就是‘廿八’吗？我们都要姓‘共’嘛。”毛泽东幽默地笑着说。谭政听了，也会心地笑了起来。

谭政这时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在将要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谭政深感任务重大，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他决定求教毛泽东。这天，他和毛泽东谈了很久，谈了很多，谈到了在井冈山写《中国的

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也谈到了在上杭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案。如今，他要起草《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啊，他们共事15年了，都姓“共”嘛。谭政心里明亮，决心按照古田会议的精神写好这个《报告》。

谭政是湖南湘乡人。1927年5月，他随妻兄陈赓离开武汉唐生智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来到卢德铭的武汉政府警卫团，当了一名文书。这年9月，他随警卫团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三湾改编时，谭政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上井冈山后，他入了党。1928年6月，毛泽东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把谭政调到前委作秘书工作。

“前委在哪里？”谭政问毛泽东，他要找前委报到。

“前委在哪里？就在这里呀，我一个，加上你一个，就咱两个。”毛泽东笑着回答。

这时，毛泽东正为湘赣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决议案，稿子已写好一大叠。“你就先帮我办好这件事吧。”毛泽东交待说。

谭政古文基础好，字写得工整。他很快便把草稿抄好了。这个决议案的一部分，就是后来被选入《毛泽东选集》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从此以后，谭政便与毛泽东生活、战斗在一起。毛泽东每有文稿，都由谭政抄写，两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在毛泽东的影响教育下，谭政在政治、理论上进步很快。1929年12月，谭政又协助毛泽东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对肃清旧式军队的影响，使红军成为真正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具有重要意义。

15年后的今天，谭政接受了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报告的任务。经与毛泽东的多次商讨，他起草的《关于军队政治工

作问题》的报告,成为继《古田会议决议》后,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历史文献。



“小心打你的土豪啊!”

1930年冬天,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兼一军团政治委员的毛泽东随贺子珍到红军的卫生所看病。他一面看病,一面询问卫生所的工作和大家的生活情况。当卫生所所长介绍新来的一个卫生员时,毛泽东很感兴趣地向那个小战士端详了一番,然后问:你叫什么名字?小战士回答:我叫钱昌鑫。

“是日曰昌吗?是哪个‘兴’?”

小战士有些不好意思,所长替他回答说:“是三个金字的鑫。”

毛泽东笑着说:“你姓钱还不够,还要那么多金子呀!小心打你的土豪啊!”

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你比孔夫子还高明啊！”

“抗大”是毛泽东亲自倡导和主持创办的一所专门为抗日战争储存、培养、输送军政干部的学府，是革命的大熔炉。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中，“抗大”创办9年，由最初的数百人，直至发展成为拥有12所分校、数万名教学人员的大学，先后为各个抗日根据地输送了10万余优秀儿女。他们中既有能征善战、统领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也有战斗在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基层干部。

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毛泽东高瞻远瞩，预见到抗日高潮即将来临，需要大批的干部去领导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5月14日，毛泽东在黄河西崖的大相国寺主持召开了一个会，决定成立红军大学，毛泽东将她定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6月1日，在陕北瓦窑堡，数十名优秀的红军干部会聚在这里，举行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1937年2月，学校更名为“中国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抗大”创办初期，主要课程都由中央领导同志担任。毛泽东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还先后讲授了《实践论》《矛盾论》和《论持久战》。1937年3月，毛泽东又为“抗大”同学会成立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

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并把它作为“抗大”的教育方针规定下来。1937年4月,毛泽东又委托校长林彪给“抗大”带去了他亲笔写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8个大字。这8个大字就成了“抗大”的校风。

在党的“七大”召开前夕,“抗大”七分校校长彭绍辉从甘肃东部的东华池七分校校址来延安汇报工作。毛泽东在枣园接见了,询问七分校的工作情况。彭回答说:七分校的学员是由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和太行来的人组成,编为3个大队,还有女生队,有3000多人,700多个教职员。毛泽东听后高兴而诙谐地说:“孔夫子是‘贤人七十,弟子三千’,你比孔夫子还高明啊!”

“你真是个‘孙悟空’呀!”

30年代,南京政府的报纸大肆宣传毛泽东患有不治之症,严重的肺结核,已经到了无法医治的时期: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1936年7月,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到达保安后,决定对毛泽东的健康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一天晚上,毛泽东正在蜡烛灯下,聚精会神地拟写给西征红军指挥部的电报。警卫员轻轻推开门,领着两位美国客人进来了。

客人落座后,斯诺看着毛泽东亲切的目光,满头又长又密的黑发,说道:“毛主席,我在白区的时候,经常看到南京政府的报纸上说你患有不治之症。今天,我想通过对你身体的全面检查,向世界宣布你的身体是健康的,使南京政府的那些骗人的宣传彻底破产。”

“好啊!你这个采访专家,考察了我们红区的一切,现在还要考察我的身体,你真是个‘孙悟空’呀!”毛泽东指着斯诺,风趣地说,“随便检查吧。”

斯诺冲着马海德点了点头,示意他开始检查。马海德拿出听诊器,请毛泽东解开衣服,躺在炕上,开始作全面检查。他用听诊器听了又听,用手指敲了又敲,摸了又摸,按了又按。

经过 40 多分钟的详细检查之后,马海德取下听诊器,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医学博士,怎么样呀,是不是患有不治之症?”毛泽东从炕上下来坐在椅子上,问道。

马海德闪动着一双棕色眼睛,非常高兴地说:“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特别是肺部没有问题。”

斯诺听了,高高地举起手臂,大声说:“我要向全世界宣布,毛泽东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让那些谣言统统见鬼去,让南京政府的骗人宣传彻底破产。”

“你们好厉害呀”

有些人对跳交谊舞有偏见，看不惯，甚至反对。其实跳交谊舞是一种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大众文化娱乐活动。据分析，跳一个半小时交谊舞，相当于步行30里的运动量。作为一种既可锻炼身体，又可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轻松一下脑神经，以便更好地工作学习的健康文化活动，在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就曾组织过。新中国成立后，还在中南海组织过，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之前。

毛泽东就是在延安时期学会跳交谊舞的。

那时候，延安的生活极其艰苦，没有电影，文艺活动又很简单，久而久之，大家又不喜欢老看同样的节目。紧张的工作之余，大家都很想松弛一下脑神经。正好，抗日战争时期，从全国各地，从大中城市里来了许多革命知识分子。他们多才多艺，有的就会跳交谊舞。于是有关的领导同志，就利用既作食堂又作会议室的平房，每星期六的晚上组织一次跳舞晚会。开始会跳的人很少，后来经过互教互学，人逐渐多起来。

为了毛泽东的身体健康，当时任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医务所所长的朱仲丽（王稼祥的夫人），不知费了多少口舌，想请毛泽东学跳舞。起初毛泽东对跳舞毫无兴趣，后来他又说没

有时间,最后毛泽东终于被说服了,来到舞场。

所谓舞场,就是窑洞外面一个不大的土坪。一张方凳上放着缴获来的胜利品——一架手摇式留声机和几张旧唱片。几个年青人使劲摇着留声机的摇把,上紧发条,留声机发出了不大动听的西洋乐曲声。大家争着教毛泽东怎样摆姿势,怎样端正腰身,怎样按节拍走步子。

开始,毛泽东心不在焉,走起舞步来,和士兵操练没多大区别。“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大家喊着节拍,让他向前几步,又向后几步。毛泽东紧张起来,说:“你们几个都来支配我,让我向前我就得向前,让我退后我就得退后,向左就得左,向右就得右,你们好厉害呀!”一番话逗得大家笑弯了腰。

每次请毛泽东跳舞,他都是只给片刻时间,而且是应付式的,勉强走几步就没有兴趣了。后来朱仲丽才知道,当时他正在执笔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稿。

不过,那时的一番练习,为毛泽东学跳交谊舞打下了基础。全国解放后,朱仲丽又和毛泽东跳过舞。这时他已经会跳好几种舞了,而且舞步纯熟,就连典雅的探戈,也跳得很有姿态了。

毛泽东还曾经和朱仲丽说过,跳舞这个运动不错,能休息脑子,使人两腿有力,还是一个联系群众,与群众交谈的好场所,补了游泳之不足,在水里就不能和别人谈话。

“胡宗南把咱们从延安赶出来， 到处流浪……”

1947年3月中旬，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率20多万大军向延安大举进攻。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审时度势，决定撤离延安，留座空城给胡宗南，麻痹一下敌人。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胡宗南进占延安后，反动派营垒中一派得意忘形，蒋介石决定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大肆宣扬，并和夫人宋美龄极力促成胡宗南的婚事。

就在胡宗南筹备婚礼之际，毛泽东也正为这位蒋介石的黄埔系心腹爱将精心准备着一份别致的“贺礼”。1947年3月25日，也就在我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五天，西北野战军取得了青化砭战役的胜利，给胡宗南背上插了一刀。以后几个月内，我军又接连取得了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等战役的胜利，改变了整个西北战局，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使西北人民解放军由内线防御转入了外线进攻。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工作人员劝他休息休息，可他就是不听。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到了1948年元旦。机关里的同志决定组织个小型舞会来庆祝一下，同时也好让毛泽东休息一下。

于是便借了一面大鼓，找了两把胡琴，算是拉起了个小乐队，又到新华社和广播电台请来部分女同志，舞会就算准备好了。

警卫排长阎长林谁也没请示，直接跑到毛泽东的办公桌前说：“主席，去跳舞吧！”

“噢？有跳舞啊，在哪里？”毛泽东带着几分惊讶地问。在延安时，每到周末，毛泽东、周恩来等都要跳舞。转战陕北以来，环境不允许，毛泽东也似乎把这事忘在脑后了。今天，阎长林一提，毛泽东来了兴趣。

“有，在小灶食堂里。”

“和谁跳啊？”

“新华社和电台的同志。”

“这倒新鲜！好吧，我去跳舞！”毛泽东说着站起来向外走，边走边说：“你去告诉副主席他们，就说我说的，请他们也去跳舞，玩一玩。”

不一会儿，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出现在舞场。青年们一见领袖来了，呼啦一下围上来，争着同他们握手。

毛泽东今天兴趣特别高，他非常幽默地对周围的青年们说：“咱们都是难友，胡宗南把咱们从延安赶出来，到处流浪，闹腾了大半年，现在算是得到了解放，咱们就用跳舞来庆祝这个解放吧！”

欢乐的舞曲奏起来了，毛泽东翩翩起舞。屋子太小了，盛不下这么多热情奔放的年轻人，于是多数人到了院子里跳。人们跳啊，转啊，在一曲曲欢乐的舞曲声中，送走了艰苦卓绝的1947年，迎来了即将取得胜利的1948年。

“原来你是家里的一匹好马啊!”

1949年3月的一天,中央办公厅叶子龙通知机要通信班李家骥,到毛泽东身边当卫士。

“你叫什么名字?”见面后毛泽东问。

“李家骥”,小李谨慎地回答。

“李——家——骥,哪几个字啊?”毛泽东好像没听清楚,不急不慢地拉长声问。

小李回答:“姓李,十八子李,家庭的家。”未等说完,毛泽东又问“那骥呢?”“马字旁边加一个晋察冀的‘冀’。”小李接着回答。叶子龙马上又把这个字的两偏旁解释了一下。

“噢,原来你是家里的一匹好马啊!”毛泽东明白后说。

小李乐了,原来毛泽东这样平易近人,还喜欢开玩笑。

毛泽东似乎想起一事,把话题一转,对叶子龙说:“转战陕北时我的那匹马为打败胡宗南立下了大功,是不是也带进城了?”叶子龙答道:“在香山喂养着呢。”

“对,凡是对革命有贡献的,我们都不能忘记他们。”毛泽东说。

“你是天下老一嘛!”

60年代初,毛泽东南巡回京途中,经过微山湖畔的山东省滕县。专列在滕县车站做短暂停留时,滕县县委书记登上专列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毛泽东迎出车厢,热情地握住王的手,问道:“你是哪个名字啊!”

王书记拘谨而又恭敬地答道:“主席,我叫王天乙。”

“噢,”毛泽东听后笑了,幽默地说:“你是天下老一嘛!”

王急忙更正道:“不,不。我不是天下第一的一,是甲乙丙丁的乙。”他心想,在主席面前,我哪敢称“天下老一”。

不过这么一打岔,王天乙心情放松了。向毛泽东汇报完滕县的工作,两人又扯起闲话来。

毛泽东说:“滕县在战国时候是个小滕国,你现在就是小滕国的国王啦!孟子当年来这里,还被诬赖偷了你们滕国人的鞋子……”

王天乙对此一无所知,十分茫然地望着毛泽东。

毛泽东瞥一眼窗外浩淼无边的微山湖,问道:“听说微山湖里有种红尾鲤鱼,还是四个鼻孔,你知道为什么是四个鼻孔嘛!”

王天乙又是一怔，自己生在微山，长在湖边，在微山湖里打过游击，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微山湖的鲤鱼是四个鼻孔呢？

后来王天乙翻阅了很多书，还到鱼市上仔细观察，并向渔人请教，始终不得其解。

有一次他到一个渔队开干部会，干部们都到齐了，正聚在船头议论什么，一群孩子也夹在大人中间听得入迷。王就悄悄地把手溜子船靠过去，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原来说的是很久很久以前，湖上有个渔民的女儿叫翠莲，这姑娘生得如花似玉，心眼又好。一个渔霸看中了非要娶她不可。翠莲早有了意中人，对渔霸的要求宁死不从。渔霸令狗腿子来抢，翠莲抓过一把小渔叉，刺向自己的面颊，顿时血流如注，昏死过去。等她苏醒过来时，鼻子两侧就出现了两个血窟窿。即使这样，渔霸还不放过，硬要逼婚，翠莲趁人不备，一头扎进水里。渔霸立即派人下湖打捞，可连个人影也没寻着。从此微山湖里就有了一种红尾金色、四个鼻孔的大鲤鱼……。

“嘿！”听到这里，王天乙不禁乐得大叫一声，真是踏破铁鞋无处觅，得来全不费功夫。渔队干部们见王书记那么兴奋，个个莫名其妙。可王天乙由此悟到，原来毛泽东向我提这个问题，是让我多读书学习，多深入群众搞调查研究啊！

“我可是个大包袱， 硬把胡宗南给压垮了！”

1948年3月，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中央前委机关转战陕北一年整，完成了留在陕北的任务，随着战争的胜利发展，为了更有利于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便决定东渡黄河，到河北平山县与中央工委汇合。

3月23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等由陕北吴堡县川口渡口乘船渡河，进入山西临县，一路北上，26日来到兴县蔡家崖。蔡家崖是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等听取了贺龙、李井泉的工作汇报。毛泽东又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并去晋绥日报社看望了编辑部的同志们，与他们谈了话。

看到中央领导同志这样忙碌、劳累，贺龙司令员特意安排了两个剧团在晚上演戏，请毛泽东、周恩来等放下工作去看戏，让他们放松放松、休息一下。听了贺龙司令员的安排，毛泽东很高兴，说：“好哇，客随主便，听老总你安排。”

听说毛泽东要来看戏，这晚人来得特别多。当毛泽东、周恩来在贺龙陪同下来到广场时，人们一下子都站了起来，欢呼着、拥挤着，千百只手都伸了过来。毛泽东、周恩来热情地握

着伸过来的手。但由于人太多,已握不过来,路也被拥得走不通了。贺龙看到这种情况,一面劝阻大家,一面挥手让台上马上开演。戏开场了,人们才慢慢稳定下来。

看完戏,毛泽东回到住处。贺龙匆忙赶来,一进门就说:没料到秩序这么乱,让主席看个戏也得不到安静。毛泽东非常理解群众的心情,他没有丝毫被搅扰的感觉。见贺龙有点歉意,便风趣地对他说:“很好嘛。你不让看,他们反而非看不可。我们脸上没有多长一块,也没有少长一块,看一看没有什么关系嘛。”

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蔡家崖停留了8天。尔后乘车出发,途经苛岚、神池,4月6日到达代县。从神池至代县,途经雁门关。雁门关是我国北方的重要关隘,为历代兵家要地。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关前下了车,登上雁门关门楼,环顾四野,但见蓝天白云下,山峦起伏,群峰峭立;峰峦夹峙下是一片开阔地带,雁门关横断其间,真可谓“三关要隘无攻地,九塞尊崇第一关”。陪同护送前来的军区参谋长说:1937年10月,120师雁北支队就在这一带伏击日军汽车大队,炸毁汽车18辆。

雄关依旧,岁月悠悠,置身于这古来征战之地,领袖们吊古感今,不由得诗兴大发。这时任弼时想到了唐人李华的《吊古战场文》,并朗声背诵起来:“浩浩乎!平沙无垠,夙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

接着任弼时的朗诵,毛泽东续背了下旬:“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背到“常覆三军”一句,毛泽东停住了,指着参谋长说:“他不是告诉我们的吗,在这里把鬼子的汽车队给覆了。”

听了毛泽东这由联想而发的幽默话语,大家都大笑起来。

代县是晋绥和晋察冀两区的联接地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已派保卫部长许建国来此迎接毛泽东、周恩来等。

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行离开代县，经过繁峙县的们强村，越过风雪弥漫的五台山，下山东行不久，即进入河北地界。过了龙泉关，面前迎来的是另一番景象：沿途花红柳绿，麦苗青青，一片明媚春光。道路越来越平整，汽车飞快地奔驰，不久即到平山县西下关村。在此住了一夜，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乘车前往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城南庄。

聂荣臻司令员、赵尔陆参谋长等乘车赶来迎接毛泽东一行。毛泽东走下车来，聂荣臻司令员快步迎上前去和毛泽东握手，说：“主席，总算把你等来了！”毛泽东握着聂司令员的手，风趣地笑着说：“我可是个大包袱，硬把胡宗南给压垮了！”

这时，周恩来、任弼时的车子都到了，大家站在路上互致问候，亲热交谈。大家都说：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辛苦了，说毛主席瘦了。毛泽东听了笑着说：“这都是在战争生活中锻炼的结果。这个瘦是个好现象，用钱是买不到的。”

听毛泽东这么说，大家都笑了。

“她头上有两个辫子， 她是两个封建”

1949年，党中央、毛泽东住在北平西郊的香山双清别墅。有一天，毛泽东吃过早饭后带着毛岸青、李敏及警卫员武象廷去散步。半路上，碰见了一位建筑工人在为防空洞担水淋石灰。

这个工人师傅大概有50多岁了，头上还留着一根很长很长的辫子，一副满清臣民打扮的样子，尽管清王朝已经覆灭快要40年了。

毛泽东向这个留长辫子的工人走过去，热情地同他打招呼。可是，这个工人不知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低下头干他的活，仿佛在他面前根本就没有什么人来到似的。

毛泽东并没有把这当回事，还是和蔼地问他：“老乡，你干什么呢？”

长辫子工人只顾干活，不言不语。

毛泽东仍很耐心地亲切地对他说：“老乡，你帮助我们干活，谢谢你。”

他还是不言语，把辫子缠在脖子上，只顾埋头干着活。

毛泽东继续对他说：“老乡，你头上留着那个辫子干什么？”

还不如把它剃掉，留辫子干活既不方便，又不卫生。”

这个工人也太奇怪了，他总是不吭不哈，莫非他是哑巴？这时，武象廷想走过去，告诉他，同他谈话的是什么人，你为什么不吭声？可是毛泽东一边打手势制止了小武，一边对他身旁的毛岸青和李敏说道：你们知道为什么他要留辫子？他这是封建。满清皇帝统治时期，人们都得留辫子，谁要是敢不留辫子，就是对皇上的反抗，皇上就要杀他头的。这个人他的思想还不开化，害怕皇帝一旦再出来要杀他的头，所以，他还要留辫子，等皇帝出来，表示忠于皇上，是皇上的好臣民，皇帝就不杀他了。

说到这里后，毛泽东又转向这个工人，微笑着对他说：“老乡，你不要害怕，皇帝是不会再出来了。你把辫子剃了吧，保证没有人敢杀你了。”

这个工人真怪，他还是不吭不哈。

无奈，大家离开了这个留着长辫子的奇怪工人。走在路上，毛泽东似有所思地告诉大家：“这个人思想守旧，对我们还不了解，他不敢和我说话，怕说错了要杀头的。”

说完这句话，突然，毛泽东把视线转到毛岸青的头上，用右手摸着毛岸青的头，微笑着说：“那个人头上留着一个辫子，你头上没有留辫子，你不是封建。”说着，又用右手指着李敏的头，李敏头上扎着两个小辫子。他诙谐地说：“她头上有两个辫子，她是两个封建。”

这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她的伤口刚合上， 你就忍心又割一刀？”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毛泽东这首脍炙人口的《沁园春·雪》词，据说是他长征过后初到陕北看见大雪纷飞时所作，充分反映出他对皑皑白雪的喜爱。毛泽东喜欢雪，他的诗词里就有许多关于雪的赞叹。除了这首《沁园春·雪》以外，《七律·长征》中有“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念奴娇·昆仑》里有“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卜算子·咏梅》里有“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在毛泽东的眼里，雪，是祖国美好河山的象征，红红的阳光照耀在白白的雪原上，祖国大好河山“红装素裹”“分外妖娆”。雪，又是革命意志的象征，“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毛泽东诗《七律·冬云》）。“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毛泽东词《卜算子·咏梅》前两句）。雪造就的寒冷天气是艰苦的，但环境越是艰苦越能磨炼革命者的意志，“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毛泽东对雪情有独钟，而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形容毛泽东说：“生活中的毛泽东，本身就是一首‘雪’的诗。艰苦、豪

迈、冷峻、生动，多姿多彩。”充满情趣。

1951年冬，北京落下这年的第一场雪。那时，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毛泽东工作一夜，批阅了大量文件，天亮时，放下笔。他伸伸腰，搓搓脸，朝门口走去。

开门刚跨出一步，他便猛地立住脚，仿佛无意间闯入了一个美妙的童话世界。纷纷扬扬的落雪使他惊喜激动。他睁大双眼，仰天凝视，目光从漏筛一样的天空缓缓移向积雪的屋顶、松柏，最后又俯首凝视着像铺了白毡般的庭院，久久一动不动，像是谛听着落雪的声息，又似陶醉于雪中檐头麻雀的欢叫。

一名卫兵见毛泽东站在门口发愣，忙抓起扫帚要去扫路。

“不要扫！”毛泽东急切地喊。他发现铺砖的路上雪比别处的薄，问到：“这路你扫过了吗？”

卫兵连忙解释：“黎明时我已扫过两次，雪一直下，所以……”

“一次也不要扫，把扫帚扔了。她的伤口刚合上，你就忍心又割一刀？”

这次卫兵却发愣了。他放下扫帚，怔怔地望着铺满白雪的路，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已经走出廊檐，走出两步，回头看看自己留在雪地上的脚印，目光里闪耀着孩子般新奇惊喜的神情。他竟不忍心再向洁白无暇的雪地落下脚去，就站在雪地里，两脚始终保持一前一后的姿式，做起深呼吸运动来，还长吸一口气说：“嗨，空气多新鲜！”

“主席，走一走吧，站久了会感冒。”卫士远远提醒他。大

家也都不敢迈步，怕践踏了毛泽东所迷恋的雪。

毛泽东不理睬。他手背上的雪花在融化流淌。一颗晶莹的雪花飘落下来，毛泽东伸出舌头，舌尖一触，雪花不见了。他咂咂嘴，赏心悦目地笑了。卫兵和卫士们看着毛泽东孩子般的喜悦神态，也偷偷地捂嘴笑了。



“你已经比较伟大了， 发展下去就比我伟大了”

毛泽东是位受人民无比崇敬的领袖，然而他又是位和蔼可亲的普通人，特别是同他的卫士们单独相处时，更能表现出他的这种品质。

1956年5月中旬，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视察，5月31日到达武汉。一下飞机，毛泽东就说：“先去游水。”

毛泽东一行乘坐“武康”轮，顺流而下。下午2时许，轮船接近武昌桥头的8号桥墩。卫士长李银桥照顾毛泽东换好游泳裤后，自己也脱下衣裤，换上了游泳裤。

急于游泳的毛泽东没有马上下水，而是用一种异样的眼光上下打量着李银桥。李银桥见主席盯着自己看，感到莫名其妙。

“银桥啊，你已经比较伟大了，发展下去就比我伟大了。”毛泽东一本正经地说。

李银桥更迷惑了，他不明白主席这话是指什么。

毛泽东看了看李银桥那张写满疑问的脸，拍拍他的肚皮，笑着说：“你的肚子大了啊，快跟我媲美了。”

这种小而内涵的幽默，大大地缩小了领袖与普通战士的距离。

“看来他还是个 简化汉字的创始人呢”

1958年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开过之后，毛泽东去南方视察。毛泽东这次特邀张治中先生与其同行。同时随行的还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以及叶子龙、江青等工作人员。

毛泽东南巡的第一站是武汉。在武汉，毛泽东听取了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的工作汇报，还听取了武钢公司党委书记李一清和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林一山的工作汇报，并接见了武汉军区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9月的武汉，天气还比较热。既然到了武汉，毛泽东是必定要到长江游泳的。游泳是毛泽东的最大乐趣，在大江大海的风浪里游泳，毛泽东总是兴致勃勃，痛快淋漓。在武汉的几天里，毛泽东三次游了长江。9月10日上午11时许，毛泽东一下飞机就说：“我们马上到长江去。”来到船上，毛泽东简单地用过午饭就忙着下水。“你们可下水？”他笑着问张治中等。张抱歉地说：“这我不能奉陪了。”毛泽东风趣地说：“好吧，你们都当‘观潮派’吧。”说着便入水游了起来。

一天，天气闷热，毛泽东决定改到船上听林一山的工作汇报。听完汇报，毛泽东便下江游泳。游泳后天色已晚，王任重

便陪毛泽东到“老通城”吃晚饭。“老通城”小吃在武汉是很有名气的，这里的豆皮别有风味。走进店门，毛泽东笑着对王任重说：“你们可不要告诉人说我到‘老通城’来吃豆皮，不然别的馆子会贴我的大字报，说我偏心了！”说得大家都笑了。“老通城”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毛泽东一行。饭后，毛泽东向工作人员热情致谢：“谢谢大家的服务！”

在武汉，中共湖北省委专门组织了一个舞会，毛泽东高兴地参加了。毛泽东喜欢跳舞，尽管他的舞跳得并不那么好。他喜欢的是那种热闹场面，在这种场合，他的身心都放松开来，得到很好的调整和休息。

开始，毛泽东告诉张治中：“今晚大家跳舞去。”张治中说：“我不会。”毛泽东笑了，说：“看来你的文化程度很低，连舞都不会跳！”

晚上，张治中陪毛泽东来到舞厅。江青主动邀请张治中跳舞，张治中不便推辞，就和江青跳了一会儿。休息时，毛泽东对张治中说：“你也下海了，看来你的文化程度有所提高了。”张治中笑笑说：“我跳舞是三不管，不管音乐，不管舞伴，不管出腿。”

9月16日，毛泽东乘“江峡号”轮东下安徽。在安徽，毛泽东视察了安庆、芜湖、合肥、马鞍山等地，而后由马鞍山乘火车去南京。在专列上，毛泽东和随行人员以及前来迎接的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等人一路谈笑，海阔天空。谈笑间，毛泽东指着张治中问大家：“你们可知道他为什么字‘文白’？”大家都说不知道。毛泽东说：“他青年时当过警察，取字‘警魄’。后来警察不当了，警魄的字也不用了，遂从警字中取一‘文’字，魄字中取一‘白’字，故字‘文白’。”话稍一顿，接着不无幽默地

补了一句说：“看来他还是个简化汉字的创始人呢！”说得在座的都笑了。毛泽东自己也笑了。

毛泽东9月21日由南京出发，途经上海视察了上钢一厂，22日到了杭州。到杭州之前，张治中劝毛泽东到了杭州应好好休息些日子。毛泽东笑笑说：“看情况吧。”他又关照张治中说：“这几天怎么活动，你自己安排，我们暂时‘分道扬镳’吧。”

杭州是毛泽东这次视察的最后一站。一周后，毛泽东由杭州返回北京。

“你取了一个苏联人的名字喽”

1958年9月中旬，毛泽东第二次到武汉钢铁公司视察。武钢总经理李一清、副总经理韩宁夫把毛泽东一行带到一排低矮的简易活动房内。韩宁夫拉开墙上挂的厂区总平面图的帷幕，想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毛泽东见到他有点面熟（1956年毛泽东第一次视察武钢时见过他），一时又记不起姓名来，于是问道：

“两年前见过一面，你叫什么？”

“主席，我叫韩宁夫。”

毛泽东听得明白，幽默地说：“你取了一个苏联人的名字喽，又是‘宁’噢，又是‘夫’喽……”

一句话引得大家笑开了，简易平房内充满了无拘无束的气氛。

“此人口气真大，口衔天宪！”

1958年9月，毛泽东南下到大江南北巡视。陪同的有张治中、罗瑞卿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等。在视察过程中，毛泽东常常和大家一起谈笑风生，尤其他当众介绍某些人物的话，更是妙趣横生。

毛泽东一行到了杭州，浙江省的党政领导一齐来见毛泽东。毛泽东向张治中一一作了介绍。毛泽东指着省委书记江华介绍说：“他不姓江，原名黄春浦，江华是干革命时取的。”介绍书记霍士廉时，毛泽东一下子联系起了2000年前西汉名将霍去病。他说：“是霍去病的霍，霍去病在汉代名声功劳最大，不幸27岁上就死了。”他笑一笑说：“霍书记大概是霍去病的后裔吧？”介绍到副省长吴宪时说：“此人口气真大，口衔天宪！”这是用了拆字法。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

“你是康熙的臣民了!”

1958年8月7日,毛泽东来到河南襄城县农村考察。

襄城县委副书记刘熙民闻讯赶来,他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连连说:“毛主席好!毛主席好!”毛泽东微笑着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刘熙民。”刘熙民连忙回答,“是康熙的熙。”

毛泽东听了,风趣地说:“噢!你是康熙的臣民了!”

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毛泽东的平易近人,给刘熙民和在场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你！姓孙，孙行者！”

“你！姓孙，孙行者！”毛泽东带着亲切的微笑，以风趣幽默的口吻，用手指着后几排的一名蓄着短须的将军说。在场者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到毛泽东手指的那人身上。

这个“孙行者”何许人也？他就是孙毅中将。

这是1960年的春天，在北京三座门中央军委会议大厅，出席军委扩大会议的将军们，武装整齐地列队，静注毛泽东的接见。

毛泽东迈着健步向大家走过来。站在前排的将军们纷纷向毛泽东行着军礼。毛泽东望着眼前这一幅幅熟悉的面孔，频频点头，表示回敬。在这上百名将军排列的靠后几排上，毛泽东扫视的目光看到了孙毅，亲切地和他打了招呼。

孙悟空是毛泽东最喜欢的历史小说中的人物，今天他以这个人物的名字，风趣的称呼了孙毅。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孙毅的胡子。那还是当年经过毛泽东特许得以蓄留下来的呢（其他还有贺龙、李克农等），足见毛泽东对孙毅的厚爱了。

其实，孙毅戎马生涯几十年里，并未直接伴随在毛泽东的身边。孙毅是河北大城人，1904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6岁时，他与几个同乡来到厦门，投靠了一个同乡军阀

团长当了兵。1931年宁都起义参加了红军,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这是他第一次认识毛泽东。他在红军中曾任师参谋长,后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参谋长等职。长征时,那个法国人李德说他是白军那边过来的,硬是把他一再降职,最后降到了一名教员。

1937年8月以后,孙毅历任八路军115师旅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八路军第三纵队参谋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冀中军区司令员,率部参加了正太、青沧、清风店等战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立下了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第二高级步校校长、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军委军校部副部长、总参军训部副部长等职。

1955年授衔时,资历与他差不多的人都被授予上将军衔。评衔前,孙毅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授我少将军衔足矣。我投身革命决不是为升高官,要厚禄。党和人民给予我的已经大大超过我的奉献了。”

这也许是毛泽东特别熟悉和厚爱孙毅的原因吧,他亲自把孙毅的军衔定为中将。

“这个名字好听， 锦上添云比锦上添花还美呢”

中南海的舞厅里，一个舞曲演奏完毕，毛泽东和他的小舞伴坐下来休息。

“你是新来的？”毛泽东慈祥的面孔带着微笑问道。

“我第一次来。”小舞伴仍然有些拘束。

“怪不得没见过你。小同志，叫什么名字？”

“孟锦云。”

“噢，孟锦云，跟孟夫子同姓。这个名字好听，锦上添云比锦上添花还美呢。你是什么地方人？”

“是湖北武汉。”

“噢，湖北，一湖之隔是我的半个小同乡呢。”

……。

随着这些闲聊，小孟原来那种紧张的感觉消失了，她只觉得眼前这位老人慈祥，亲切，可敬。

孟锦云，空政文工团里的舞蹈演员，一个十四五岁的妙龄少女。她身材颀长，容貌秀媚，天生丽质。今天是她第一次进中南海，陪中央首长跳舞。就这样，她和毛泽东认识了。

此后，她和她的同伴们几乎每星期都到中南海来。在毛

泽东面前，她已完全无拘无束，更显出她天真、单纯而又稚气十足的少女天性。

一天，小孟又和毛泽东闲聊起来。

“主席，您嘴巴下面有一个痣子，听我奶奶说，这是有福气的痣子呢。”小孟笑眯眯地说。

“你的脸上也有一个痣子，那你也有福噢。”毛泽东看到小孟脸蛋上也有个小小的痣子，便笑着说。

“那可不是，您的痣子是湖南痣子，我的痣子是湖北痣子，长的地方不一样。”

毛泽东听了小孟的回答，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没想到，你还是个小九头鸟呢。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你知道吧？”

“当然知道，我可不愿当九头鸟……”

“噢，还有这么大的顾虑？我可愿意当个九头鸟呢，只是想当而当不上噢。”

接着，话题转到了黄鹤楼，龟山蛇山的故事，又转到了武当山传奇……

渐渐地，毛泽东的这半个小同乡，已成了他的“老”朋友。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小孟参加了一派群众组织。起初，她和她的战友们时而到中南海，向伟大领袖“反映情况”，不久却销声匿迹了。原来，她被叶群打成了“反革命”，投进了监狱。原因，据说是她泄露了重要“机密”。

熬过五个年头的监狱劳改生活，小孟被安排在武汉一个军队医院，当了一名护士。一大串的问号不得解决，她毅然决定找空军党委解决问题。她又来到了北京。

是机缘？是天意？尽管小孟的初衷并不是想找毛泽东，然而一转三折都是巧，小孟又来到了毛泽东的面前。

“这么大个北京，盛不下我的半个小同乡！”

小孟没有进京，毛泽东就已有这个定音。

“主席，我是湖北来的孟锦云。”截至此时，毛泽东已经八年没见小孟的身影了。

“记得，你不就是我的半个小同乡吗？”毛泽东的头脑里清清楚楚留着这半个小同乡的名字和身影。

“主席，我是来找你平反的。”

“你不要讲了，你来了，就什么都好办了，你就留在我这里工作。”

毛泽东的话，小孟听得清清楚楚，但她却不敢相信。这太突如其来，太出乎意料了。然而这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就这样，小孟留了下来，成了毛泽东晚年身边的最后一名护士。在此后的489个日日夜夜里，她陪伴、护理着毛泽东走完了生命的最后旅程。

“你可不要按孔夫子的‘由之’去做”

1975年春季的一天，唐大夫唐由之来到毛泽东身边，为毛泽东检查身体。

毛泽东望着他反复地念着他的名字：由之、由之。忽然问：“你的名字是出自《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吧？”

唐由之大夫笑着点点头。

毛泽东又接着说：“你可不要按孔夫子的‘由之’去做，而要按鲁迅讲的‘由之’去做。”毛泽东的记忆力非常惊人，当即吟诵起鲁迅的《悼杨铨》这首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唐由之说：“毛主席啊，有些地方我听不懂。”

毛泽东慈祥地说：“你拿纸来。”

他用了六张纸，写下了鲁迅这首充满激情的诗，并签上自己的名字，送给了唐大夫。

壮志 豪情篇

毛泽东幽默趣谈

“谁也不能多分”

毛泽东小时候就酷爱读书,可是他不喜欢旧式学堂教的经书,爱看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在桥头湾读私塾时,他就瞒着塾师读《岳飞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塾师讨厌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毛泽东采取老师走过来时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的办法偷读。可是有一天,毛泽东背着老师读《水浒全传》,正当他被梁山好汉深深吸引住的时候,老师走过来突然夺走了他的书,训斥他:“你这是反叛,我不敢教你了,收拾你的书箱回家去!”把毛泽东赶出了学堂。

辍学后的毛泽东,白天干一整天的劳动活,晚上还要替父亲记账,但他还是挤时间贪婪地阅读能够找到的除经书以外的一切书籍。毛泽东少年时看书的特点就是边看边思考。到了1936年,他曾对到边区来采访红军的美国记者斯诺说:“辍学后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

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

后来毛泽东又先后到乌龟井和东茅塘私塾读书，他从读旧小说又发展到读《史记》、《纲鉴类纂》和《日知录》。他的知识又有了很大的扩展。

毛泽东读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灵活运用所看到的书本知识。在《毛泽东选集》四卷中，许多文章都有用中国古代小说做比喻来说明事理的。可以说，引用中国古代小说和古典故事做比喻，是毛泽东著文谈话的一大风格。这个风格，在毛泽东青少年时期就已逐渐形成。1910年毛泽东离开家乡，赴湘乡县县立东山学校读书，并常去外婆家度假日。每次去外婆家，他总要用节省下来的伙食费买点时新食品给诸表兄。有一回，他买了点“笔杆糖”回外婆家，几个表兄亲热地把毛泽东围成一团。毛泽东从袋子里取出笔杆糖，数了数，每人两根恰好分完。可是最小的一位表兄却闹着要多分一点儿。毛泽东心想，糖是一根也没有了，但是话还得向他们讲清楚。于是他振振有词地说道：“农民领袖李自成起义，与昏庸官府作斗争，为的是使天下人均田均富。所以，我们兄弟之间也要按照均田均富的原则来分糖，谁也不能多分。”毛泽东这一番大道理可使诸伙伴们心悅诚服了，平息了“分糖风波”。

“穷不穷，毛泽东”

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可真穷。16岁那年，他第一次远离韶山，到被农民称为洋学堂的湘乡县县立东山小学读书。当时他肩上挑着两样东西：一头是一个包袱，里边有一件长袍、两条床单和一顶蚊帐；另一头是书筐，装有《水浒》和《三国演义》等几本他最喜欢的书。

他刚到校门口，就被门房和正在游戏的学生们拦住。

门房说：“我们这里不要种地的。”

“种地的为啥就不能上学？”毛泽东严正地质问。

门房吼到：“滚！臭小子，穷疯了，跑到这来撒泼。”

一些学生也跟着起哄，大家喊着：“快来呀，都来看呀，有个穷小子要进学堂，跟门房吵起来啦！”又有几个富家子弟更蛮横地乱翻起毛泽东的行李，把东西抖了一地，任意取笑。

“这里是学堂还是强盗窝？你们放尊重些！”毛泽东大声抗议着，他跳上台阶，就要往里闯。

一群富家子弟立刻威胁着结成一排，挡住校门。

毛泽东眯细了眼，冷冷打量着那一排人。他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拾起筐子和包袱，右手握紧那根扁担，大喝一声：“滚开！”昂然向学校里走去。

正在吵闹间，学堂的堂长闻声赶来。他和一位姓胡的教员接待了毛泽东。只经过简短的交谈和考核，就发现毛泽东虽然穷，但很有才华，比富家子弟有出息。他们俩被毛泽东的气质和求知欲望所感动，把毛泽东留了下来。

半年后，不满现状的毛泽东离开了东山小学，还是挑着那扁担，心里燃着到更广阔的地方去求学求知的欲望，和对于进步思想的追求，由湘潭搭上行驶在湘江里的小火轮，驶向湖南最大的城市长沙。

这位来自偏僻山乡的穷少年毫无自卑感，望着滔滔江水讲了四句话：“富不富，卖豆腐；沉不沉，大火轮；穷不穷，毛泽东；君不君，程咬金！”这是他对生活和命运的誓言。

新中国诞生后，毛泽东曾多次对身边工作的青年们解释这四句话的含义：农村里卖豆腐的，过得清贫，但手里有钱；大火轮很沉，没人搬得动，却能漂浮在水面上；我毛泽东当时身上一文不名，但我的精神世界非常富有；程咬金是隋朝末年瓦岗寨的起义军首领之一，封建统治者骂他是强盗响马，但他却敢当君王，向封建统治者挑战！

当时既贫穷、又富有的毛泽东，就是带着向命运挑战，向旧制度挑战的精神，走上了新的人生旅途。

“丈夫要为天下奇”

中学时期的毛泽东，就有一个奇特而又了不起的想法，那就是：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作个奇男子。毛泽东的同学们对此想法，既感新奇又深深佩服，还给毛泽东起了“毛奇”的雅号。

曾是毛泽东中学时代好友的罗章龙回忆说：“1915年5月中旬某日，我赴司马里第一中学访友，于该校会客室门外墙端，偶见署名‘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一则。启事是用八裁湘纸油印的，古典文体，书法挺秀。我驻足浏览，见启事引句为《诗经》语：‘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内容为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其文情真挚，辞复典丽可诵，看后颇为感动。返校后，我立作一书应之，署名纵宁一郎。逾三日而复书至，略云：接大示，空谷足音，跫然色喜，愿趋前晤教云之。旋双方订于次星期日至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

后来罗章龙等人在定王台省立图书馆见到了毛泽东，热烈交谈了3个多小时。临别，毛泽东表示“愿结管鲍之谊”，并嘱以后常见面。

第二天湖南一师一位叫彭道良的同学来罗章龙处，谈话中提到定王台事。彭道良笑道：“我与二十八画生同班同学，

颇知其为人品学兼优，且具特立独行之性格。他常语人：‘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作个奇男子。’他本人近所写日记，亦有惊人语，如云：‘力拔山兮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忍耐而已！’合而观之，此君可谓奇特之士。因此同学中戏称为毛奇，且语意双关。”（毛奇 Molkt 系德意志建国时普鲁士著名将领，在普法战争中功绩卓著。）

后来罗章龙又去询问同乡陈赞周，陈亦在一师肄业。陈赞周道：“润之气质沉雄，确为我校一奇士，但择友甚严，居恒骛高远而卑流俗，有九天俛视之慨。观其所为，诗文戛戛独造，言为心声，非修养有素不克臻此！直谅多闻，堪称益友！”

罗章龙听了这些介绍后，为能交毛泽东这样的益友而高兴。后来他与毛泽东一起步行去韶山，在长沙还陪毛泽东去过许多地方。

“终能用小石头， 打烂蒋介石的大水缸”

在斗争遭受挫折的时候，在革命处在低潮的时候，毛泽东总是能以自己风趣的话语，鼓舞起大家的斗志，点燃起指路的明灯。

1927年9月，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遭到强大敌人的围攻，损失很大。部队被迫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撤到浏阳县文家市。

下一步到底怎么办？大家心里一片茫然。

这时，毛泽东讲了话。他满怀信心地说：“这次秋收暴动，虽然打了几个小小的败仗，受了点挫折，但这算不了什么！常言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现今我们有湘、鄂、赣、粤四省已经起来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反动派并不可怕，只要大家团结紧，继续勇敢战斗，终能用小石头，打烂蒋介石的大水缸。”后来，毛泽东把这支队伍带到井冈山。井冈山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道路的起点。

“饿死呢？解散呢？ 还是自己动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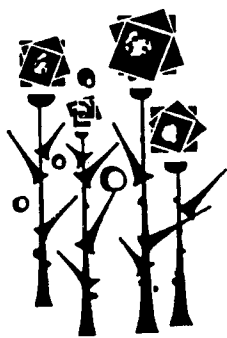
1939年，由于日寇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陕甘宁边区在经济上发生了严重困难。在一段时间里，边区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甚至吃粮也很困难。要知道，当时陕甘宁边区是个仅有一百四、五十万人口、土地又贫瘠的高原地区。但那里却有数万名干部、士兵，还有许许多多不断前来要求抗日的青年学生。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站出来说话了：“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这是1939年2月间，毛泽东在延安干部生产动员大会上讲的话。

“自己动手”战胜困难，在毛泽东的伟大号召下，陕甘宁边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结果战胜了敌人的封锁，克服了经济困难，取得了“丰衣足食”的伟大成果。

后来在1945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又说起大生产运动，他说：“我们要感谢何应钦（注：何

应钦当时任国民党参谋总长，国民党顽固派的一个代表），他不给八路军、新四军发饷。他这样一困，我们就提出了是解散，是饿死，还是自己动手搞生产的问题。解散不甘心，饿死不愿意，那剩下一条，就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克服困难。”



“两年后,我邀请你到北京来看我”

1947年初,胡宗南几十万大军进逼延安,局势跟陕北的严冬一样冷酷。即将撤离延安的美联社驻延安记者罗德里克来见毛泽东,说:“毛主席,在目前,中国共产主义的前途看来的确黑暗,将来会怎样?”

毛泽东微微一笑,沉思了一会儿,慢慢地说:“两年后,我邀请你到北京来看我。”

“什么十里八里？ 中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率25万人马，从南、西、北三面进攻陕北解放区。当时，在陕北的人民解放军只有6个旅两万多人，在装备上也处于绝对劣势。18日，中共中央决定我军主动撤离延安。为人民解放军在华北、华东、山东、东北各战场举行战略反攻创造有利条件。毛泽东决意不东渡黄河，而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直属部队转战陕北，拖着胡宗南在黄土高原转圈圈。为创造有利战机，让陕北野战军的主力绕到敌人侧后去打歼灭战，毛泽东带着只有几百人的中央机关，专门走一路，吸引着刘戡统领的7个旅的追兵。这是多么危险啊！可毛泽东的大智大勇，常常化险为夷。

有一次，这几百人的队伍住进了一个山沟小村，毛泽东立刻让参谋人员将全国各战区的军事地图取出来。墙上、炕上、桌上，就连老百姓的腌菜缸上，都摆上了地图。秘书和参谋人员不停地送来全国各战区的电报，然后又带走毛泽东下达命令的电文。

这时，敌人用电台测向仪测到了毛泽东所在位置。刘戡立刻率追兵像蝗虫一样漫山遍野地向小山村疯狂地扑过来。

敌情严重，我骑兵侦察员一会儿一报：“敌人距我们还有30里！”“敌人已迫近到20里！”“敌人进沟了，不到10里！”

……

毛泽东却双眼紧盯着各战区的地图，手里拿着电报纸，好像根本没听到。

形势紧迫，一名卫士接连三次报告敌情。

毛泽东想大事的时候是容不得人去打搅的，这一连三次“打搅”，他发脾气了：“什么十里八里？中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你去吧，不要婆婆妈妈的……”这下大家虽然心都快跳到嗓子眼里，可再不敢上前“打搅”了。

后来这几百人的队伍前脚刚出村，敌人后脚就进了村，好险啊！

转战陕北，毛泽东率领这支只有几百人的中央机关队伍搬迁了12个县，37个村镇，几乎没有一天身后不背着4到7个旅的追兵，险情不断。可是毛泽东不但要对付眼皮底下的追兵，还在不间断地指挥着全国解放战争。这种指挥艺术，恐怕是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吧。

“带不了的书籍可以留 下来摆整齐，让胡宗南的 兵读一点马列主义也有好处嘛！”

1947年3月18日，黄昏时分，敌人已经步步逼近了延安，隆隆的炮声不断，连手榴弹的炸响声都已听得清清楚楚。此时，城里的乡亲们已全部疏散出去；朱德、刘少奇及中央机关大多数同志也已分批撤离。延安城里，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震及警卫人员之外，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在周恩来、彭德怀等的一再催促下，毛泽东才停下他手头的工作。他看了看表，说：“现在还有点时间，咱们吃了饭再走。”

饭？并没有准备这顿晚饭，装进饭盒里的，是准备带在路上吃的。听毛泽东说吃饭，秘书们只得打开饭盒，给毛泽东端了上去。

枪声一阵紧似一阵地响着，警卫战士的心也一阵紧似一阵地跳着。停在门前的美式吉普车早已隆隆地发动起来，只等毛泽东一上车，立即就可疾驶而去。

毛泽东吃罢饭，站起身来，深情地环视了一下居室。最后，他的目光落在桌子上。他转身对警卫人员说：“把桌子摆端正，把茶壶茶碗摆整齐，让胡宗南知道知道，延安是我们的，

我们还要回来的!”他笑了笑,不无幽默地接着说:“带不了的书可以留下,摆整齐,让胡宗南的兵读一点马列主义也有好处。”周围的人都笑了。

“快走快走,一分钟也不要呆了。”彭德怀没有笑,他只有担心和着急,已不知这是多少次催促毛泽东了。

“我实在不愿意走哇。”毛泽东喃喃地说。半晌,他像征求意见似的说:“怎么样,咱们走吧?”毛泽东走出居室,踏上汽车,向远方疾驰而去。

从胡宗南发动进攻、中央做出暂时放弃延安决定时起,毛泽东就说:“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他做的决定、他说的话,在任何时候都是毫不动摇、不可改变的。只有在同志们、老乡们都已安全转移后,他才放心、平静地最后离开这里。

等胡宗南闯进延安,延安已是一座空城。

“不要白酒，钟松没有那么辣”

毛泽东烟瘾特别大，工作紧张忙碌起来，他总是一根接一根地吸烟。对于酒，他却很少喝，只是在指挥作战紧张疲劳时喝一点，用来刺激刺激神经，提提精神。

那是1947年8月，为了策应陈赓兵团南下挺进豫西的战略行动，西北野战军在围攻榆林，调动了胡宗南集团主力北上以后，继续与敌在榆林以南地区周旋，寻机歼敌。

钟松自恃“援榆有功”，骄狂至甚，扬言“一战结束陕北问题”。他率第36师两个旅由榆林南下，企图寻我主力决战。

彭德怀司令员密切注视着敌军的每一步行动。他见钟松骄狂轻敌，孤军冒进，便下决心抓住时机歼灭该敌。8月18日，彭总见敌南北夹击之势尚未形成，钟松的两个梯队向沙家店以东的乌龙铺推进，已成孤立之敌，便立即下令将该敌包围起来。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率中央机关经过近20天的艰苦跋涉，甩掉了敌人的追击，辗转来到佳县梁家岔。此地距彭总的指挥所十几里路，电话线很快架设起来。彭总立即通过电话向毛泽东报告了包围敌36师的情况和他的歼敌决心。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大声地对彭总说：“和全体指战员讲清楚，

这是对整个战局有决定意义的一战，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不让一个跑掉！”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提醒彭德怀：“要挖壕，侧水侧敌，大意不得！”“战士碗里有肉吗？”毛泽东又关切地问。

毛泽东放下电话，回头问身边的卫士：“银桥，我们还有酒吗？”

十多天的连续行军，多少个通宵不眠的工作，毛泽东已经十分疲乏。但是，他仍不能休息片刻。大战马上就要开始，侧水侧敌是一步险棋，胜败生死攸关，他必须时时关注着战役的全过程。所以，他想要点酒喝。

“有酒。要什么酒？白酒行不行？”

“不要白酒。”毛泽东摇摇头，“钟松没有那么辣。”他幽默地笑着说。

“那就拿葡萄酒？”李银桥问。

“这一次敌人有十几万，我们又是侧水侧敌，仗也没有那么好打……”毛泽东又摇了摇头。

“我看就是白兰地吧。”最后，他把钟松作为一杯“白兰地”强度的估量。

20日拂晓，我军对敌发起攻击。钟松一时惊恐万状。他一会儿发报向胡宗南告急，一会儿又用报话机向刘戡求救。刘戡以援榆不利，刚刚受到胡宗南的训斥。这次他想援救钟松，又害怕自己被歼，迟迟疑疑下不了决心，只在黄河边上打转转。

当日黄昏，钟松的整编第36师一个师部及两个旅6000余人即被我全部歼灭。

毛泽东接报，心情振奋，立即挥毫给彭总写了12个大字：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毛泽东写完把笔一扔，抓起桌边放着的半瓶“白兰地”，晃了晃，说：“嗜，拿错酒了。”

这时的钟松，连杯“白兰地”的“度”也够不上了。



“不打倒蒋介石，完不成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谁也不能去见马克思”

1948年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转战，中共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任务已经完成。为了更好地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毛泽东决定东渡黄河，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

3月23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在黄河西岸的吴堡县川口渡口乘船东渡。后经半个多月的跋涉，于4月11日抵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

在城南庄，中央要召开重要的军事会议，主要研究华东野战军的战略部署，听取粟裕同志对兵力使用的意见。还在东渡黄河之前，毛泽东通观战争全局，决定粟裕率华野三个主力纵队10万兵马，渡过长江，以吸引中原蒋军20~30个旅回防江南，要粟裕“熟筹见复”。粟裕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思考，电复中央，提出了不过长江，留在江北，配合刘邓在中原打大歼灭战的建议。

此建议事关全局，毛泽东决定让陈毅、粟裕到城南庄面议，同时请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聂荣臻、李先念等，共同到会研究决策。

这天下午，朱德、周恩来、陈毅、粟裕等乘车赶到。

陈毅见到毛泽东，操着一口四川话说：“我们都研究好了，愿意接受中央交给的最艰巨的任务，对于打蒋介石，还是满有信心的嘛！”

粟裕趋前，向毛泽东致礼问候。毛泽东满面笑容地问道：“咱们有多久没见面了？”

“从第三次反围剿分手时算起，整整 17 年了。”粟裕笑着回答。

毛泽东幽默地回忆着说：“记得那天你正加紧追赶部队，边走边打招呼说‘明天见，明天见！’一晃 17 年了，该是多少个‘明天’了。”说得大家都大笑起来。

毛泽东和李先念握手，见他脸上包了一块纱布，关切地问：“这是怎么回事？”

“没有事，擦破了一点皮。”

“没有事？好险噢！”陈毅插话解释：“就是因为我和李涛几个大胖子把汽车给压翻了。还好，沟不深，翻了车，没伤筋骨，不误开会。如果沟再深一些，搞不好，我们就要见马克思去了。”他边谈边笑。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打不倒蒋介石，完不成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谁也不能去见马克思。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会保佑我们的呀！”

会议听取了粟裕的陈述，经研究，完全采纳了他的建议。由此决定了陈粟、刘邓、陈谢三支大军继续协力逐鹿中原，铺垫了以后不久展开的淮海大战的胜利之路。

“将来还可以办大学哩！”

1952 年下半学期开学前，毛泽东少年时代的老师毛宇居到北京，将韶山小学的情况向他作了详细汇报，请他题写校名。毛泽东欣然提笔，写下了“韶山学校”四个刚劲有力的大字。毛宇居问他：怎么不写韶山小学呢？毛泽东笑着说：“学校不是还要发展吗？可以办小学，也可以办中学，将来还可以办大学哩！”

“长江，别人都说很大， 其实，大并不可怕”

毛泽东曾多次畅游长江，不但对长江有了极深厚的感情，而且也摸透了长江的“脾气”，取得在长江遨游的自由权。“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毛泽东这首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游泳》词，就反映了他畅游长江过后的心情和感想。

从1956年5月至1966年7月，毛泽东曾在长江武汉段水域近20次畅游长江。有一次，他在武汉停留7天，就游了长江7次。有一回，他从江里爬上船，对陪同他一起来的张治中先生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多么大，好多人都怕它，抗美援朝我们顶了它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许多貌似强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嘿嘿，还真是个好对手哩！”

毛泽东是个性格刚毅，不屈不挠的人，对手越强硬，他越喜欢与之挑战。“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是毛泽东最喜欢说的话。

这要是跟敌对势力和各种困难相抗争，还好理解。可有一次，毛泽东居然向大海挑战，与令人胆颤心惊的台风巨浪较上了劲儿，也“其乐无穷”。

那是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高潮就要来到之际。毛泽东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就要到了，好吧，我们到有潮水的地方去。”于是，来到北戴河办公。

他夜以继日地批阅全国各地报来的有关合作化的材料，太累了，就放下笔奔向大海，到浪涛里去搏击。

一天，起台风了。狂风呼叫，黑云翻滚，大海咆哮，电闪雷鸣。

毛泽东正奋笔疾书，勾画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蓝图。他写完一章后，心情激荡，将笔一放，起身说：“游泳去！”

“啊？游，游泳？”工作人员吓了一跳，“这个天气游泳？”

“这天气正好游泳。”毛泽东微微一笑，“又不是小脚女人，还怕吹倒不成。”

“不能去!”保健医生和卫士们排成一行,拦住房门,“主席,这不是小事,也不是你个人的事,我们必须向全党全国人民负责。”

毛泽东争取不到一个支持者,只好另找时机。

双方又坚持了两天后,毛泽东实在忍不住要与大风大浪搏斗一番的心情,对工作人员说:“我今天非去试试不可,你们让开。”

熟知毛泽东性格的工作人员明白再无挽回的希望了。大家紧急动员起来,带上救生圈、药箱和急救用品,追上去簇拥着毛泽东走向大海。

一旦面对大海,不少人都紧张战栗了。几米高的海浪猛烈拍打着岸边,发出阵阵轰鸣声,大声说话都听不到了。长长的浪头绵延几百米,像一堵高墙,从天际一道接一道地翻滚过来。巨浪、海风冲起的浪花、水珠吹出几十米远,打在身上生疼。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不由得向毛泽东靠近。

毛泽东凝望大海,目光灼灼,漾出一种战士冲锋陷阵时才会有的锐气,嘴角浮起一层浅笑:“你们害怕吗?”

“不怕!”大家回答得不够响亮。

“你们可以跟我走,也可以在岸上看,也可以回家去。”这是毛泽东惯用的激将法。他又笑了笑,便向大海走去。

一道矗立的巨浪像迎接毛泽东的挑战一样滚滚而来,它轰然掀起如高山,又好像引诱似的退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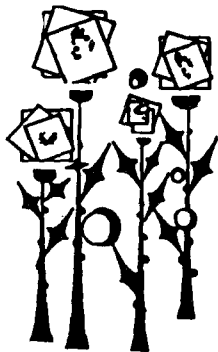
“追,追上它!”毛泽东喊起来。大家簇拥着毛泽东,跌跌撞撞冲入那退却的潮水。

可是,退却的潮水与新涌来的大潮相遇了,怒吼着威猛地耸起,所有人只觉眼前一黑,被潮水淹没卷起,腾云驾雾一般

飞跃,又被重重地抛在河滩上。

“主席! 主席!”有人在喊:“摔伤没有? 啊,摔伤没有?”

毛泽东站起身,奋力吐出嘴里的泥沙,认真打量着海中长长翻卷的巨浪,微微一笑,伸手指向大海:“嘿嘿,还真是个好对手哩!”又向卫士长说:“银桥,起不来了? 这点水比刘戡的7个旅还凶吗?”说完,就又向那威猛耸立的浪潮走去。



“今天你胜利了”

毛泽东是主张“人定胜天”的。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一些省市的文艺作品反映了人能战胜神、现实生活中的人的才能胜过那些趾高气扬的神话形象这一主题,毛泽东看后特别表示赞赏。

1958年9月16日,他在安徽视察工作期间,观看了新编庐剧《牛郎织女笑开颜》。剧中提出人民公社要管天管地,还要管神仙。毛泽东看后很感兴趣,还幽默地说:“剧中跟王母娘娘和龙王没有一场恶战,还管不了他们。我们的农业队长穆桂英、罗成、黄忠、赵云都是会打仗的嘛,应该好好地打一仗。”

1960年3月,他在杭州看了浙江婺剧团的神话喜剧《牡丹对课》。该剧写大名鼎鼎的八仙之一吕洞宾下凡游戏人间,见一药店招牌上写“万药俱全”四个字,就故意作难,要买几味怪药。店主无以为对,吕洞宾就要卸下药店招牌。店主之女白牡丹出而应对,吕洞宾欲戏弄白牡丹,结果反被戏弄。毛泽东看后的评价是:这戏说明神仙不如凡人。在会见演员时,毛泽东又对饰演白牡丹的小演员说:“今天你胜利了”。

“对于帝国主义我不是 什么估计不足的问题， 而是根本就把它踏在脚下”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一个多月前（即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和援助下，以围攻鄂豫边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相继在晋南、苏北、鲁西南、胶东、冀东、绥东、察南、热河、辽南等地，向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发动了全面内战。当时国民党军队拥有总兵力达430万人，而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只有127万人。双方兵力比数为3.4:1。国民党统治着约全国76%的面积，控制着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在它背后，还有美国政府的巨大的军事、经济“援助”；它还拥有大量新式装备的陆、海、空军。而我军，不仅没有海军和空军，就是地面部队的装备也很差，主要是依靠抗日战争中缴获日伪军的武器，在物质上也得不到任何外援。从表面上看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如此悬殊，所以蒋介石声称，只须3个月到6个月，就可以取得胜利。由于国民党的背后站着美国，而这个拥有强大经济、军事实力并垄断着原子弹生产秘密的美国，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因此，在国

内外的许多人民心中,对处于劣势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能否打败蒋介石的进攻,是心存疑虑的。

就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对斯特朗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他还说:“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结果人民解放军仅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就打败了蒋介石的军队,解放了除台湾以外的全中国,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时,又提到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观点。当时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不同意“纸老虎”这个观点,认为“这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不足”。毛泽东坦率而幽默地对他说:“谢谢你对我的批评。不过你的批评还不够。对于帝国主义我不是什么估计不足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把它踏在脚下。”这充分表现了毛泽东战略上蔑视一切反动势力的英勇气魄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当然,毛泽东这样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许多历史事实,特别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还向哥穆尔卡解释其中的道理:“我们是讲人们的精神状态。帝国主义天天在那里张牙舞爪,你怕它,它就老实了吗?所以我们说,在战略上要藐视它,它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在一个个的具体问题上,必须认真对待,不容轻率,这就是要在战术上重视它。”还说:“哪个讲它就是个纸糊的玩艺儿,一捏就碎,这样还叫马克思主义吗?”

主要参考书目

1.《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研究室本书编写组,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2.《毛泽东读史》张贻玖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1 年 10 月第 1 版。

3.《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苏扬著,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 4 月第 1 版。

4.《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权延赤著,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1989 年 4 月版。

5.《毛泽东外巡记》谭振球编,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3 年 3 月版。

6.《青年毛泽东》高菊村等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年 3 月版。

7.《跟随毛泽东纪事》武象廷 韩雪景,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0 月第 1 版。

8.《博览群书的毛泽东》江东然编著,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9.《毛泽东生平实录》竞鸿、吴华编著,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5 月第 2 版。

10.《毛泽东大智谋》柴宇球编著,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1.《警卫毛泽东纪事》阎长林著,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3 月第 1 版。

12.《毛泽东之谜》晓峰 明军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13.《毛泽东生平纪事》王进等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4.《历史巨人毛泽东》高树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1 月第 1 版。

15.《毛泽东之路》胡长水 李璵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6.《毛泽东之魂》陈晋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7.《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贾思楠编,江苏文艺出版社 1989 年 6 月第 1 版。

18.《伟人毛泽东》周国全 郭德宏 谭邦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人》路海江 贺明州编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第 1 版。

20.《一代巨人毛泽东》侯树栋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后 记

《毛泽东幽默趣谈》是山东人民出版社《伟人幽默趣谈丛书》的一种。本书并不重彩浓墨于伟人日常用语之“幽默”，也不着力渲染伟人生活轶事之“趣谈”，而是试图在更广阔的领域，从既为幽默趣谈而又高于幽默趣谈的角度，反映这位伟人光辉的一生。本书充其量只不过是毛泽东伟大一生中的侧光片羽，愿它汇入知识的海洋，化作云雨，滋润万物，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

本书编写过程中，参考了近年来理论界、文学界的一些成果，也吸取了老一辈革命家和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忆毛泽东的一些珍品。许祖范同志统看了书稿，山东人民出版社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向关心本书编写与出版的同志一并表示谢意！

由于编写时间有限，加之有些史料的取舍、改写和核实的难度较大，我们的水平又有限，书中不免有错讹之处，诚恳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著者

1998年5月于北京

◎责任编辑：金明善 王晶 ◎封面设计：张庆国

MAO
ZHUO
NE

定价：22.00 元

ISBN 7-209-01275-3



9 787209 012751 >